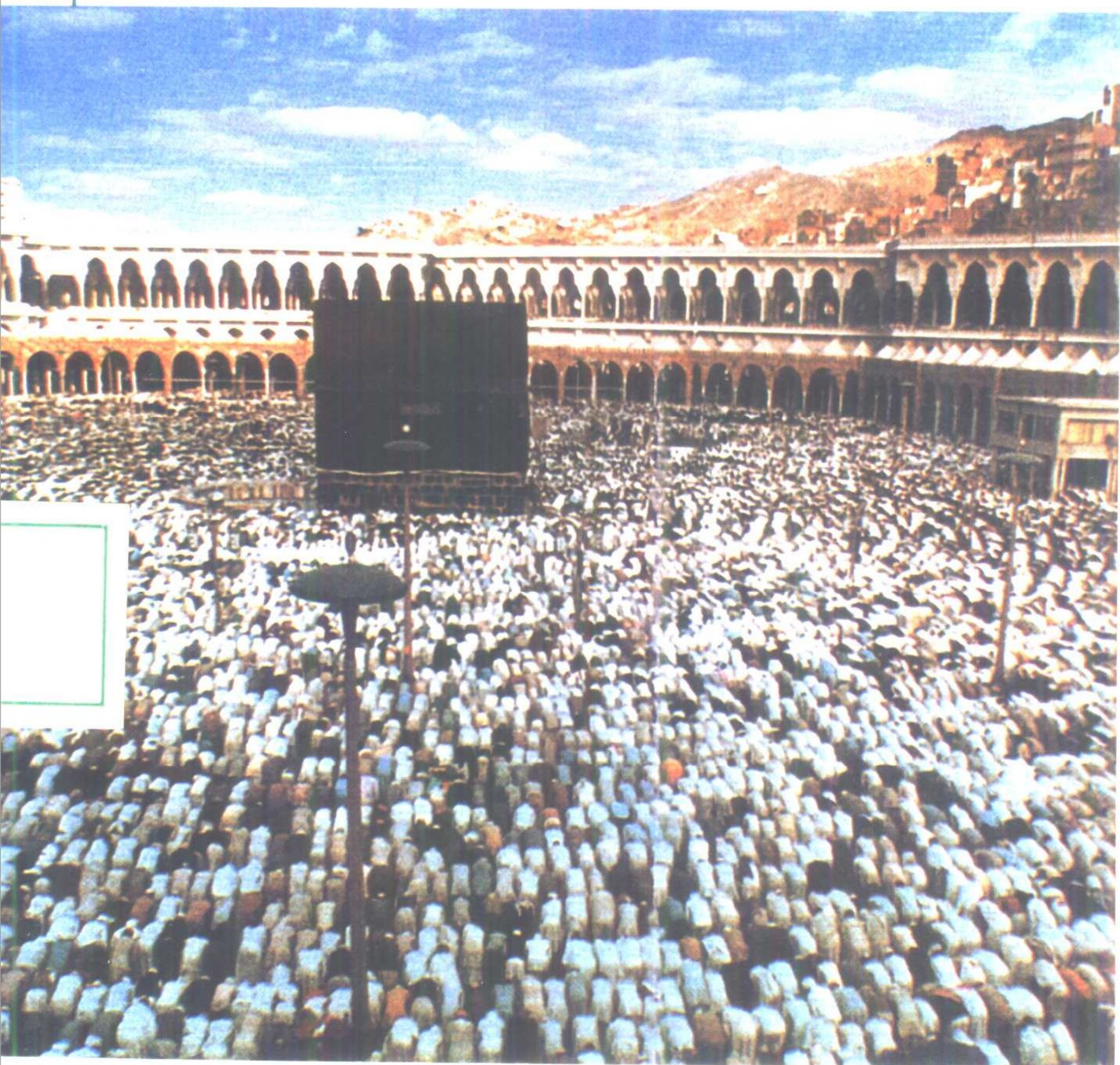


肖宪  
著

# 当代国际

## 伊斯兰潮



# 当代国际伊斯兰潮

肖宪著

(内部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崇禄

封面设计：孙 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国际伊斯兰潮/肖宪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

ISBN 7-5012-0729-1

I. 当… I. 肖… II. ①伊斯兰教-分析-世界②伊斯兰教-研究-世界 IV. B9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3437 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7 字数：149000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9.00 元 (内部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 言

在我们这个有 50 亿人口的地球上，我们中国人口占了大约 1/4，欧、美、日等所有西方国家的人口加起来大约也占了 1/4，南美、非洲南部以及其他的亚洲国家如印度、越南、朝鲜等加起来差不多也占 1/4，那么，还有另一个 1/4 呢？那就是幅员辽阔的伊斯兰世界。

说起伊斯兰世界，在我们许多人的脑海中出现的画面可能是：一支孤独的阿拉伯骆驼商队穿行在茫茫的沙海之中；或是椰枣树下的清真寺中，一群戴头巾、穿长袍、正在匍匐祈祷的穆斯林；可能是海湾国家高高矗立的石油井架；也可能是阴暗曲折、带有拱顶的古老集市……是的，这些都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侧面。但现实生活中的伊斯兰世界远比这简单的画面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它也并不是像这些画面上这么和平安宁，而更多的是充满了喧嚣、躁动和不安，涌动着激情、活力和渴望。

随着中国的大门对世界敞开以来，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任何一个年青的中国大学生都可以对联合国内的明争暗斗、美国的总统竞选、俄罗斯的政治危机高谈阔论，就是连街头的小贩也会对日本的高速列车、英法的海峡隧道、澳大利亚的自动化牧场津津乐道。但是，我们对在人口、在面积都占世界 1/4 的伊斯兰世界知道多少呢？

应该承认，大多数中国人对世界的这 1/4 还很陌生，很

陌生。我们对伊斯兰世界的过去知道得不多，对它的现在了解得就更少。

自70年代末以来，伊斯兰世界发生了一系列震撼全球的重大事件：

1979年2月，伊朗数百万穆斯林在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震撼世界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当时号称“世界第五军事强国”的伊朗巴列维国王政权，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979年11月，在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第一大圣地麦加，最神圣的麦加大清真寺被一批宗教极端分子占领，他们自称“马赫迪”（救世主），并宣称要推翻腐败的沙特王室。沙特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经过20多天的激烈战斗，才平息了这次动乱。

1979年12月，原苏联10多万军队侵入阿富汗，受到了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的顽强抵抗。他们在伊斯兰“圣战”的旗帜下，与苏军展开了长达10余年的战争，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1980年9月，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在西亚的两个伊斯兰大国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爆发，两伊双方都声称自己是为伊斯兰而战。在狂热的宗教情绪支配下，战争空前惨烈，历时八年，伤亡人数逾百万。

1981年10月，实行自由经济，并与以色列媾和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参加庆祝“十月战争”阅兵式时，被几名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士兵杀死在检阅台上。这些士兵声称他们杀死的是伊斯兰教的叛徒。

1982年2月，叙利亚的哈马市发生严重骚乱，“穆斯林兄弟会”与政府军进行了10余天的战斗，整个城市几乎被夷为

平地，死伤两万多人。

.....

与此同时，在许多穆斯林国家中，人们看到了范围更为广阔、内容更为丰富的“伊斯兰现象”：

大批新清真寺被修建了起来；参加礼拜、朝觐等各种宗教活动的人数大增，每天到祈祷的时候，清真寺传出的唤拜声不绝于耳，银行、商店、学校的活动都停下来，让人们参加祈祷；男女青年们又纷纷穿起了传统服装；没有利息的伊斯兰银行受到人们的欢迎；一些国家实施或恢复了伊斯兰法律，禁酒、禁赌、禁西方式娱乐.....

许多国家在政治上也日益“伊斯兰化”。政府在实施内外政策时，都大量使用伊斯兰教语言，依靠宗教权威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而各国的政治反对派也利用伊斯兰教来攻击和反对政府，争取人民的支持。政府与反对派的“竞争”使伊斯兰教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

国际性伊斯兰教活动也在明显增多。穆斯林国家之间除了在政治、经济方面开展合作外，在宗教、文化、教育、社会发展等方面也加强了来往。一年一度的麦加朝觐活动成了各国穆斯林之间交往的盛大聚会。每年200多万穆斯林在朝觐季节云集麦加，其场面既宏伟又壮观。世界上穆斯林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尤其是在非洲、东南亚和欧美发展得很快。

.....

十多年过去了，到90年代的今天，这股“伊斯兰潮”不仅没有平息，而且还在继续涌动，继续高涨：

1990年初，苏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通过军事政变完全掌握了政权，它“对内全面伊斯兰化，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被称为是“非洲的伊朗”；

1992年4月，在经过14年的浴血战斗后，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游击队最终夺取了政权，已使阿富汗成为了一个原教旨主义派别掌权的国家；

1992年初，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在全国大选中获得多数人支持，几乎取得了国家政权；

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黎巴嫩的“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成了坚持同以色列战斗的主要力量；

前苏联解体后，伊斯兰文化和宗教思潮在中亚地区迅速复苏，许多伊斯兰国家在中亚地区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大竞争”；

1993年，在伊斯兰口号下的暴力浪潮再次席卷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北非国家，并波及到美国、欧洲等西方世界；

.....

许多人被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弄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们不明白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搅动了中东地区，搅动了整个伊斯兰世界，激起了当地人民如此激烈和狂热的感情。他们也难以理解为何这股潮流竟有如此巨大的能量，能对这么多的国家和这么多的人民产生如此猛烈的冲击。

世界各国的新闻界、政治界、学术界也纷纷迅速开展了对这一现象的报道和研究，政治家、分析家、记者和学者们用各种各样的名词来描述和称呼它，“宗教激进主义”、“伊斯兰的再生”、“伊斯兰的复活”、“泛伊斯兰主义”、“好斗的伊斯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复兴”，等等。自70年代后期以来，一本又一本关于伊斯兰教的著作在许多国家出版，人们用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解释、研究这一现象。

在我国也不例外，一些研究国际问题、宗教学、民族学的专家、学者从一开始就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密切的关注，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研究。新闻界也对伊斯兰世界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作了详细的报导。

但是，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和研究始终只局限在少数人中，大多数中国人对它虽有所闻，却知之不多。我国的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对西方国家的开放，而是对包括伊斯兰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开放。在整个世界已越来越多地联为一体的今天，如果我们对发生在占世界 1/4 的伊斯兰世界的这一切却不甚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编写了这本《当代国际伊斯兰潮》，希望它能对我国国内的普通读者了解国际伊斯兰活动有所帮助，使我们对今天这个迅速变化和发展着的世界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 21 世纪的历史走向。

本书的前三章主要是介绍当代伊斯兰世界的基本情况，以及 70 年代末以来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第四、五两章着重介绍和分析当代伊斯兰运动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问题；最后一章叙述当前伊斯兰潮的发展情况和趋势，并对这一重大的国际问题进行概括性的分析和总结。



# 目 录

<b>第一章 历史的回声</b> .....	1
穆罕默德、《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教 .....	2
西方的冲击与伊斯兰世界的衰落.....	6
伊斯兰复兴的先声 .....	12
哈桑·班纳和穆斯林兄弟会 .....	16
伊斯兰与民族主义 .....	21
伊斯兰社会主义 .....	24
<b>第二章 重返伊斯兰</b> .....	29
今日伊斯兰世界 .....	30
新泛伊斯兰主义 .....	33
一个伊斯兰王国的崛起 .....	37
宗教精神的勃兴 .....	42
回归伊斯兰 .....	46
宗教政治化——伊斯兰复兴的归宿 .....	51
<b>第三章 大潮初起</b> .....	54
震撼世界的伊朗伊斯兰革命 .....	55
沙特萨达特之死 .....	60
麦加大清真寺事件 .....	67
阿富汗——红星与新月的战斗 .....	74
耶路撒冷之争 .....	79
卡扎菲的“伊斯兰文化革命” .....	85

这里，伊斯兰在静悄悄地复兴 .....	91
伊斯兰复兴运动总览 .....	95
<b>第四章 真主之路</b> .....	100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	100
当代第一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家——毛杜迪 .....	105
阿拉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灵魂——库特卜 .....	109
从宗教学家到国家领袖的霍梅尼 .....	114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 .....	119
谁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	122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还是政治？ .....	131
<b>第五章 圣战！圣战！</b> .....	135
吉哈德——伊斯兰的圣战 .....	135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及其分支组织 .....	139
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 .....	144
令西方人谈虎色变的“真主党” .....	149
异军突起的“哈马斯” .....	154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海湾战争 .....	162
苏丹：以伊朗为样板 .....	166
<b>第六章 走向 21 世纪的伊斯兰</b> .....	174
《撒旦诗篇》引起的轩然大波 .....	175
中亚争夺战 .....	181
新一轮伊斯兰潮的冲击 .....	187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国际化 .....	192
伊斯兰潮的蔓延 .....	197
对伊斯兰大潮的思考 .....	204
<b>后 记</b> .....	211

## 第一章

# 历史的回声

伊斯兰教与佛教、基督教一起被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与佛教和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教又是一种年轻的宗教，因为佛教、基督教分别已有 2500 年和 2000 年的历史，而伊斯兰教从诞生到现在只有 1300 多年。

纵观世界，人类社会发展到 20 世纪的今天，科学先进，文化昌明，总的来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宗教，其影响和作用正在逐渐消退。然而，伊斯兰教在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却表现出一种截然相反的趋势，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呈现出一派勃兴的势头，对这些地区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许多人把当代伊斯兰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兴起称为“伊斯兰复兴”。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社会政治运动都是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的，同样，伊斯兰教在当代的“复兴”也不是偶然的，它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同时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因此，在谈当代伊斯兰政治社会运动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些伊斯兰教的基本知识，并简单地回顾一下伊斯兰教的历史。

## 穆罕默德、《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教

“伊斯兰”在阿拉伯语中是“服从”或“顺从”之意，也就是顺从真主的意志。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被称为“穆斯林”，即“顺从者”。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是被穆斯林称为“先知”或是“圣人”的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于公元 570 年出生在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当时流行于阿拉伯半岛的是多神教信仰和偶像崇拜，人们崇拜太阳、月亮、星辰等自然神，也崇拜自然界中的各种精灵，如一块石头、一棵树、一眼泉水，都可能是人们崇拜的对象。麦加人相信有许多神灵，并认为有一个叫做“安拉”的神是他们的主神。穆罕默德 30 多岁以后，经常到麦加城外的希拉山洞里去静坐冥思，考虑各种宗教和社会问题。相传，在他 40 岁那一年（即公元 610 年），当他正在希拉山洞静默沉思之际，忽然感到神志朦胧，精神恍惚，眼前突然出现了大天使伽百利（又译吉卜利勒、哲布勒伊来）的幻影，继而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读吧！”穆罕默德说：“我不会读。”于是，大天使就念道：“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的东西。”穆罕默德照念了一遍，这位天使的幻影便消失了。穆罕默德如大梦初醒，但这从天而降的“安拉的启示”却深刻地铭记在了他的心中。这就是伊斯兰教的第一段启示。在此后的 23 年里，穆罕默德就不断地接受到这种来自安拉的启示。

穆罕默德相信真主已差遣他到这个世界来执行真主的神圣使命，并把一个“永恒的真理”告诉人们，这就是：万物

非主，唯有安拉是真主，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万物皆属于安拉，一切都要顺从于安拉的旨意。穆罕默德开始向他周围的人们传播这种新宗教。最初传教的范围只局限于他的家人和密友，后逐渐扩大到麦加的群众中。

他传播新宗教的活动受到了当地贵族和富商的敌视，并对他和他的追随者进行了迫害。为了躲避这种迫害，622年7月穆罕默德带领其信徒们迁移到麦加以北400公里处的麦地那，在那里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穆斯林社团（被称为“乌玛”）。这次被称为“希吉拉”的迁移，对伊斯兰教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所以，这一年后来就被定为伊斯兰教历纪元的开始。在麦地那，穆罕默德本人既是宗教领袖，又是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同时还是最高法官。他组织了军队，与麦加贵族进行较量，并向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传播伊斯兰教。据记载，他与麦加贵族之间的大小战役共65次。公元628年，穆罕默德兵临麦加城下，麦加贵族被迫妥协，双方订立了侯达比亚和约。

630年，穆罕默德率领十万大军开进麦加城，把克尔白古庙中的偶像全部捣毁，只保留了一块黑石，把古庙改为清真寺。从此，麦加成为了穆斯林的第一圣地和精神中心。到631年，整个阿拉伯半岛已统一到伊斯兰教的旗帜下。穆罕默德带领其弟子们到麦加作了他的最后一次朝拜，在阿拉法特山十万人集体礼拜的盛大庆典上，他传授了真主的最后一段启示：“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次年，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病逝，终年63岁。

关于穆罕默德，穆斯林相信他是真主的使者，是真主派

遣的许多先知中的最后一位先知，他有着高尚的品格和非凡的能力。但同时，他也是血肉之躯，有父母和妻子儿女，因而他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神，因为这在《古兰经》已明确记载：“你说，我（指穆罕默德）只是像你们一样的一个人。”（第18章第111节）伊斯兰教还强调说，穆罕默德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因此他不可能自己编造出那千古流传、永世不衰的《古兰经》。伟大的《古兰经》完完全全是真主的语言，只是通过穆罕默德之口传给了世上的人们。

穆罕默德每次接到真主的“启示”后，就把其内容口述给他的弟子，让会写字的弟子记录下来，让不会写字的用心记下来，并能背诵。穆罕默德去世后，他的一些弟子也相继去世或阵亡了。为了使这些启示不致失传，第一任哈里发（先知的继承者）艾卜·伯克尔下令收集和整理这些记录在羊皮、石板、兽骨上的启示，并用背记的内容进行核对。到650年；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在位时，收集和整理工作全部完成。这些汇编成集的启示就是伊斯兰教的传世经典——《古兰经》。对于穆斯林来说，《古兰经》是他们全部的生活准则。《古兰经》中不仅包括了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穆斯林的宗教义务，而且还包括了伊斯兰社会的伦理规范，以及穆斯林社团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由于《古兰经》是如此的神圣，直到本世纪初穆斯林还禁止把它译为阿拉伯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现在《古兰经》虽然已被译为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文字，但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在礼拜祈祷时仍必须用阿拉伯语背诵《古兰经》的一些章节。

除《古兰经》外，穆罕默德的弟子们还把他处理各种问题的言行收集起来，编纂成册，以便在解决政治、经济、法律和道德等问题时，以穆罕默德生前的先例作为依据。这样，

便产生了《圣训》(也译为“逊奈”或“哈底斯”)。《圣训》主要分为三类:语言,即穆罕默德的谈话和对别人提问的解答;行为,指穆罕默德做过的事和他的固定习惯;默认,指穆罕默德在场时未制止而默许的其弟子的言行。《圣训》是伊斯兰教中仅次于《古兰经》的权威经典,也是对《古兰经》的补充和说明。

《古兰经》和《圣训》都规定禁止画人和动物的图像,也不允许制作穆罕默德的画像或塑像。这一方面表明了伊斯兰教对偶像崇拜的完全否定,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先知穆罕默德的伟大和尊严。因为在穆斯林看来,无论什么光辉形象,都不可能体现出穆罕默德的神圣和伟大。所以,在所有的清真寺里,在任何伊斯兰的经书和史书上,以及在当代穆斯林的报刊影视上,都看不到穆罕默德的人物形象。

为了把各个不同地区的穆斯林团结在一起,穆罕默德还立下了伊斯兰教最基本的五项义务,在中国被称为“五功”,即念、礼、斋、课、朝。

念,就是念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也被称为念作证词:“除安拉外,再没有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是对信仰伊斯兰教的表白。礼,即礼拜。教义规定,穆斯林每天要作五次祈祷。穆斯林的礼拜有一套固定的程序,如拜前要清洗自己的身体,祈祷时必须面向麦加。每星期五还要到清真寺进行集体礼拜,称为聚礼,或“主麻”。斋,就是斋戒,规定每年在伊斯兰教历的九月(赖麦丹月),穆斯林从日出到日落都不食不饮。课,就是天课、施舍,阿拉伯语叫做“扎卡特”。它原是一种施舍济贫的行为,后发展为一种包括货币、牲畜、谷物或其他物品的宗教税。朝,就是朝觐。伊斯兰教义规定,每个成年穆斯林,凡是身体健康和有条件者,一生

中至少要到圣地麦加的“天房”朝觐一次。凡朝觐过的穆斯林就可获得“哈吉”的称号。

除了五项基本义务外，伊斯兰教还对穆斯林的生、丧、嫁、娶和饮食、起居都作了种种规定。在某些伊斯兰教派中，还规定为宏扬、传播伊斯兰教而进行努力和奋斗（吉哈德，也被称为“圣战”）也是穆斯林的一项义务。

伊斯兰教不仅告诉了穆斯林要相信真主、使者和来世，而且还告诉了他们应该如何尘世间生活，以求得真主的喜悦。也就是说，教义为穆斯林规定了个人的行为准则和社会活动的规范。所有的规定和戒律都汇集在被称为“沙里亚”的法典中，因此，沙里亚就是根据宗教原则制定的法律。它不仅涉及宗教礼仪和习俗，而且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家庭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由真主降示的《古兰经》和记录穆罕默德言行的《圣训》是不可更改的，但由教法学者们编纂的沙里亚法典则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

## 西方的冲击与伊斯兰世界的衰落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时，他已基本完成整个阿拉伯半岛的统一。他的继任者随后领导穆斯林开始向外开拓发展，向其他民族传播伊斯兰教。到8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已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建立起了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其疆域从西边的大西洋起，包括了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和欧洲的西班牙，越过整个西南亚，一直达到印度西北部和中国边境。伊斯兰教也得到了迅速广泛的传播，许多不同的民族都接受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成为了信仰人数仅次于基督教的世界第二大宗教。



关于伊斯兰教的传播，西方人与穆斯林的解释是完全不同的。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伊斯兰教的传播纯粹靠的是武力征服，说“穆罕默德一手拿着《古兰经》，一手拿着宝剑，在基督教和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他的王位”。（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而穆斯林学者则称，伊斯兰教是不允许强迫其他人改变信仰的，《古兰经》明确规定“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在阿拉伯帝国统治下，其他非伊斯兰民族在缴纳人头税后可以保持他们原来的宗教。穆斯林认为，许多民族改信了伊斯兰教，是因为伊斯兰对他们产生了吸引力。他们举例说，阿拉伯大军从未到达过东南亚、中国等地，但这些地方后来都有人数众多的穆斯林；他们还举例说，中世纪时突厥人和蒙古人曾是中亚和西亚的征服者，他们都先后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接受了伊斯兰教，这些都只能说明伊斯兰教本身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不管怎么说，从9世纪到13世纪，伊斯兰教发展到了它最辉煌的鼎盛时期。包括哲学、文学、医学、建筑、艺术等许多领域的伊斯兰文化空前繁荣，对欧洲、南亚、中亚等地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对中世纪的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自13世纪后，“伊斯兰世界进入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停滞时期”。从11世纪至13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发起了对伊斯兰世界长达200多年的“十字军东征”。13世纪初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又进行了“西征”，蒙古骑兵的铁蹄横扫整个中亚和西亚地区。繁荣的伊斯兰文化受到极大的摧残，伊斯兰教的迅速发展也受到了遏制。直到16世纪出现了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什叶派伊朗人建立的

萨法维王朝和印度穆斯林建立的莫卧儿王朝之后，一度衰落的伊斯兰世界才又重新兴盛和强大起来。

但是，伊斯兰中兴的好景不长，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后，欧洲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开始向外大规模进行殖民扩张。处于东西方之间的伊斯兰世界首当其冲地成了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目标。在欧洲殖民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落后的伊斯兰世界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防守地位。1798年，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登陆，标志着伊斯兰世界全面衰落的开始。到了19世纪末，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先后沦为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欧洲人成了伊斯兰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宰。他们人为地划分出一块又一块地区，作为自己的统治地域和势力范围。于是，地图上出现了伊拉克、利比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索马里等许多以前不存在的国家。从荷兰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埃及，到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统治下的北非，各穆斯林国家不仅丧失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在思想和文化上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欧洲殖民主义者除了从人力和资源上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疯狂的掠夺外，还不遗余力地进行思想和文化方面的侵略。伊斯兰教被说成是一种“野蛮和愚昧”的宗教。他们并且派出了许多基督教传教士到中东、东南亚等地活动，开办了教会学校，竭力想使当地的穆斯林改信基督教。

当然，有着辉煌历史和强大生命力的伊斯兰教是不甘沉沦的。为了维护伊斯兰教的价值和尊严，穆斯林曾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反抗和斗争，如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宗教运动，波斯的巴布教派运动，苏丹的

马赫迪运动，阿富汗的抗英斗争，以及土耳其奥斯曼苏丹哈米德二世倡导的泛伊斯兰活动等。但是这些活动或是以失败告终，或是局限于某一地区，未能对整个伊斯兰世界产生较大影响。正如一位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历史学家赛义德·马茂德所说的：“19世纪是伊斯兰教的昏暗时期。其间，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都已开始崩溃。西方与伊斯兰教之间的长期斗争，似乎已经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

从伊斯兰教本身来看，近代以来它也处于一种僵化和停滞的状态之中。中世纪形成的复杂繁琐的教义取代了伊斯兰教早期简单明快的教义。伊斯兰教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被淹没在冗长琐碎的教法条文、固定不变的礼仪习俗和浩繁呆滞的典籍教条之中了。传统的宗教阶层（乌勒玛）越来越依附于国家的世俗统治者。人们的思想被禁锢于固定的思维模式之中，伊斯兰教早期的活力逐渐丧失。例如，最著名的开罗爱资哈尔清真寺的大穆夫提（教法阐释者）19世纪后期在颁发的一项法特瓦（教令）中宣布，只有四个正统的教法学派（即在中世纪形成的哈乃斐派、马立克派、沙斐仪派和罕百里派）才符合伊斯兰教，“背离这四个教法学派就意味着希望生活在错误之中”。他坚决反对穆斯林进行“伊智提哈德”（独立判断或推理），他称“伊智提哈德的光辉早已消失，当今已没有谁能够具有这样的学识。认为自己能够独立作出判断的人将会受到他的幻觉或魔鬼的影响”。

从20世纪初开始，各穆斯林国家开始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艰难斗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地区的穆斯林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但长期的殖民统治和掠夺，使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非常低下。如阿富汗、也门、索马里等

穆斯林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列。即使有少数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利比亚等，因有石油资源而较富裕，但它们的富裕是一种畸形的发展，经济结构非常单一，对外依赖相当严重，被称为“站不起来的富翁”。这一切与昔日伊斯兰世界的繁荣和强盛，以及它在世界上所处的领先地位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伊斯兰世界衰落的另一个方面是世俗化的发展。

在伊斯兰教的早期历史中，是没有宗教和世俗之分的。因为伊斯兰教被认为是一种完善的宗教，它不但规定了人与神（真主）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宗教领袖就是国家的领导人。宗教的教规也就是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制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们的衣食起居、言谈举止都属于伊斯兰教的一部分。后来虽然出现了政治和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分离，但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并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

在西方殖民统治时期，殖民主义者用枪炮、用武力把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政治、法律制度带进了一些穆斯林国家，强迫这些国家放弃传统文化，接受西方的东西。而另外有的国家看到西方的强大，认为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是优越的，从而主动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文化、思想、制度，以替代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和社会制度。一批批年青人被送到欧洲去学习，或者接受欧洲式的军事训练。当这些人带着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并成为本国有社会地位和影响的人物后，西方化、世俗化也就开始在伊斯兰世界发生了。

穆斯林各国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有一种起源于西方的政治思想在伊斯兰世界广为流传，这就是

民族主义思想。民族主义的目标是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并保持具有一定地域范围的民族国家。这种思想认为，构成一个民族的主要因素是这个民族的共同历史、文化、语言和血缘、地域联系，而宗教并不被看作是构成民族的主要的因素。在20世纪前期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民族主义成了伊斯兰世界的主要的政治思潮，诸如阿拉伯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波斯民族主义，甚至范围更小的、以地域为特征的民族主义，如埃及民族主义、伊拉克民族主义很流行。传统的伊斯兰教虽然也在斗争中发挥作用，但却是处于很次要的地位，甚至干脆被抛弃了。

在世俗化道路上走得最快和走得最远的国家是土耳其。

土耳其是原奥斯曼帝国的核心部分。从16世纪到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其统治者苏丹在名义上还是哈里发，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宗教领袖。到本世纪初，在外有欧洲殖民侵略，内有地方割据的打击下，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了。1919—1923年民族主义者凯末尔领导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在原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在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凯末尔看来，传统的伊斯兰教是阻碍土耳其共和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一个巨大障碍。于是，他挟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余威，运用铁的手腕，向伊斯兰传统势力宣战。在革命后的几年里，新政权实行了一系列世俗化改革，如取消宗教基金部，关闭宗教学校，撤销宗教法庭，废除伊斯兰教法，代之以模仿西方法律制订的民法、刑法和商法。同时，土耳其政府还采取措施，实行政教分离。1924年，议会废黜了最后一任苏丹—哈里发，并宣布取消在伊斯兰世界实行了1300多年的哈里发制度。1928年，土耳其议会进一

步作出决定，从宪法中删除伊斯兰教为国教的规定。另外，土耳其政府还通过法令，进行社会习俗的改革，如禁止男子戴具有宗教色彩的红毡帽和女子戴面纱，改伊斯兰历法为公元历法，把休息日从星期五改为星期日，等等。政府还对宗教势力的反抗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到30年代初，原来伊斯兰教影响十分深厚的土耳其已俨然成了一个西方式的世俗国家。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批穆斯林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这些国家的领导者们也纷纷仿效土耳其的凯末尔，大力在自己的国家内推行世俗化改革。因此，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基本上是按照西方世俗的民族国家模式建立的。传统伊斯兰教在这些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都下降了。在一些世俗化发展较快的国家中，如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埃及等国，传统的伊斯兰教基本上已脱离了政治，主要表现为一种宗教事务和活动。一些人的宗教信仰也日趋淡漠，尤其是许多城市里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人们，祈祷、斋戒、朝觐等活动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多余的事。他们中有的人尽管还称自己为穆斯林，主要是他们觉得自己出生在穆斯林家庭，成长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具有穆斯林的观念；也有人则变成了世俗主义者，甚至是无神论者。

因此，伊斯兰教也与基督教、佛教一样，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西方化的冲击，它的盛衰消长成为各国伊斯兰教界及笃信者殚精竭虑终日思考的事情。

## 伊斯兰复兴的先声

尽管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在西方的冲击下衰落了，但有1300多年历史的伊斯兰教却是不会从此消亡的。从19世纪

下半叶开始，一些穆斯林政治家、思想家开始了探索“复兴伊斯兰”的道路。他们中有以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为代表的泛伊斯兰主义者；以穆罕默德·阿布杜和赛义德·艾哈默德汗为代表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以拉希德·里达为代表的“萨拉菲亚”（复古或先辈）运动；以及其他各种改良主义者等。这些人是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中第一批重新对伊斯兰教进行认真思考的人。他们的目的都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恢复和加强伊斯兰教在政治中的作用和社会中的地位，重新恢复它的活力，使之能在当代世界中与西方势力相抗衡。

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9—1897）出生于阿富汗，青年时代在阿富汗和伊朗接受了伊斯兰传统教育，后又到印度学习，开始接触欧洲的现代教育和科学知识。他曾担任过阿富汗首相，后来又辗转于土耳其、埃及、印度、伊朗、伊拉克等地，并到过英国、法国、俄国，致力于泛伊斯兰政治活动，称得上是一位“伊斯兰国际活动家”。阿富汗尼先后接触过土耳其苏丹、埃及国王、伊朗国王等伊斯兰世界的头面人物，并曾得到过重用，担任过一些重要的职务。他还在埃及著名的爱资哈尔大学任过教，培养了许多学生；他还创办过一份阿拉伯文周刊《团结》，宣传他的泛伊斯兰思想。

由于阿富汗尼的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伊斯兰世界，并到过欧洲，熟悉近代西方政治和社会，因此他能够比较清醒和全面地认识当时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危机。早在19世纪中期，阿富汗尼就明确指出：“整个伊斯兰世界，而不仅仅是它的这一部分或者那一部分，都已受到了强大的、咄咄逼人的西方势力的威胁。”他主张，穆斯林不能再使自己被分为一些孤立的“民族”或“国家”，而应该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实体，以求伊斯兰世界的生存和振兴。他说，伊斯兰一度是很伟大

的，如果不让欧洲把自己踩在脚下，伊斯兰还能重新变得伟大。伊斯兰必须抵抗，因为它能够抵抗。抵抗的方法是在每一个穆斯林国家里实行改革，以图自强，然后把这些国家联合在一个伊斯兰联邦或邦联之内。他提出的口号是：“全世界的穆斯林，联合起来！”

他还是最早提出穆斯林必须学习现代科学知识，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的人。他认为不改变穆斯林的思想，伊斯兰世界就不可能强大，他常引用《古兰经》中的一段话说：“人们只有先从内心改变他们自己，安拉才会改变他们。”阿富汗尼终身致力于泛伊斯兰思想的宣传和实践，足迹几乎遍布整个伊斯兰世界，对近现代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认为是近代第一位伟大的伊斯兰思想家和政治家。

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学生，是世纪之交时穆斯林世界的又一杰出思想家。他出生于埃及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因参加过阿拉比的反英起义被埃及当局流放国外。他在巴黎曾协助他的老师阿富汗尼主办《团结》周刊，宣传泛伊斯兰主义。1888年，他回到埃及，曾任教爱资哈尔大学，后又担任了全埃及的大穆夫提（即伊斯兰教大法官）。在此期间，他对宗教进行了改革，系统地提出了伊斯兰现代主义的理论。阿布杜认为，伊斯兰教衰落的主要原因就是丧失了它早期的纯洁性和不断发展的活力。因此，他的宗教改革包括革除繁琐的宗教习俗，简化宗教礼仪，和制定适合现代社会的伊斯兰法律制度。

虽然阿布杜曾经是阿富汗尼的学生，但他在一些问题上与阿富汗尼的思想并不完全一样。例如对如何抵抗西方这个问题，阿富汗尼强调要发动穆斯林国家的统治者和人民起来进行武力的战斗，而阿布杜认为更重要的是发展教育，改革



传统宗教，从根本上增强穆斯林的力量。他对阿富汗尼提出的泛伊斯兰纲领也不是很热心，因此到了后来，他与阿富汗尼在政治上就分道扬镳了。在宗教思想上阿布杜特别强调“伊智提哈德”（独立判断或推理），也就是根据伊斯兰教精神进行独立的、理性的思想，以使伊斯兰教能不断适应现实情况的发展。由此出发，阿布杜提倡发展现代教育体系，鼓励穆斯林学习现代文化和科学知识，包括学习西方国家的某些法律和政治制度。另外，阿布杜还寄希望于一位“正义的专制君主”和一代新型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宗教职业者（乌勒玛）。阿布杜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对当代伊斯兰世界的影响非常深远，实际上，现在许多伊斯兰国家的政府都是以现代主义的态度来制定和实施其内外政策的。

拉希德·里达（1865—1935）是叙利亚人。他是阿布杜的学生，但在伊斯兰政治思想方面，他却比阿布杜更加激进。他认为，应该抛开现在的一切，回到先知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早期的先辈（萨拉菲亚）那里去寻找伊斯兰教的真正精神，然后再把它们应用到当代社会之中。按照这一思路，里达构思了他理想中的现代“伊斯兰国家”的蓝图：完全按照《古兰经》和《圣训》建立的法律体系，一位由所有穆斯林选出来的、具有“伊智提哈德”（独立判断或推理）能力的国家领导者（被称为“哈里发”或是“最高伊玛目”），等等。他同时又指出，这样的伊斯兰国家并不排斥现代西方文明，乃至政党制度。虽然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拉希德·里达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只能算是一种“空想”。但在一定意义上，拉希德·里达的政治思想实际上已开创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原教旨主义的先河。

从阿富汗尼到阿布杜，再从阿布杜到里达，19世纪末20

世纪初出现了一批伊斯兰思想家，并掀起了一次对伊斯兰政治和社会思想进行探索和再思考的高潮。这些近代的穆斯林思想家的方法和目标虽然不一样，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提倡独立思考 and 判断，摆脱各种繁文缛节，把理性思维重新引入伊斯兰教。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家阿布杜认为他自己一生的目的“就是要使思想从因袭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依据伊斯兰教的本来精神来理解它，“在获得宗教知识的过程中反溯它最初的源泉，并以人类理性的尺度对它加以衡量”。

这些伊斯兰改革家们是“双刃剑”，一方面他们的锋芒指向外来的西方势力，另一方面他们也反对伊斯兰世界内部因循守旧的保守力量。由于时代的限制和其他各种原因，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达到所预期的目的。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活动基本上仅仅限于国王苏丹、达官显贵、宗教上层以及知识阶层，而没有能够深入到下层穆斯林群众中。但是，正是他们领导的这些思潮和运动使许多穆斯林的宗教政治意识开始觉醒，在一定程度上使伊斯兰教得以振兴，从而几个世纪以来停滞不前的伊斯兰教思想界出现了新的活力和生机，并为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 哈桑·班纳和穆斯林兄弟会

要谈当代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社会运动，就不能不首先了解一下本世纪 20 年代在埃及出现的“穆斯林兄弟会”。

许多世纪来，埃及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中心。西方殖民势力自 18 世纪末侵入埃及，到 1882 年，埃及正式成为了英国的“保护国”，开始处于英国直接的殖民统治之下。到本世纪初，西方影响已深深地渗透入埃及人的

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中了。在一些穆斯林看来，埃及社会已腐败了，它已成了一个世俗的、物质的和非伊斯兰的社会了。持这种看法的人中就有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建者哈桑·班纳（Hasan Banna 1905—1949）。

哈桑·班纳出身于一个传统的宗教家庭，他父亲曾在爱资哈尔大学学习过，是当地清真寺的领拜人和宗教教师。班纳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在苏伊士的伊斯梅利亚任小学教师。他本人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而且深受激进的伊斯兰思想家拉希德·里达的影响。他对埃及社会受西方影响而“世风日下”深感不安。面对世俗化和西方化在埃及的发展，班纳认为，当代埃及的青年们继承的伊斯兰教是一个“腐败的宗教”，他们的思想中充满了“疑问和困惑”。在他看来，世俗教育、模仿西方的法律制度、形形色色的政治党派以及社会上日益流行的西方生活方式等等，都是对伊斯兰教的侵蚀。针对这种趋势，他在1928年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建立了“穆斯林兄弟会”，阿拉伯语叫做“伊赫万”，这个名称取自《古兰经》中“穆斯林皆兄弟”的箴言。他们想通过这样一个组织来逐渐清除外来影响，纯洁社会和人们的思想，并最终建立一个完全符合《古兰经》原则的伊斯兰政府。

穆斯林兄弟会开始时是一个非暴力的宗教组织，旨在通过研究和讨论，交流和宣传，来维护和宏扬伊斯兰教义和精神。哈桑·班纳早期的活动也只是在清真寺、咖啡馆等地向一些年轻人宣讲教义。兄弟会后又开展了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建立了一些学校、文化俱乐部，并组织成员进行互助，发展慈善事业。到30年代后期，在反对英—埃条约的斗争中，穆斯林兄弟会逐渐开始走向政治化。哈桑·班纳在一系列讲演和文章中阐明了他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1. 伊斯兰教的包容性。他说：“伊斯兰具有广阔的意义，它不同于人们的狭隘理解，因为我们相信，伊斯兰无所不包，它涉及生活的一切方面。”它可适用于任何时代以及任何地方。他在穆斯林兄弟会1938年出版的第一期《向导》上写道：“伊斯兰是崇拜和领导，宗教和国家，精神和行动，祈祷和奋斗，服从和统治，古兰经和利剑。两个方面是互相不可分开的。”

2. 强调伊斯兰教的原旨教义。班纳认为伊斯兰只来自两个最根本的源泉，即《古兰经》和《圣训》，并认为伊斯兰教适用于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他在演说中说：“伊斯兰制度应用最初的源泉来浇灌……我们要站在先知们的立场上，避免用同真主不同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

3. 坚持伊斯兰教的统一性和哈里发制度。班纳说：“伊斯兰是信仰和崇拜，是祖国和民族。所有的穆斯林是一个民族，伊斯兰祖国是一个国家。”他还在1938年兄弟会第5次大会上说：“穆斯林兄弟会认为，哈里发是伊斯兰统一的象征，是伊斯兰各族相互联系的标志。这是伊斯兰教的礼仪，所有穆斯林都要尊重它。”

穆斯林兄弟会对手工业者、农民、小职员和小知识分子等下层群众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对现实不满，而他们本身受西方影响也最少，最容易接受这种简单明了的伊斯兰教宣传。因此，穆斯林兄弟会的发展很快。1933年兄弟会在开罗建立了总部，在全国50个地区建立了分支组织。兄弟会的成员们聚集在一起祈祷，听他们的领导人的谈话。每5至10个人组成一个最基本的组织——“家庭”，“家庭”中的成员以兄弟相称。由“家庭”又组成“家族”，“家族”之上有“队”，由“队”又组成“团”。后来，兄

弟会还建立了一些秘密组织。兄弟会的最高领导称为总训导师，哈桑·班纳一直担任总训导师。

40年代后期穆斯林兄弟会达到了全盛时期，它的成员在埃及已达50万人左右，5000个分支组织遍布社会各阶层，并建立了它自己的武装。它还先后在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苏丹等地建立了分支组织。到此时，兄弟会的目标已非常清楚——把埃及建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它还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先知是我们的向导，为真主而光荣献身是我们最崇高的理想。”

兄弟会开始与埃及法鲁克国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国王希望利用传统色彩浓厚的兄弟会来与一度执政的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对抗，而兄弟会也希望依靠国王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兄弟会的军事实力进一步得到加强。战后，它的许多成员作为志愿人员参加了1948年5—6月反对以色列的第一次中东战争。此时，它不但有自己的武装，而且还拥有自己的工厂、公司、学校、医院……俨然成了埃及的一个国中之国。

兄弟会力量的迅速上升和实行社会伊斯兰化的要求引起了王室和政府的不安，他们担心兄弟会继续发展下去将威胁国家政权的存在，于是决定采取镇压措施。1948年底，埃及政府借口查获了兄弟会颠覆活动的证据，逮捕了兄弟会的一些领导成员。12月政府首相努克拉希下令取缔兄弟会组织，禁止它的一切活动，并没收了它的财产。兄弟会决心进行报复。不久后，努克拉希就被一名兄弟会成员刺死。而兄弟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哈桑·班纳也于1949年2月在开罗被政府派人暗杀。

法鲁克国王政府的镇压，使兄弟会遭到了自成立后的第

一次严重打击，它从此走上了与国王政府对抗的道路。1950年埃及政府取消了军事管制，穆斯林兄弟会又在新的总训导师胡代比的领导下恢复了活动。1952年埃及的自由军官组织开始密谋推翻法鲁克国王政府，由于穆斯林兄弟会人多势众，自由军官组织也与兄弟会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兄弟会的支持。1952年7月23日，自由军官组织政变成功，建立了埃及共和国。革命后，以纳吉布为首的革命指挥委员会解散了所有政党，但穆斯林兄弟会却没有被禁止，当局称兄弟会只是一个宗教组织而不是一个政党。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不少人与兄弟会关系密切，纳吉布还亲自瞻仰了哈桑·班纳的坟墓，以示对这位兄弟会创始人的敬意。自由军官组织还给了穆斯林兄弟会三个内阁部长的职位。

当1953年底纳赛尔取代纳吉布掌握实权后，穆斯林兄弟会与埃及革命政府之间开始出现了裂痕。纳赛尔政府推行的土地改革、发展世俗教育等措施受到了兄弟会的反对，而兄弟会希望政府实施伊斯兰法的要求却被纳赛尔拒绝。1954年10月，一名兄弟会成员在亚历山大一次群众集会上对纳赛尔行刺，但未成功。纳赛尔立即对兄弟会进行了无情的镇压，6人被处死，4000多人被投入监狱。其他几千名兄弟会成员逃到了叙利亚、约旦、沙特阿拉伯、黎巴嫩等地。这次打击使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后来经过十多年才恢复过来。但也正是在这一次镇压行动之后，那些外逃的兄弟会成员把这个组织带到了其他阿拉伯国家，使穆斯林兄弟会真正成了一个国际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

穆斯林兄弟会作为当代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个下层群众性的宗教政治组织，对后来伊斯兰运动的全面兴起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重大和深远的。

## 伊斯兰与民族主义

在早期伊斯兰教中，是没有“民族”或者“国家”概念的，所有的信教者（穆斯林）在一起共同组成一个“乌玛”（umma）。所谓“乌玛”也就是由先知穆罕默德及其之后的哈里发领导穆斯林社团，它的基础是对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不受语言、地域、种族的限制，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都是乌玛的成员。人们后来也把这种乌玛叫作“穆斯林民族”、“穆斯林国家”或是“穆斯林共同体”。

开始时，乌玛中只有阿拉伯人，后来随着伊斯兰教的迅速传播，波斯人、埃及人、柏柏尔人、突厥人等接受了伊斯兰教的其他民族也都成了乌玛的成员。但是，乌玛又不完全等于国家。在穆斯林征服的地区内，有一些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不愿改变自己的信仰，他们缴纳人头税后可以保持他们原来的宗教，生活在穆斯林统治的国家里。虽然他们是穆斯林国家的臣民，但却不能算乌玛的成员。而在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传到某些遥远的地区，当地接受了伊斯兰教的居民虽然不生活在穆斯林国家内，但从理论上说，他们也是乌玛的成员。

实际上，真正作为一个具体的、有形的穆斯林共同体的乌玛，在历史上只存在了很短暂的时间。穆罕默德去世后不久，穆斯林内部便出现了分裂，产生了哈瓦利吉派、什叶派、逊尼派等伊斯兰教派。即便在鼎盛一时的阿拉伯帝国时期，帝国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派系斗争、民族矛盾和地方割据势力。在阿拉伯帝国之后，伊斯兰世界内部更是诸雄并立，战乱频仍。所以，自7世纪末以来的1300多年里，实际上就不曾再

有过统一的乌玛。然而，乌玛作为一种理想和目标，却始终存在于伊斯兰教义和穆斯林的观念之中，并对伊斯兰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着影响。共同的信仰起着一种无形的纽带作用，使穆斯林始终有一种共同感，特别是当受到异教势力侵略和威胁的时候，这种共同的宗教感情也就会变得更加强烈。

世界发展到近代以后，首先在欧洲出现了“民族”的概念。这种概念认为，凡是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有着共同的种族起源，生活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的人就是一个民族。而一个民族不应该受其他民族的压迫，应该拥有自己独立的国家，这种思想就被称为“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出现后，很快传播到世界各地。于是，世界上也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民族国家”，而一些受到别的民族统治和压迫的弱小民族也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进行反抗斗争，争取独立，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认为宗教与民族是没有关系的，一个民族内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可以许多不同的民族共同信仰同一种宗教。这样，在民族主义传入伊斯兰世界后，便与传统的伊斯兰教产生了冲突。因为，每一个穆斯林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应该忠于自己的民族，还是应该忠于自己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也就是说，忠于范围更大的乌玛。

虽然要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困难的，但是，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在各穆斯林国家却结合在了一起，这是因为：在反对外来敌人，维护自身的存在和价值这一点上，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

在各国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民族主义是主要的旗帜。伊斯兰教也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位美国学者戈弗



雷·詹森在其著作《战斗的伊斯兰》中说，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包含了大量的伊斯兰因素，如果没有伊斯兰教，这些民族争取自由斗争的胜利将推迟几十年。确实，无论在北非阿尔及利亚等国反对法国、意大利殖民统治的斗争，中东埃及、伊拉克反对英国的斗争，还是印度尼西亚反对荷兰殖民者的起义，阿富汗抵抗英、俄瓜分的战争，伊斯兰教都起到了组织和动员穆斯林的作用，斗争往往是在“圣战”的口号下进行的。

但是，在取得独立后，民族主义成了大多数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传统的伊斯兰教的政治功能已被削弱到最低的程度。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伊斯兰教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凯末尔、纳赛尔等民族主义领袖在动员和领导人民反击西方基督教势力时，往往以伊斯兰教的保卫者出现。但是一旦外患消除后，他们就在国内开始民族主义的世俗化改革，从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各个方面削弱伊斯兰教的影响，宗教势力受到压制。在许多国家里，伊斯兰教只被当作一种民族文化遗产来对待。如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纲领是“阿拉伯统一、自由、社会主义”，而伊斯兰教只被称为是“我们的先辈留下来的精神力量”。在50—60年代，当看到纳赛尔、布迈丁、苏加诺等民族主义领袖在大规模群众集会上振臂一呼、万众欢腾的场面时，许多人相信，伊斯兰教确实已经衰落了，它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国际关系中已不起多少作用了。一位伊斯兰历史学家希沙姆·沙拉比1966年写道：“在当代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已经完全被忽略了。”

然而，这个论断的作出却为时过早。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世俗化的斗争远未结束。事实上，由于伊斯兰教对穆斯

林的思想影响之深厚，穆斯林社会中宗教力量之强大，加上伊斯兰教过去的辉煌历史，在当代建立的这些穆斯林国家中，伊斯兰教与世俗化斗争只不过才刚刚开始。

## 伊斯兰社会主义

当 19 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广泛流传时，正是伊斯兰世界沦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时期。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在与宗主国的接触中，逐步了解和接受了形形色色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并把这些思想介绍到了伊斯兰世界。

后来，当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之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也有所扩大，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人们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伊斯兰世界各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希望。这一时期中，在伊斯兰世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有黎巴嫩的阿明·列哈尼（1875—1940）、埃及的撒拉马·穆萨（1887—1958）、突尼斯的塔赫·哈达德（1899—1935）等。但他们当时并没有把社会主义与伊斯兰教联系起来，而是完全把它作为一种西方的、世俗的意识形态介绍进来，因而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 20 多年里，社会主义思想在伊斯兰世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些思想家开始把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联系了起来。他们称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是互不排斥、互不对抗的，于是出现了“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提法。如印巴次大陆的乌巴德拉·辛迪便比较明确地提出穆斯林首先要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自己的国家，然后实行经济上的“公平原则”和“福利原则”，在分配中实行“各取所需”，极大地提高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活水平。这便是早期的伊斯兰

社会主义思想。

伊斯兰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体系并广泛传播，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此时，关于伊斯兰社会主义已有了一批著作，如哈里发·阿布杜·哈基姆的《伊斯兰教与共产主义》（1951）、沙里夫的《伊斯兰社会结构》（1954）、穆斯塔法·西巴伊的《伊斯兰社会主义》（1960）、赛义德·库特卜的《伊斯兰教的社会主义》（1961）等。这些著作都力图从理论上阐述伊斯兰社会主义，并把伊斯兰社会主义与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加以区别。西巴伊等人称，伊斯兰社会主义是伊斯兰教在危急存亡之际最有效的补救方法，它“代表着人类发展的趋势”。一方面由于这些著作的流传，另一方面受二战后全球社会主义运动高潮的影响，因此在50—60年代中，社会主义在伊斯兰世界成为了流行一时的政治思潮。

在这一时期，一批伊斯兰国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诞生。独立后的道路应该如何走，这是摆在所有这些新兴国家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问题。在经过短暂的摸索之后，这些民族国家的政治家们纷纷宣布以社会主义为治国纲领，要在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中推行社会主义路线。如巴基斯坦的奠基人真纳以及后来的布托、埃及的纳赛尔、伊拉克和叙利亚执政的复兴党、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利比亚的卡扎菲、索马里的西亚德、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和布迈丁等伊斯兰国家领导人，都先后明确宣布实行“社会主义”。

埃及的纳赛尔在1961年颁布了“社会主义法”，在全国开展土地改革和国有化运动。为了使政府推行的“社会主义运动”与伊斯兰教相协调，埃及宗教界的大穆夫提从教法上为社会主义进行了论证，宣布政府的各项社会主义政策是符

合伊斯兰教法的。巴基斯坦宗教界也从教法上为政府推行的“伊斯兰社会主义”进行了引经据典的论证。利比亚 1969 年革命后，明确宣布实行伊斯兰社会主义，并称“利比亚的社会主义是同伊斯兰教的教义紧密相联的，是根据利比亚社会的需要和性质而产生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复兴社会党提出的口号是“统一、自由、社会主义”。

那么，这种流行一时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呢？

由于伊斯兰各国在推行“社会主义”时并没有采取某种统一的形式，也没有一种为多数国家所接受的理论权威，所以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标准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模式。也就是说，尽管不少伊斯兰国家都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实际上它们是在根据本国的特点，各搞一套自己的东西。各国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中，由于领导人的更迭或者不同时期的需要，在做法上也有前后不一致的现象。但是，从多数国家的情况来看，当时流行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有这样几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主张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强调走“中间道路”，即走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伊斯兰社会主义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和剥削，提倡社会平等和人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合理分配社会财富，防止社会两极分化，禁止高利贷，鼓励施舍济贫。

第二，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永恒性。伊斯兰社会主义认为，它关心的是人的社会福利，人的个性解放和个人的发展。“宗教的社会主义并不消灭个性、个人的积极性以及个人的责任心。”这种思想反映在经济生活中则是保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伊斯兰社会主义准许私有制，它赋予人以自由施展才能之权，而竞争无疑是文化进步和成长的主动力量”。

第三，伊斯兰社会主义者反对无神论，称他们所追求的是信奉真主、信仰宗教的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者称，“我们心中的社会主义，就是起源于真正的伊斯兰教和《古兰经》的社会主义”。有人还说，“真正的社会主义种子产生于它的（即伊斯兰教的）教义之中”。

伊斯兰社会主义很强调它与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埃及总统纳赛尔在一次大会上谈到了伊斯兰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五大差别：

“第一个区别是，我们信仰宗教，马克思主义否认宗教，我们相信哈里发，马克思主义否定哈里发。第二个区别是，我们要从反动派专政过渡到全民民主，而马克思主义却要从反动派专政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第三个区别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土地国有化，我们没有规定土地国有化，我们相信在合作范围内的土地私有制。第四个区别是，共产主义不相信私有制，而我们相信私有制。但我们不相信剥削的私有制，我们正在消灭剥削的私有制。第五个区别是，马克思主义规定要通过暴力无情地消灭资产阶级或是我们所说的反动派，我们不这样做。我们要在不使用暴力消灭统治阶级的情况下，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和矛盾。”

1974年11月，《穆斯林文札》中登载了一幅图画，题名为《前进中的穆斯林》，很形象地描绘了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含义。在这幅图画中，大批穆斯林正在手持标语阔步前进。在队伍前列的横幅上写的是“伊斯兰教”，它左边的大横幅写的是“共产主义+真主=伊斯兰教”，右边的横幅写的是“资本

主义—利润=伊斯兰教”，后面的大量横幅写的是“伊斯兰民主”、“伊斯兰专政”、“伊斯兰民族主义”……在这些横幅中间则是一条“伊斯兰社会主义”。这幅图画清楚地向人们表明，他们要在扩大伊斯兰民主、伊斯兰专政、伊斯兰民族主义和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同时，巩固加强伊斯兰教信仰。而共产主义只要信仰真主，资本主义只要取消利润，也就与伊斯兰教等同起来了。

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一种兼顾了穆斯林文化和历史的世俗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兴伊斯兰国家反帝反殖，发展民族经济，发扬传统文化的愿望。但在实践中，它却没有获得许多人所料想的那种成功。它并未能解决这些新兴国家中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也没有给广大的穆斯林群众带来他们所期望的正义和公正。因此，它一方面受传统宗教界的反对，在另一方面又受到激进的世俗主义者的攻击。在流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到70年代便开始衰退了。

## 第二章

# 重返伊斯兰

在本世纪的前 50 年里，民族解放运动席卷伊斯兰世界，人们听到的最响亮的声音是民族主义的号召，伊斯兰教被淹没在民族主义运动的战斗呐喊声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伊斯兰世界中一批新国家的出现，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渐渐消退了。人们从战场回到田园，放下刀枪拿起工具，他们期待着民族主义领导人向他们许诺的公平、正义的新社会，和平、幸福、富裕的新生活。

然而，使他们失望的是，他们所期待的这一切并没有出现。相反，随着这些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人们看到，老的殖民主义者被赶走了，改头换面的新殖民主义者又来了，而且还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魔鬼”：贫困、失业、城市化、污染、吸毒、色情、暴力……人们又开始重新思考，重新采取行动。这一次，政治风向变了，社会思潮变了，伊斯兰世界的许多人选择了他们自己所熟悉和固有的东西——伊斯兰教。他们希望重返伊斯兰，回到自己的世界中去。于是，一场新的风暴又出现了，这便是“伊斯兰复兴运动”。

## 今日伊斯兰世界

“伊斯兰世界”是一个意义广泛的名词，也有人按它的人口构成而把它称为“穆斯林世界”。由于人们所处的角度不同，或是掌握的统计材料不同，对“伊斯兰世界”也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说它是一个政治实体，有人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宗教概念，还有人认为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地理范畴。这样，在具体划分时，一种意见认为，伊斯兰世界就是由所有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组成的国家群体；另一种意见认为，伊斯兰世界包括所有“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1971年成立）的成员国（其中有的国家穆斯林人口并不占人口多数）；也有的人把伊斯兰世界理解为不受民族或国家边界限制的某种地域范围；还有的人则认为，伊斯兰世界是无形的，它不受自然、地理和国家边界的限制，地球上任何地方的穆斯林都是伊斯兰世界的一员。但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伊斯兰世界在国际社会中都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有着巨大影响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现在多数人所说的“伊斯兰世界”，是一个把政治因素、人口因素和地理因素结合起来考虑的综合概念。到1990年，伊斯兰会议组织有46个成员，按穆斯林人口多少为序，它们是：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土耳其、埃及、伊朗、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阿富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马来西亚、也门、突尼斯、马里、乌干达、塞内加尔、喀麦隆、尼日尔、几内亚、布基纳法索、乍得、索马里、利比亚、约旦、巴勒斯坦、塞拉利昂、西撒哈拉、黎巴嫩、毛里塔尼亚、贝宁、科威特、阿曼、阿联酋、冈比亚、



吉布提、几内亚比绍、科摩罗、巴林、卡塔尔、马尔代夫、文莱、加蓬等。这些伊斯兰国家从非洲大西洋沿岸向东一直延伸到南太平洋地区，覆盖了北非、西亚、南亚和东南亚，面积共 2500 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 1/5。到 90 年代初这些国家的人口将近 9 亿。

但是，所有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在一起并不就等于伊斯兰世界。加蓬、贝宁等国家的穆斯林人口都不到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它们之所以成为了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有的是因为其国家元首或执政者是穆斯林，有的是为了得到伊斯兰国家的经济援助而加入这个组织的。而阿尔巴尼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穆斯林都超过了人口半数，但它们却没有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还有原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后，新成立的一些国家中穆斯林也占人口多数，它们也没有包括在伊斯兰会议组织中。另外，全世界还有相当数量分散在许多国家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他们也占了世界穆斯林人口很大的比例。例如，印度有 9300 万穆斯林，与巴基斯坦全国人口差不多，但他们在印度只占人口的 11%，中国穆斯林只占人口的 1.5%，但总数却达 1800 万，相当于伊拉克这样一个中等伊斯兰国家的人口。菲律宾、泰国、肯尼亚等国都有数百万穆斯林少数民族。据有关资料统计，到 90 年代初，全世界的穆斯林人口已超过了 12 亿。

伊斯兰世界中，有 28 个国家明文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或者是官方宗教，有的国家规定伊斯兰教是“国家的立法基础”，还有的在国名上冠以“伊斯兰”，如伊朗、巴基斯坦、毛里塔尼亚、科摩罗等国。

无论从历史起源和地理位置来看，还是从宗教及文化的影响来看，中东的阿拉伯国家都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阿拉

伯半岛不仅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和伊斯兰圣地麦加、麦地那的所在地，而且半岛上的沙特阿拉伯王国也是当代伊斯兰世界中最富有的国家，是许多伊斯兰活动的赞助者。连接亚、非两大洲的埃及有着伊斯兰世界最古老和最著名的爱资哈尔大学。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伊拉克的巴格达曾是阿拉伯帝国鼎盛时期的首都。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北非的一些国家构成了伊斯兰世界核心以外的重要的第二个层次，赤道非洲、中亚、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家是第三个层次，居住在其他国家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则构成了伊斯兰世界的外围。

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都是本世纪以来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成立的，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诞生的。近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给战后伊斯兰世界留下的是一派贫穷落后、四分五裂的景象。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着千差万别：这里既有土耳其、叙利亚等实现了政教分离的世俗化共和国，也有沙特阿拉伯、约旦和海湾国家等基本上还保持着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教合一政体形式的君主制国家；既有靠石油收入跻身世界上最富裕国家行列的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家，也有世界上最贫穷的阿富汗、也门、孟加拉、苏丹等国家。例如：1987年海湾富国阿联酋的人均收入已接近20000美元，科威特的人均收入是16800美元，而南也门的人均收入却只有400美元，苏丹只有150美元；伊斯兰世界中既有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亚历山大等欧洲化大城市中的世俗中产阶级，也有居住在传统宗教气氛浓厚的小城镇中虔诚的穆斯林市民，还有保留着许多前伊斯兰时代习俗、生活在茫茫沙漠之中的游牧贝都因人；又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则是由许多讲不同语言、有着不同习俗的民族、部族组成了统一的国家；而讲同一种语言、有

共同文化和历史、在地域上也很集中的阿拉伯民族却分成了20多个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对外关系上，这些伊斯兰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和安全需要，不得不分别依赖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集团：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倾向美国，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也门等则倾向苏联。在伊斯兰世界内部，一些穆斯林国家之间由于教派分歧、领土纠纷、民族矛盾、历史恩怨等原因而关系紧张，战争和冲突时有发生。

## 新泛伊斯兰主义

虽然早在穆罕默德去世后不久，伊斯兰世界就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虔诚的穆斯林仍一直在向往有朝一日，伊斯兰世界能够重新统一起来，所有穆斯林能不分种族、语言和地域共同生活在他们的“乌玛”伊斯兰大家庭里。

19世纪后期，当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发起以“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为口号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时，其最基本的根据就是来自伊斯兰乌玛的观念。他所希望的是建立一个由各个伊斯兰国家联合组成的政治联邦，由一位领袖（哈里发）统一领导，以便能与西方对抗，以求得伊斯兰世界的生存和振兴。但是，由于当时各地在经济文化上差别极大，加上许多世纪来“一盘散沙”似的分裂局面，要组成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阿富汗尼当时依靠腐朽末落的奥斯曼帝国苏丹来领导穆斯林各国的统一，把宗教复兴和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封建统治者身上，因此，就使得他倡导的泛伊斯兰运动注定要失败。

然而，到本世纪 60 年代后期，泛伊斯兰主义的势头又重新出现在伊斯兰世界。但这时出现的泛伊斯兰主义与 19 世纪末阿富汗尼倡导的泛伊斯兰运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同了。它不再要求恢复哈里发制度，也不谋求建立统一伊斯兰国家或联邦，而是强调全世界穆斯林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各个穆斯林民族之间的传统联系，倡导在当代现实情况下加强各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团结，开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各国的繁荣和发展；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一致立场，维护伊斯兰世界的共同利益，反对外来势力对伊斯兰世界的干涉和控制。为了区别于原来的那种泛伊斯兰运动，这一新的趋势被称为“新泛伊斯兰主义”。

新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和推动力主要来自三个世界性泛伊斯兰组织：世界穆斯林大会，世界伊斯兰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

世界穆斯林大会于 1926 年在麦加成立，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机构。当时由于土耳其共和国废除了持续一千多年的哈里发制度，整个伊斯兰世界处于一种无中心的状态。刚刚完成了统一阿拉伯半岛的伊本·沙特国王便出面发起召开大会，希望重新建立一个伊斯兰世界的领导中心。但由于各地代表在会上意见不统一，大会只是泛泛地号召穆斯林加强团结。1931 年在耶路撒冷开了第二次大会。后来因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这个组织长期处于瘫痪状态，直到战后 1949 年在卡拉奇召开第三次大会时才恢复活动。这次大会决定把总部从麦加迁到卡拉奇，并正式定名为世界穆斯林大会。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在世界各地传播伊斯兰教，宣传超民族、超国家和超地域的伊斯兰思想，在伊斯兰世界抵制马克思主义的无

神论和西方化世俗化的影响。世界穆斯林大会在联合国享有“非政府性咨询机构”的地位。

世界伊斯兰联盟于1962年建立，总部在麦加，与世界穆斯林大会一样，它也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这个组织就是针对民族主义思想流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联系日趋减少的现象而成立的。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国王在瑞士日内瓦宣布成立这个组织时称，它是一个非政府、非党派、非宗派的国际组织，代表全世界所有的穆斯林。它的宗旨是：“在全世界传播伊斯兰教的信息和教义；消除反伊斯兰教的虚假宣传和穆斯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维护穆斯林少数民族在宗教、教育、文化方面的权利；协助世界各地穆斯林团体的宣教活动，促进他们的内部团结；支持建立在平等、正义基础上的国际和平、和谐与合作。”1974年以后，世界伊斯兰联盟分别成立了亚洲、非洲、澳洲、北美和南美协调委员会。这个组织举办各种会议，讨论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散发宗教宣传品，组织专题讲座，并对伊斯兰宣教活动和文化活动提供帮助。

迄今为止，新泛伊斯兰主义运动中最有权威也最有影响的是1970年成立的伊斯兰会议组织。这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政府间的组织，成立时有36个成员国，到1991年已有46个成员国。这个组织的总部设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自成立到1991年共召开过6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另外它每年都要召开各国外长会议。伊斯兰会议组织在其宪章中宣称：“各个会员国确信他们共同的信仰构成了伊斯兰人民互相接触和团结的强有力的因素。”它活动的目的在于：“促进伊斯兰各国之间的团结。加强各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科学和其他重要领域的合作。努力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根除一切形

式的殖民主义。共同努力保卫圣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其权利和解放家园的斗争。加强穆斯林全体人民为维护他们的尊严、独立和民族权利的斗争。创造一种适当的气氛以促进各会员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和谅解。”伊斯兰会议组织还有一些专门委员会和下属机构，如伊斯兰发展银行、伊斯兰团结基金、伊斯兰国际通讯社、伊斯兰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等等。

在这三大泛伊斯兰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60年代以后国际性伊斯兰活动日益增多，包括各种伊斯兰文化、教育和宗教活动，以及在非伊斯兰地区的传教活动。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穆斯林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伊斯兰国家间认同感的增强，也标志着战后伊斯兰世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81年1月第三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麦加宣言》，被看作是新泛伊斯兰主义最重要的宣言：

“穆斯林，不论其肤色、语言与国籍，他们是个统一的民族，都从共同的文明遗产中获得思想的源泉。”

“正是由于具有这种信念，我们决心前进，以便加强我们这些民族与国家间团结的纽带，超越一切会引起分裂和争吵的事物，平心静气地解决我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谋求根据条约和兄弟情谊、团结和联系的原则进行仲裁，根据我们共同信奉的《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圣训》中的公正和宽容的准则进行仲裁。”

“我们伊斯兰民族会前进，会复兴。我们伊斯兰民族为有《古兰经》、《圣训》而自豪，为有《古兰经》、《圣训》制定的完善生活准则而自豪，因为这一生活准则指导我们伊斯兰民族追求真理、向善、自救，使我们不忘文明遗产，使我们摆脱盲从和误入歧途；因为这一生活准则给我们提供精神动力，

唤醒我们利用我们的所有能量，为我们提供通向正道的精神食粮。”

“我们赞赏我们这个具有精神力量的强大民族拥有丰富的人力和物力，因为我们民族约有 10 亿人口，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拥有各种巨大的能量，足以保证我们民族享有举世瞩目的地位，足以保证我们民族自身的繁荣，足以保证我们民族成为向善、均衡并造福全人类的因素。”

## 一个伊斯兰王国的崛起

60 年代以来新泛伊斯兰主义思潮的兴起，一方面反映了穆斯林群众对战后以来流行于伊斯兰世界的世俗意识形态的不满和怀疑，他们的自我意识的增强和以及对伊斯兰团结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倡导新泛伊斯兰主义的沙特阿拉伯在伊斯兰世界的崛起。

18 世纪中期，阿拉伯半岛兴起了瓦哈比教派运动。这个运动的创始人瓦哈布认为当时人们的思想已偏离了正统的伊斯兰教，因此他主张恢复早期伊斯兰时代的质朴风尚，严格遵循伊斯兰的经、训教导，清除一切外来或异端的影响，以净化宗教、纯洁社会。沙特家族是阿拉伯半岛上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家族之一，这个家族采取了与瓦哈比教派结盟的政策，力量迅速上升。19 世纪初沙特家族曾一度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但不久后被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出兵镇压了下去。

本世纪初，沙特家族在首领伊本·沙特的领导下在半岛中部的内志地区再次崛起。1926 年伊本·沙特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1932 年定国名为“沙特阿拉伯王国”，他自

已成为国王。阿拉伯半岛腹地是伊斯兰世界中没有沦为西方殖民地的为数极少的几个地区之一。因此从建国开始，沙特王国就表现出极其强烈的伊斯兰色彩。它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君主政体，国王既是世俗的国家元首，同时又是国家的伊斯兰大教长（伊玛目）。伊斯兰教法学家（乌勒玛）多数是瓦哈布的后裔谢赫家族的成员。沙特阿拉伯没有宪法，而称《古兰经》就是其宪法。国内严格实行伊斯兰教法，伊斯兰教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战后初期，伊斯兰世界内明显地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一个是以埃及、叙利亚等国家为代表的激进的民族主义阵营，另一个就是以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约旦等国家为代表的保守派君主制国家阵营。双方一直在互相斗争和互相攻击。埃及的纳赛尔提出的口号是“阿拉伯统一和社会主义”，沙特阿拉伯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伊斯兰团结”与之抗衡。1962年当也门发生内战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各支持一方，并派出军队直接参加战争。但从当时的趋势来看，随着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伊拉克、也门、利比亚等国家的君主制政权一个个被推翻，似乎保守派处于被动防守、节节败退的状态。

然而，到了60年代后期，斗争的形势以及力量对比都发生了变化。埃及等国的影响下降了，而沙特阿拉伯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却显著提高，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沙特阿拉伯成功的“伊斯兰外交政策”，二是它惊人的石油财富。

针对埃及纳赛尔提出的“阿拉伯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口号，沙特的费萨尔亲王（他在1966年成为国王）1963年说：“我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不相信除伊斯兰之外的



任何主义，我们只相信伊斯兰。”并称：“反对伊斯兰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沙特阿拉伯说它并不反对阿拉伯统一，但强调它首要的外交原则是伊斯兰团结，其次才是阿拉伯统一。这使它获得了许多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好感。阿拉伯半岛是伊斯兰教诞生地，两个最主要的伊斯兰圣地——麦加和麦地那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这就给沙特阿拉伯开展“伊斯兰外交”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沙特国王自称“两圣地的保护者”，并利用朝觐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作为推行伊斯兰外交的一个措施，费萨尔国王1962年建立了世界伊斯兰联盟，将其用来作为宣传新泛伊斯兰主义和沙特与其他伊斯兰国家联系的一个工具。

阿拉伯半岛以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大部分是干旱少雨的沙漠，只有靠一年一度的朝觐活动才能得到一点外来收入。20年代初，美国人在这里勘探出了石油，从此阿拉伯半岛进入了其辉煌的石油时代。1933年5月，美国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以10万美元为代价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一项为期60年的租让合同，取得了在沙特境内开采石油的特权。沙特王室开始对这一合同还感到挺满意，觉得并没有损失什么就得到了这么一大笔钱，但后来才发觉吃了大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人已发现了四个大油田，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而沙特人却得不到从自己的土地下开采出来的石油利润。经过谈判，从1950年起，沙特阿拉伯终于得以同美国人对半分享石油收入。后来，沙特政府以参股的方式，不断扩大在石油公司中的股权，到70年代终于把整个石油工业收归国有。

自60年代开始，黑色的石油给沙特阿拉伯带来了滚滚财富。特别是到了1973—1974年提高油价后，沙特阿拉伯石油收入激增，1978年沙特阿拉伯的国内生产总值达1580亿美

元，对这个只有 700 多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也就意味着人均产值为 21000 美元，这是当时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苏联的 7 倍，埃及的 50 倍。天文数字般的石油财富使沙特阿拉伯成了“经济超级大国”，也使它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地位不断上升。

沙特把大量的资金投入伊斯兰活动中，对许多国家给予了慷慨的援助。但它的援助是有条件的，首先受援国必须是伊斯兰国家，其次是受援国必须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再次就是受援国必须逐步实行伊斯兰法。沙特的援助对象除了伊斯兰国家外，还有国际性伊斯兰组织和一些国家的伊斯兰团体和组织。1977 年一年沙特阿拉伯对外援助的资金就多达 24 亿美元，但这也只不过占它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4.3%。为了方便朝觐活动，沙特政府新建了大批公寓，购置了大量的交通工具，在吉达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机场。为了培养伊斯兰宗教人才，沙特在利雅得建立了伊玛姆伊本·沙特大学和在海地那建立了伊斯兰大学，这两所大学不仅有最豪华和现代化的设施，而且每年沙特政府还提供大量奖学金，吸引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学生前来学习。此外，沙特还出资在西欧、北美、东非、西非、东南亚等地区建立了许多清真寺和“伊斯兰文化中心”，帮助伊斯兰的宣教活动。

另外，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初期伊斯兰世界发生的三件事对民族主义势力下降和伊斯兰势力上升起到了直接的影响：

第一件是埃及和叙利亚在 1967 年 6 月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遭到惨败。埃、叙一直是以民族主义口号与以色列对抗，声称要解放属于阿拉伯祖国一部分的巴勒斯坦，并要把以色列赶到大海中。在“六·五”战争中，人数众多的阿拉伯国

家却被只有 300 万人口的以色列击败，丧失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等大片地区，以及伊斯兰教的第三大圣地——耶路撒冷。这一失败给阿拉伯民族主义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使它在穆斯林群众中的影响一落千丈，许多人认为阿拉伯国家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们背离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埃及、叙利亚等国失败后，为了尽快恢复元气，也开始大量接受沙特阿拉伯等“保守国家”的财政援助。

第二件事是伊斯兰教的圣城耶路撒冷落入以色列手中后不久，1969 年 7 月，一名叫麦考尔·洛汉的澳大利亚人企图纵火焚毁圣城内著名的阿克萨清真寺。尽管火势被及时控制住了，但这座伊斯兰世界最古老和最神圣的清真寺之一还是遭到了严重的损坏。以色列当局后来说纵火者是一名疯子，并对他进行了处罚。但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并激起了穆斯林广泛而强烈的愤怒。沙特国王费萨尔抓住这一机会，于当年 9 月在摩洛哥的拉巴特召开了有 25 个国家参加的第一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费萨尔国王代表与会国发出了对以色列进行“圣战”和解放耶路撒冷的号召。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各国一致同意建立伊斯兰会议组织。

第三件事是 1973 年中东的“十月战争”中，在沙特阿拉伯的领导下，阿拉伯产油国发起了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同时，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单方面宣布提高原油价格 70%，一举夺回了长期被西方国家垄断的石油定价权。石油武器的运用，触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石油危机”。当时，西方报纸称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是“扼住西方世界咽喉的人”。

到此时，沙特阿拉伯已被公认为伊斯兰世界的盟主。这个昔日荒凉偏僻、默默无闻的沙漠伊斯兰王国成了国际社会

举世瞩目的明星。1975年美国《时代》周刊把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选为当年的“国际风云人物”。

## 宗教精神的勃兴

在穆罕默德去世后不久，伊斯兰教就分裂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派。逊尼派自称“正统派”，承认艾卜·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四个哈里发都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而什叶派只承认阿里及其后裔是先知的继承人。两大教派在经典、教义、教法等方面都存在着分歧，许多世纪以来双方的对立和斗争非常激烈。80%多的穆斯林属于逊尼派，当代伊斯兰世界中的多数国家都是逊尼派国家。信奉什叶派的穆斯林约占穆斯林总数的10%，主要集中在伊朗，在伊拉克、也门、黎巴嫩、巴基斯坦等地也有不少人。除逊尼派和什叶派以外，还有一些较小的其他伊斯兰教派。

60年代新泛伊斯兰主义在提出“伊斯兰团结”的口号时，强调了消除教派分歧，促进各个教派间的互相了解。这一点得到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两方面的积极响应。最大的什叶派国家伊朗参加了各种泛伊斯兰活动，1969年伊朗的巴列维国王出席了第一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并积极参加筹建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工作。伊朗国内宗教界在很多问题上反对国王，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持赞成态度。

逊尼派最负盛名的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校长夏尔图特大教长也在1972年提出，什叶派的教法原理应该作为伊斯兰教正统教法学派之一，在所有逊尼派的学院被学习和研究。还有的宗教学者提出，应该加强逊尼派和什叶派宗教学者之间在教法学、教义学、哲学方面的对话，以求取得双方之间更好

的相互理解。尽管实际上这类活动开展得并不多，成效也不大，但却反映出两个教派对“伊斯兰团结”所持的积极态度。

在一些伊斯兰国家里，世俗化和西方化的发展，曾使许多人对宗教生活十分淡漠。一位西方学者在60年代中观察到：“受过教育的人们对赖麦丹（斋月）斋戒的态度随便，他们喝酒，不遵守饮食的禁忌，极少祈祷，也极少去清真寺。尽管他们仍坚持自称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放弃了伊斯兰教，不再让其作为支配自己生活的准则。他们仅仅在文化上是穆斯林，而不是虔诚的信仰者。”但到了60年代末，这种情况也开始转变了。在那些“世俗化”的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又“返回”伊斯兰。按时到清真寺祈祷、进行斋戒和缴纳天课（扎卡特）的人多了起来，要求到宗教学校学习的人也多了起来。穆斯林不仅对宗教生活表现出越来越高的热情，而且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越来越多地恢复了以往的传统，如禁止饮酒，反对出售酒类饮料，要求取消不符合教规的娱乐活动，如赌博、球赛、播放西方的音乐和影视节目等。

新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复兴思潮传播最迅速、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一年一度的麦加朝觐。而朝觐活动本身也是伊斯兰教兴衰的一个晴雨表。

朝觐（哈吉，hajj）是伊斯兰教规定的“五功”之一。教义规定，每个穆斯林只要有能力，一生中都必须至少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一次。朝觐既是一种规定的宗教义务和仪式，也是促进各地穆斯林互相了解和团结的一种聚会活动。当然，朝觐并不只是到麦加作一次旅行，穆斯林要连续几天履行一系列宗教礼仪活动，是非常困难和艰苦的。穆斯林认为，朝觐就是“回到了真主的身边”，人们在这里可以使自己的心灵纯洁并与真主交流。凡是到麦加朝觐过的穆斯林都可以在

姓名前面冠以“哈吉”（即朝觐者）的荣誉称号，这在穆斯林中是十分荣耀的。哈吉们在穆斯林中享有较高的宗教地位。

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每年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不足7万人，1965年为23万。而在此之后便出现了迅猛上升的势头，到70年代中期朝觐人数达到150万，1980年竟突破了200万！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使用是朝觐人数增多的原因之一。过去各地的穆斯林靠乘船、骑马、坐车甚至步行，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达圣地，许多人往往为朝觐一次而消耗毕生的时间和精力，有的人甚至因饥渴贫病死于途中。而今天的朝觐者们可以乘飞机一天之内从最遥远的国度来到麦加。据1980年统计，到麦加的外国朝觐者中近百分之九十都是乘坐飞机来的。然而，朝觐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它是穆斯林自我意识回归的一种表现，也是伊斯兰世界团结合作愿望的一种反映。

伊斯兰教的朝觐现在已成为了地球上人类最大的聚会活动。一周之内，来自世界五大洲的200万穆斯林聚集到麦加这几平方公里的地方，他们中有黄色、黑色、白色、棕色以及其他各种肤色的人。他们围着克尔白圣殿（天房）旋转，到阿拉法特山祈祷、诵经，听取讲道，交流各自国家的宗教情况。对于许多穆斯林来说，朝觐的气氛本身就是一种终身难忘的宗教洗礼。千千万万具有共同信仰的人，分别来自印度尼西亚海滨，来自阿富汗的山区，来自阿拉伯沙漠，来自遥远的欧洲、美洲，他们不分民族、肤色、语言，也不分彼此间的社会地位、身份，无论是总统、国王，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大家都在平等地、兄弟般地履行着自己的宗教义务。在这里，人们可以最深刻地感受到伊斯兰教的生命和力量，体会到作为伊斯兰大家庭中一员的骄傲和自豪；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互相交流各地伊斯兰活动的情

况,传递着伊斯兰复兴的信息。

伊斯兰教的发展和传播在 60—70 年代也达到了一个高潮。1965 年,全世界的穆斯林人口不足 6 亿,但到 70 年代末却猛增到了 8 亿多,近年来已突破 10 亿。这其中除了人口增长和统计差异的因素外,伊斯兰教的传教活动使大批非穆斯林转变为穆斯林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传教活动在非洲、东南亚和欧美等地区都十分活跃,在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尤其成功。

在喀麦隆、几内亚、马里、乍得、尼日利亚等国,穆斯林所占的人口比例都在 60—70 年代从少于 50% 变成超过人口半数。加蓬、埃塞俄比亚、贝宁、多哥等国的穆斯林人口都接近全国人口的半数,尽管这些国家穆斯林不占人口多数,它们都要求成为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据统计,到 70 年代后期,非洲大陆已有 1/4 以上居民为穆斯林人口。有人认为,按这样的速度发展,用不了几个世纪整个非洲大陆都将变成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还有的学者对伊斯兰教在非洲大陆迅速发展原因作了分析,认为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是伊斯兰世界与非洲内陆有着历史和地理上的传统联系,在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斗争胜利之后,伊斯兰教填补了非洲国家的文化真空;另一方面是伊斯兰教中没有对肤色和种族的任何歧视,极易为饱受欺凌的非洲人民所接受。

令人惊异的是,伊斯兰教并不只是在发达的亚非地区迅速传播,在发达的欧美地区也有相当快的发展。欧洲的穆斯林从二战后不到 1000 万迅速上升到 70 年代末的 2800 万,成为仅次于基督教徒人数的第二大宗教社团。这其中虽然有很大一部分增长是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但改信伊斯兰教的人数也不少。伦敦、巴黎、波恩、汉堡、罗马、布鲁塞尔

等欧洲大城市都有国际伊斯兰组织和当地穆斯林共同创建的“伊斯兰文化中心”。在美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与民权运动结合在一起，因此在黑人等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很快。皈依了伊斯兰教的黑人们自称“黑穆斯林”，开始时他们主张与白人分离，以表示对受歧视和受压迫的抗议。著名的黑人穆斯林领袖马尔科姆·埃克斯到麦加朝觐后，看到全世界穆斯林不分种族和肤色，平等友好地一起相处，大受感动和鼓舞。他回美国后放弃了“黑穆斯林”的分离趋向，积极在白人中发展伊斯兰教。著名的世界拳王穆罕默德·阿里、流行歌星卡特·史蒂文斯等人先后都成为了穆斯林。到80年代初，美国穆斯林人数已达到500万，而在20年前，他们只有大约50万。

人们已注意到，伊斯兰教自诞生后，它的传播和发展出现过两个高潮时期，一个是创教初期，另一个时期就是20世纪。在全世界“非宗教化”已成为大趋势的现代社会中，伊斯兰教仍能迅速传播和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 回 归 伊 斯 兰

新时期、新形势下伊斯兰思潮的再度勃兴，不仅反映在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中，而且更明显、更直接的是表现在穆斯林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

在国际性泛伊斯兰思潮的影响下，到70年代，许多国家社会中的伊斯兰教力量上升，宗教气氛日益变得浓厚起来。科威特等海湾国家的清真寺数量在十年中翻了两番，伊拉克、埃及、伊朗、土耳其等这些“世俗化”发展较快的国家中也出现了大量新建的清真寺。

在许多国家里，每天到祈祷的时候，从清真寺的尖塔上



就传出高亢、嘹亮的唤拜声，一些商店、工厂、银行、学校的活动都要停下来，让人们参加祈祷。有一位长期居住在中东地区的西方记者观察到，70年代以来，“参加礼拜的人明显地增多了，每到星期五，工厂、市场、公共场所便没有了生气，人们都到清真寺去了”。他写道，开罗的清真寺每逢星期五都是拥挤不堪，礼拜者只好在寺外的人行道上祈祷。正在值勤的警察会就地铺一块小地毯开始祈祷，祈祷完后又继续执行他的公务。飞机上的乘务员把一条毛巾铺在飞机的过道上做祈祷，穿着白色短裤的网球运动员把球拍放在运动场上然后祈祷，在田野里工作的人们脱掉鞋子，跪在几片纸板上祈祷。大学生们在学生宿舍的走廊里集体祈祷。一位祈祷者说：“如果我不祈祷，我的内心就会发慌，祈祷后，我的心就平静了。”另一位祈祷者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被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鸿沟分隔开来。但在清真寺里，我们人人在真主面前都是平等的。”

1978年美国总统一吉米·卡特访问沙特阿拉伯，当利雅得的国际机场正在一片繁忙的时候，突然从清真寺的宣礼塔传来了唤拜声，军乐队和仪仗队全都放下乐器等东西，跪在停机坪上开始礼拜。第二天，美国报纸登出了这一张奇特的照片，使美国人感到十分惊讶，而沙特人对此却觉得很平常，认为无须大惊小怪。

在文化领域内，人们越来越多地主动去追求“传统的”东西，抵制外来的、特别是西方的文化产品，如西方的音乐和电影、电视节目。各种关于伊斯兰教的出版物受到青睐，广播、电视中的伊斯兰节目也多了起来。各类宗教团体和组织不断涌现，这些团体和组织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宣教，举行伊斯兰艺术、建筑、科技展览，举

办背诵和书写《古兰经》的比赛等。一些国家除了鼓励传统的清真寺教育外，在一般的各类学校中也增设了伊斯兰教课程。就连世俗化开始最早的土耳其在1982年颁布的新宪法中也规定：“中小学有义务进行伊斯兰宗教教育。”

明显的变化之一是人们服装的改变。战后一段时期内，西方的服装曾很流行，人们把穿着西式服装作为文明和现代化的标志。土耳其、伊朗政府还明令要求人们把传统服装改为西式服装，并规定妇女不得戴面纱。然而，到70年代，在许多穆斯林国家中，恢复传统服装成为一股时尚和风潮。男人们戴头巾，蓄胡须，穿长袍，女人也穿上了不暴露身体任何部分的长袍，并蒙上面纱。而且，人们感到惊奇的是，往往是城市里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和大学里的青年学生对恢复传统服装最积极最热心。一位西方学者对此感到困惑不解，他说，这些穿长袍戴面纱的女青年的母亲或祖母曾经为摆脱这样的装束而斗争过。开罗大学的一个女学生说：“对我们来说，穿西方式的服装不过是一种伪装，而只有穿上了我们的传统服装，才恢复了我们的本来面目。传统服装还可以使我们感到更安全，避免受到异性的袭扰。”更多的人认为，青年们改穿传统服装是在表达一种对现实不满的“文化抗议”。

在经济领域中最突出的现象是伊斯兰银行的兴起。按《古兰经》规定，穆斯林是不允许收取利息（“里巴”，riba）的，因为利息被认为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样就与现代起源于西方的银行制度发生了冲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70年代中，在一些国家便出现了“伊斯兰银行”。这类银行在借贷和投资时没有利息往来，而是采取了一些其他的变通办法，如盈亏分摊制、加价借贷制、手续费制等。这种银行出现后，受到信教群众和宗教界的欢迎。在西方式银行与伊斯兰银行并存的情况

下,许多穆斯林宁愿选择后者。因此,伊斯兰银行在70年代后期发展很快,在海湾国家、巴基斯坦、埃及、苏丹等地出现了一批有雄厚资金的伊斯兰银行,并发展到一些欧洲城市和东南亚地区。到70年代末,伊朗、巴基斯坦在政府的推动下,在全国从上到下地实行了金融系统的伊斯兰化。在巴基斯坦的许多银行里,人们能看到挂着这样一些横幅:“谁用正当的手段获得收益,谁就是真主的朋友。”“要以公正待人。”“不能实现自己诺言的人就是没有信仰的人。”

除伊斯兰银行外,有的伊斯兰经济学家甚至提出应该按伊斯兰经济原则对现存的整个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建立真正的“伊斯兰经济制度”,如实行由国家收取天课税(扎卡特, zakat),建立符合教法的财产继承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等。他们认为,伊斯兰经济制度将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另外,一些伊斯兰经济学家认为,在当代世界经济逐步走向一体化的趋势下,有必要首先加强穆斯林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沙特阿拉伯是这一想法的积极支持者,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它每年把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7%(1978年大约为46亿美元)以低息贷款或赠款的形式用来援助不发达的穆斯林国家。一位在世界银行工作的伊斯兰经济学家马赫布卜·哈克曾发起组织一个有十亿美元的世界穆斯林基金会来帮助贫穷的伊斯兰国家发展经济。他说:“穆斯林国家需要有自己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伊斯兰教法(沙里亚, sharia)是关于穆斯林宗教、社会、家庭等各方面的法律规定。它最基本的来源是《古兰经》和《圣训》,一些著名的教法学家通过公议、类比等方式作出的规定,也是伊斯兰教法的来源。伊斯兰教法对穆斯林的宗教

义务、婚姻、继承、契约债务、饮食禁忌等都有明确规定，并且还规定了对违犯者的处罚。伊斯兰教法中最为人们所知的是它对犯罪的刑罚，包括对酗酒、未婚男女的奸情实行鞭笞，对偷窃、抢劫犯的砍手，对已婚男女通奸的乱石击毙，对杀人、叛教罪的斩首等。伊斯兰法的实施多在清真寺执行，而且禁止异教徒观看。

在殖民时期和独立以后，多数伊斯兰国家都采用了西方式的世俗法律，有些国家只在很小的范围（如某些民事案件中）里仍然保留着传统的伊斯兰法，而有的国家则完全取消了伊斯兰法。由于70年代中伊斯兰教力量的上升，很多国家社会中要求恢复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呼声日渐高涨。在这种社会压力下，一些国家又重新全面或部分实行伊斯兰法，如巴基斯坦、苏丹、埃及、伊朗等。传统的伊斯兰刑法又被重新引入这些国家的法律体系中。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在70年代后宣布成立伊斯兰立法委员会，为实施伊斯兰法作准备。

有的国家在推行某项政策时，也往往更多地依靠伊斯兰教法权威的支持和帮助。例如，突尼斯政府在把一些海滨地区开辟为吸引西方人的旅游度假区时，曾受到国内很多人的反对，后来政府通过宗教机构颁布了一条“法特瓦”（宗教命令），宣布这样做并不违反伊斯兰教，才平息了反对派的攻击。同样，埃及在推行计划生育措施时，也是经过爱资哈尔清真寺的教法权威论证批准的。

所有这一切，都在伊斯兰各国社会中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宗教环境和气氛，使人们自觉或是不自觉地接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卷入进宗教活动中，成为波澜广阔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一部分。

## 宗教政治化——伊斯兰复兴的归宿

如果把伊斯兰教与其他世界性宗教作一个比较，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政治性非常强的宗教，甚至可以认为，它就是一种政治性宗教。自伊斯兰教创立之始，宗教与政治之间就没有有什么明显的分界线，宗教社团就是国家，宗教领袖就是国家的统治者，宗教的传播发展就是国家疆域的扩大延伸，宗教的经典也就是治理国家的法律。后来，政治与宗教出现了分离，也就意味着宗教开始衰落。

所以，对于许多穆斯林来说，“伊斯兰复兴”也就意味着政治与宗教的重新结合，就意味着让宗教回到政治中去，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让政治回到宗教中去。事实上，70年代全面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最直接，同时也是最深远的影响，就是使各个伊斯兰国家的政治伊斯兰化，或者说伊斯兰政治化。

这种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是各国官方越来越多地利用伊斯兰教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使自己的统治更加合法化，以争取穆斯林人民的支持和打击反对势力。这种利用伊斯兰教来加强自身统治地位的做法既可能是被动的——迫于社会伊斯兰复兴思潮和反对派力量的压力；也可能是主动的——统治者或统治集团本身就是虔诚的信仰者。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其结果就是整个国家出现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运动。

这种结果在中东地区十分明显，许多国家的统治集团都宣称自己信奉的是真正的和正统的伊斯兰教，攻击敌对势力是“异端”、“异教徒”或者“无神论者”。例如，沙特阿拉伯王室政府强调自己是伊斯兰正统教派和圣地的保护者，约旦

国王则称他属于古莱氏部落的哈希姆家族，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自称他是虔诚的信教者，是“安拉的仆人”。利比亚的卡扎菲则把他领导的推翻君主制的革命称为“伊斯兰革命”，他实行的是“伊斯兰社会主义”，利比亚进行的社会改革是“伊斯兰文化革命”。一时间，“伊斯兰”成了最时髦、最有魅力的政治名词，大家竞相向伊斯兰靠拢，有的国家在国名中冠以“伊斯兰”，称“××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王国”；有的国家重申伊斯兰教是“国教”、“官方宗教”，规定国家元首或政府领导人必须是“虔诚的穆斯林”，还有的国家宣布伊斯兰教是国家的“法律源泉”或“立法基础”，等等。各国政府制定内外政策时，大量使用伊斯兰语言，以伊斯兰教为价值标准，并寻求宗教界的支持与合作。就连那些世俗化程度较深的国家，如土耳其、叙利亚、突尼斯、伊拉克等，也在70年代中纷纷在政治上“转向”伊斯兰，力图改变它们“世俗”的形象。

另一个方面，政府的敌对和反对势力也更多地依靠伊斯兰教来作为他们的旗帜和口号。70年代以来，各国的反政府力量，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也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也都在向伊斯兰“靠拢”。他们攻击政府背离了伊斯兰教，在国内推行的世俗化、西方化和现代化破坏了伊斯兰传统，造成了社会的腐败堕落和贫富悬殊；还指责政府对外与无神论的东方（苏联）集团或与资本（物质）主义的西方集团相互勾结，同流合污。因此，他们称这样的政府是“非伊斯兰”的，其统治是不合法的，人民应该起来将其推翻，重新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府。世俗化越严重的国家，宗教反对活动也就越激烈，对政府造成的威胁也越大。

70年代后期，许多伊斯兰国家都面临着宗教反政府活动

的挑战。老牌的“穆斯林兄弟会”已发展为一个国际性的伊斯兰反政府组织，在埃及、叙利亚、苏丹、约旦等国家的势力都很大。一些新的组织又不断出现，如伊拉克的“号召党”、土耳其的“救国党”、黎巴嫩的“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革命阵线”等。而且，宗教反对活动还以教派的形式出现，例如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的什叶派反对本国逊尼派掌权的政府，叙利亚的逊尼派反对什叶派（阿拉维派）政府，黎巴嫩、塞浦路斯的穆斯林反对以基督教徒为主的政府，等等。宗教反对派或是通过示威游行、竞选参政等合法方式，或是采用袭击、暗杀、绑架、爆炸等暴力手段与政府对抗。可以说，各国的反政府活动是伊斯兰复兴运动中最有声色、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政府可以坚决而果断地镇压其他各种旗号的反政府活动，但对以伊斯兰为旗帜的反对活动却会感到非常棘手。因为它很容易会因此而被指责为“镇压伊斯兰运动”、“非伊斯兰化”，从而失去其统治的合法性，并受到穆斯林人民的反对。科威特的前埃米尔（国家元首）就公开说：“我宁愿对付十个共产党人，也不愿去对付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因此，各国政府对付伊斯兰反对势力唯一有效的手段只能表现得更加“伊斯兰化”，并指责对方是“异端”、“异教徒”或是“对伊斯兰的歪曲”。

大家都打“伊斯兰牌”，进行“伊斯兰竞争”，结果是使“伊斯兰复兴”的烈火越烧越旺，复兴运动愈演愈烈，迅速在伊斯兰世界蔓延开来。

70年代末80年代初，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复兴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

## 第三章

# 大潮初起

从70年代末开始，一场以伊斯兰为旗帜的宗教政治运动如同旋风般地席卷整个伊斯兰世界。这是一个超越民族和国家，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国际性运动。它以中东为中心，辐射到北非、中亚、南亚、东南亚，并波及欧、美。伊斯兰世界中，无论是保守的君主制国家、世俗化的共和制国家、还是激进的军事独裁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进这股浪潮之中。它涉及的地域之广，卷入的民族和国家之多，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的冲击之猛烈，在伊斯兰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然而，这个被称之为“伊斯兰复兴”的运动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却又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在有的地方它表现为自下而上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革命，在有的地方却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循序渐进的社会改革；在有的地方表现为较平静的信仰复归，在有的地方却表现为各种激进的恐怖暴力活动，因此不能对它一概而论。在这本篇幅有限的书中，让我们来看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它们来了解这场伊斯兰运动的全貌。



## 震撼世界的伊朗伊斯兰革命

伊朗原名波斯，是西亚一个有着 5 千多万人口的伊斯兰大国。它是一个伊斯兰教什叶派国家，人民中 96% 的人都信奉什叶派。

“什叶”一词是阿拉伯语“同党”、“追随者”的意思。什叶派是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一。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去世后，穆斯林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多数人承认艾卜·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都是先知的合法继承人，这一派被称为“逊尼派”，意为“遵守圣道者”。由于逊尼派人数众多，影响很大，也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正统派。什叶派坚持“君权神授”的原则，认为只有先知的堂弟和女婿阿里及其后代才是合法的继承者。什叶派穆斯林主要集中在伊朗和伊拉克，在也门、海湾国家、黎巴嫩、阿富汗等地也分布着不少人。

在历史上长期的教派斗争中，什叶派基本上处于受压和无权的一方，因此，它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教义和仪式。什叶派的领袖被称为“伊玛目”。第一代伊玛目阿里、第二代伊玛目哈桑和第三代伊玛目侯赛因等人都在与逊尼派的斗争中惨死，第十二代、也是最后一代伊玛目在公元 887 年“隐遁”了起来，什叶派穆斯林把他称为“马赫迪”（救世主），他们相信马赫迪将在世界末日复临。什叶派把在教派斗争中牺牲的人都称为“殉难”的烈士，每年在“阿术拉节”期间，都要举行狂热的哀悼殉难者的活动。因此，总的说来，与逊尼派相比，什叶派在组织上更严密，宗教感情上更狂热，也更富于战斗性。

长期以来，伊朗什叶派教士集团（乌勒玛）在社会中有很高的地位。他们不像许多国家的逊尼派宗教阶层那样依附于世俗统治者，他们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土地、庄园、寺产等，因此，他们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他们掌握着清真寺、宗教学校等传统的舆论阵地。分布在全国城乡各地的下层专职教士（毛拉）与社会各阶层群众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因此，他们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1925年伊朗巴列维王朝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宗教界特权的措施，引起宗教界上层的不满。而60年代中，巴列维国王推行以土地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白色革命”，更进一步触动了宗教界的经济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反抗。对宗教界的反抗，国王采取了镇压手段，迫使霍梅尼等宗教上层人士流亡国外，双方矛盾日趋激化。另一方面，巴列维国王还在“现代化”的口号下，引进大量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严重触犯了伊斯兰教规。而人民并没有从“现代化”和“世俗化”中得到好处，相反，社会中两极分化加剧，广大群众的生活日益贫困化。

在国王的高压统治下，各种政党被取缔，人民丧失了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宗教成了唯一有可能存在的组织形式。各种反国王势力都逐渐地团结到了宗教界的旗帜下。流亡在国外的霍梅尼则成了斗争的象征和精神领袖。霍梅尼之所以能成为各派力量众望所归的领袖，一是他长期不妥协地与国王进行斗争，二是他曾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关于伊斯兰国家和政府的理论。他认为，在先知的后裔伊玛目隐匿期间，伊斯兰国家应该由精通沙里亚的教法学家来领导。他这种理论简单明白，没有受到任何非伊斯兰思想的影响，因此极易为普通群众所接受。伊朗另一位著名的伊斯兰学者沙里亚提还

从理论上阐明了伊斯兰教与现代社会和政治的关系。他曾在法国巴黎获得过博士学位。他把伊斯兰教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不能解答的问题，在伊斯兰中都能找到答案。他的学说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到1978年下半年，伊朗国内矛盾激化，人们纷纷走上街头，高举霍梅尼的画像，呼喊打倒国王的口号，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和示威游行，并同军警展开搏斗。全国各地的1万多所清真寺成了反对派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战斗指挥部，霍梅尼则在国外遥控斗争。动乱持续了3个月，在群众斗争的急风暴雨的猛烈袭击下，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军队也开始倒戈。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满含眼泪、步履蹒跚地登上他的波音专机离开德黑兰，流亡国外，后来客死他乡。2月1日，77岁的霍梅尼结束了他15年的国外流亡生涯，凯旋般地从巴黎乘飞机回到伊朗，在德黑兰机场受到了百万群众的盛大欢迎。2月12日，霍梅尼任命临时内阁接管了政府。接着，就“伊朗是否将成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这一问题在全国进行了公民投票。结果，98.2%的人投了赞成票。4月1日，霍梅尼宣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结束了伊朗长达2500年的君主专制政体。霍梅尼自己成为了握有国家至高无上权力的宗教领袖。

一个毫无权势、远在海外的年迈的宗教学者，在既没有什么大国的支持，也没有自己的军队和武装，甚至在直到最后都未放一枪的情况下，居然战胜了权势显赫、拥有号称“世界第五大军事力量”的伊朗国王，这在许多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式的奇迹。但这就是发生在伊朗的实实在在的“伊斯兰革命”。白发苍苍、面目冷峻的老人霍梅尼一时间成了轰

动世界的人物，他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许多著名报纸刊物、电视新闻中。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也成了世界各国最热门的话题。

新政权虽然是一个“共和国”，实际上是由少数什叶派高级教士掌握大权的政教合一神权国家。它的权力结构完全是按照霍梅尼的宗教政治思想建立的。1980年初公布的新宪法规定，“伊斯兰共和国只承认真主的统治”，它的立国基础是《古兰经》。宪法中还明确规定了神职人员的统治地位：“教法学家依据《古兰经》和真主的传统发挥永恒的领导作用。”宗教领袖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包括任命教法监护委员会成员和最高法院院长，任免总统，统帅全国武装力量，决定宣战和停战等特权。

革命后的伊朗在社会生活中实行“全面伊斯兰化”，原先世俗性质的民法、刑法、商法都被废除，完全按沙里亚法来治理社会。政府要求人们恢复伊斯兰传统服装，规定妇女必须穿长袍戴面纱，违者将被监禁一年，妇女的主要责任是作为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母亲，她们应尽量少参加公共活动；严禁饮酒、吸毒、赌博和播放西方音乐；禁止男女同校；禁止银行利息；等等。虔诚的教徒们组成了纠察队，一旦发现有违反教法的行为，轻的要受到罚款，重的会被送进监狱。青壮年们还组成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许多方面取代了正规军的作用。革命后全国的清真寺数量大增，1978年共有15000所，到1981年已达22000所。霍梅尼自己也仿照先知穆罕默德的榜样，在德黑兰郊区贾姆兰清真寺旁的一所简朴的房子里居住和工作，并常常在星期五到清真寺去祈祷和发表演讲。

国王政权被推翻后，与宗教界在革命中一度合作的民族主义者、左翼的激进主义者开始与伊斯兰政府分道扬镳，并

走上了对抗的道路。国王的支持者也在密谋进行复辟。一时间，血腥的暗杀、暴乱等活动到处蔓延，上千名各级政府官员和宗教人士被杀死。伊斯兰政府也采取了毫不留情的镇压和清洗，在革命后的3年时间里，有4000多名敌对分子被处死。议长、霍梅尼的学生拉夫桑贾尼说：“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就会变成另一个黎巴嫩。”他还说，“伊斯兰要求我们采取坚决的行动”。在血流成河的斗争中，到1982年，伊斯兰革命政权已稳固了下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的大门上赫然大书着“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标语。伊斯兰政府在对外政策中既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反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家，美国被称为“头号撒旦（魔鬼）”，苏联被称为“二号撒旦”。霍梅尼说：“美国比英国坏，英国比美国坏，苏联比它们两个都要坏，它们一个更比一个坏。”革命后，伊朗断绝了与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来往。原来美国驻伊朗使馆中的60多人被狂热的青年学生们扣为人质达一年多时间，要求美国把伊朗国王交回来审判和交回被冻结的伊朗财产。1981年苏联的15名外交人员也被伊朗政府指责为参与反政府阴谋活动而遭驱逐回国。

霍梅尼把当今世界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大阵营，他认为，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属于被压迫者，超级大国、西方世界和一些投靠它们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则是压迫者。霍梅尼称，伊朗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真正的伊斯兰政府的国家，因此，担负起领导实现全球伊斯兰化，解放被压迫者是伊朗义不容辞的使命。它应该向全世界，首先是向穆斯林国家输出“伊斯兰革命”。他号召“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应该觉醒，团结起来，在真主的旗帜下，组成一个大伊斯兰政府”。另一方面，输出伊斯兰革命也是保卫伊朗革命的一种手段。霍梅尼

的另一个学生、总统哈梅内伊说：“如果把革命限制在伊朗境内，它将变得软弱无力。”

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主要方式是派出人员，并且利用广播电视、书籍报刊及各种渠道向外宣传伊斯兰革命思想，号召各国穆斯林起来推翻本国的世俗化政府，建立伊朗式的伊斯兰政府。它还对一些国家的反政府宗教力量提供援助。伊朗的做法引起了许多穆斯林国家政府的恐慌，尤其是那些首当其冲的海湾国家。为了对抗伊朗构成的威胁，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六国组成了海湾合作委员会。伊拉克则先发制人地发动了进攻伊朗的战争。这场两败俱伤、损失惨重的两伊战争持续了整整八年。伊斯兰革命激发起来的狂热宗教感情在战争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革命卫队的战士们常排着队向伊拉克的阵地发起自杀性攻击，还有人用身体滚过敌人的地雷，为自己的部队开路。一些青年人在上战场时胸前带一把金属钥匙，他们相信，一旦在战斗中牺牲，他们就可利用这把钥匙打开“天国的大门”。

## 萨达特之死

北非古老的国家埃及不仅有着享誉世界的金字塔、尼罗河和卢克索神庙等古迹和名胜，伊斯兰教在社会中的深厚影响也是它最明显的一个特色。人们只要来到开罗，立刻就会感受到这里浓厚的宗教气氛：人们普遍身着传统服装；遍布全城大街小巷有上千所清真寺；到祈祷时，此起彼伏的悠长、响亮的宣礼声不绝于耳，到处都可以看到匍匐跪地祈祷的穆斯林。

埃及也是当代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主要有这

样几个原因：首先，从人口、面积来看，埃及是一个大国，并处于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位置。埃及人讲阿拉伯语——《古兰经》的语言，因此它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影响远比土耳其、伊朗等伊斯兰大国要大得多。其次，埃及有着伊斯兰世界最古老、最著名的学府——爱资哈尔大学，它在伊斯兰学术界、思想界和教育界有着巨大的影响。第三，埃及是近代以来最早受到西方势力入侵和西方文化影响的伊斯兰国家，也是最早对西方影响作出反应的国家。近代以来，埃及出现了穆罕默德·阿布杜、拉希德·里达、赛义德·库特卜等伊斯兰思想家。第四，半个世纪以来，埃及国内一直存在着宗教与政治的激烈斗争。当代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国际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穆斯林兄弟会最早于1928年在埃及建立，近年来一些极端的伊斯兰组织也最先出现在埃及。

1952年，穆斯林兄弟会曾支持埃及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国王政权的革命行动。由于兄弟会的伊斯兰政治纲领与新政府的民族主义和世俗化路线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双方的关系很快恶化了。到60年代中期，兄弟会试图东山再起，再次遭到纳赛尔的镇压。而以爱资哈尔大学为代表的传统伊斯兰力量则被政府严格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基本上成了脱离政治的纯宗教机构。在一些问题上，乌勒玛们迫于政府压力，还起到了政府御用工具和传声筒的作用。

但是，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生了两件事，使伊斯兰教在埃及政治中重新活跃了起来。

第一件事是在1967年的第三次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中，阿拉伯国家遭到惨败，埃及在这次战争中不仅丢失它控制下的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而且连它自己的整个西奈半岛也被以色列占领了。这次战争使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

态遭到沉重打击。许多穆斯林，包括爱资哈尔大学的著名宗教学者都认为，埃及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它背离了伊斯兰信仰，受到了外来世俗思想的影响。因此，人们普遍要求加强伊斯兰教育，重新加深穆斯林的信仰。

另一件事是1970年纳赛尔的去逝和萨达特继任埃及总统。萨达特本人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早年参加了反英活动，是“自由军官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埃及共和国建立后，他曾任伊斯兰大会秘书长和亚非会议主席，后又担任埃及副总统。纳赛尔去世后，他顺理成章地成了埃及的总统。萨达特是一个非常注重实际和讲求实效的人，他深深认识到了人民中普遍存在的要求“重返伊斯兰”的情绪，他自己也希望利用伊斯兰教的力量与激进的纳赛尔分子和其他左翼势力对抗，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另外，他还希望与其它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等富裕的海湾国家改善关系，以便得到这些国家在财政上的援助。因此，他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发展伊斯兰教的措施。

萨达特一上台就提出了“信仰与科学”的口号，他一再说“信仰伊斯兰教是我们的天职”。他要求国家电台和电视台每天5次按时播送祈祷，并且还答应尽早使沙里亚完全成为国家的立法基础。1971年埃及修改了宪法，除了明确规定伊斯兰教是国教外，还规定“沙里亚是国家立法的一个主要来源”。到1980年，这一条文又进一步改为“沙里亚是国家立法的主要来源”。尽管在法律上，被纳赛尔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仍是非法组织，但萨达特实际上已逐步取消了对兄弟会的各种限制，释放了在押的所有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并允许兄弟会组织大规模聚礼和出版一份名为《呼声》的刊物。萨达特因此获得了“信仰者总统”的称号。



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联合发动了对以色列进行的“十月战争”。萨达特有意识地使战争带有强烈的伊斯兰色彩：战争在穆斯林神圣的“斋月”中进行，战争的代号为“巴德尔”，这是先知穆罕默德首次战胜信奉多神教的麦加人的一次战役。在十月战争初期，阿拉伯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当埃及军队高喊着“真主伟大”的口号突破了以色列在西奈半岛的巴列夫防线时，许多埃及人相信他们确实又重新得到了真主的帮助。

萨达特对伊斯兰教的鼓励和支持在一方面确实赢得了很多穆斯林对他的信任，一些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也软化了对政府的批评态度，并参与爱资哈尔大学等受官方支持的宗教机构的活动，还有的成员以个人身份进入了政府。但在另一方面，萨达特的宗教政策也刺激了社会上伊斯兰势力的进一步活跃，对国家的稳定构成了新的威胁。正如当时有的分析家所说的那样，萨达特在伊斯兰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危险的平衡”。

萨达特执行的经济开放政策使社会中的两极分化日趋明显，政府机构中的贪污腐化现象严重，这些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号召更具吸引力。穆斯林兄弟会在许多问题上虽然仍对政府持批评态度，但总的立场日趋温和，而且避免诉诸武力。但在同时，它的一些成员却对这种温和立场持反对态度，他们纷纷脱离兄弟会，重新建立了一些激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如伊斯兰解放党、真主战士、圣战组织、赎罪与迁徙等。这些激进组织都激烈地反对现存的政治秩序，主张以暴力推翻萨达特政府，致力于建立伊斯兰国家和全面实行沙里亚法。它们之间只是在斗争的形式和方法上存在着不同。1974年6月，伊斯兰解放党在开罗郊区发动了一次对埃及军

事技术学院的袭击，并企图用缴获的装甲车等重武器，向位于开罗市中心的政府大楼发起进攻。在平息这次暴动的战斗中，30多名士兵被打死。后来，这个组织的领导人萨利姆·萨里亚在受到审判时声称，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流血来恢复伊斯兰的光辉”。另一个原教旨主义组织“赎罪与迁徙”1977年绑架并处死了埃及的宗教部长，因为这名部长曾严厉地批评过这个组织的极端行为。

70年代末，埃及一再发生穆斯林和信基督教的科普特人的冲突。在伊斯兰团体的压力下，埃及政府1977年8月提出一份法案交议会批准。这份法案规定了按伊斯兰法对偷盗、通奸和饮酒的惩处，并且还提出可对叛教者处以死刑。这个法案受到了科普特人的激烈反对，因为在占埃及人口10%的科普特人中有一种习俗，就是为了离婚等问题的方便，他们常临时改信伊斯兰教，事后又恢复基督教。他们认为关于叛教的规定是针对他们的。为此，科普特人连日在开罗等地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并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发生了流血冲突。在此后几年里，科普特人与穆斯林的冲突一直不断，而双方都指责萨达特政府偏袒对方。

萨达特的对外政策也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包括穆斯林兄弟会中温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在内的强烈批评。到70年代后期这主要反映在这样几个问题上：萨达特疏远苏联，对美国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接纳被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的伊朗巴列维国王。其中，尤其是与以色列的和谈激起的反对最为强烈。

1977年11月初，萨达特作出了一项举世震惊的决定：他接受以色列总理贝京的邀请，将访问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这一决定犹如一块巨石投入水中，立刻激起了层层波澜。以色

列是埃及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死对头，30年来双方打了4次战争，真可谓是仇深似海，不共戴天。许多阿拉伯国家对萨达特的决定表示了强烈反对，埃及国内也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连续两位外交部长都拒绝随萨达特前往以色列。但萨达特不为所动，仍坚持自己的做法，他11月19日毅然来到以色列，受到了数万以色列人民自发的热烈欢迎和以官方的隆重接待。从此，萨达特开始了与以色列的和平谈判，并于1978年下半年在美国总统卡特的参与下与贝京达成了戴维营和平协议。萨达特与贝京也因此被世界各国誉为“和平英雄”，双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但萨达特在阿拉伯世界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埃及被开除出了阿拉伯联盟，近20个国家与埃及断交。一些阿拉伯领导人指责萨达特是“背叛”、“投降”、“犯罪”。这一举动也激怒了埃及国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因为他们一直把消灭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作为斗争的目标之一。1979年初埃以和约正式签署时，亚历山大和阿西尤特等地的许多学生和市民不顾政府禁令，举行了反政府示威，他们打出了“不与以色列媾和”、“伊斯兰与国家不可分”、“结束道德的衰退”和“富人不得享受特权”等口号。示威者们还欢呼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反对萨达特允许巴列维国王到埃及避难。穆斯林兄弟会的刊物《呼声》也发表文章，称“与犹太人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与此相反，在萨达特的授意下，爱资哈尔清真寺却发布了一条“法特瓦”（教令），宣布埃以和平条约是合法的。教令说“爱资哈尔的乌勒玛认为埃以和平条约是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它是在埃及于教历1393年斋月（即1973年10月）取得圣战胜利后处于强有力的情况下缔结的。”它还引证了先知与麦加人订立的“侯达比亚条约”为例。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崛起，已日益成了对埃及政权的一大威胁。萨达特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他在许多场合强调，要使宗教与政治相分离，必须区分宗教自由与宗教狂热。他还多次对伊朗伊斯兰革命进行攻击。同时，他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政府对宗教的控制，如让全国的4万多清真寺到宗教机关登记，对大学校园的伊斯兰活动严加管理，并解散了被原教旨主义者控制的学生联合会。这些措施起到一些作用，但也激起了更多人的不满。1981年9月，面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上升，萨达特采取了断然的措施，逮捕了1600多名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重申穆斯林兄弟会是非法组织，封闭了兄弟会的刊物《呼声》，并在军队中清洗了200名被怀疑为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的军官。伊斯兰组织对此也作出了强烈反应，一连三个星期五都利用祈祷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和游行。政教斗争达到了白热化。

1981年10月6日，是埃及发动“十月战争”8周年的纪念日。与往年一样，埃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这天，萨达特身穿蓝色陆军元帅服，神情愉快地与其他高级官员们坐在检阅台上。12点多钟，空军表演开始了，当大家正在抬头注视着天空时，一辆受阅的火炮牵引车突然在主席台前停了下来，4名士兵从车中冲出来，用冲锋枪和手榴弹向检阅台发起了猛烈的袭击。检阅台上立刻乱成一团，萨达特和另外7名政府官员顿时倒在血泊中。虽然直升飞机很快把萨达特送到陆军医院，但两小时后，副总统穆巴拉克宣告：“埃及人民的领袖、战争与和平的英雄萨达特去世了。”

以哈立德·伊斯兰布里中尉为首的这4名刺客都是“圣战组织”的成员。据埃及官方说，暗杀者们的计划是消灭萨达特和其他政府官员，并在新总统就职仪式上再次进行袭击，

随后宣布埃及为伊朗式的伊斯兰共和国。后来当军事法庭对他们进行审判时，伊斯兰布里面带微笑，神情自若地挥动着一本《古兰经》，并高声说：“我们杀死了法老，我们是按真主的旨意行事。”事件发生后，当局立即又逮捕了 2500 名原教旨主义分子，大多是圣战组织和赎罪与迁徙的成员。暗杀事件的影响还是很快波及到了全国，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动乱，最激烈的是在阿西尤特地区，军队和原教旨主义分子之间持续了 3 天的战斗使 80 多人丧生。

80 年代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高潮的过去，埃及社会中的宗教暴力活动有所下降，但原教旨主义的力量仍很强大。同时原教旨主义内部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分歧也更明显，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温和派开始走通过竞选参政，以非暴力方式实现社会“伊斯兰化”的道路，而其他激进的组织却仍然坚持暴力斗争。这种情况在 1987 年大选时充分显露了出来。穆斯林兄弟会与自由党组成竞选联盟，它们提出的竞选口号是：“伊斯兰——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而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却反对选举，他们在各地冲击投票站，砸选票箱，或是投一些无效选票破坏选举。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逮捕了 750 名原教旨主义分子，才使选举进行下去。选举结果，穆斯林兄弟会与自由党的联盟得到了全国 17% 的选票，在议会获得了 60 个议席，其中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得到了 36 个议席，一跃成为了最大的合法反对党。

## 麦加大清真寺事件

从许多方面来看，阿拉伯半岛上的沙特阿拉伯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度。许多其他国家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追求的东西，在这个国家都已存在，并且受到当权者的保护。

沙特阿拉伯的国王就是全国的宗教领袖。它没有宪法，而称《古兰经》就是它的宪法。前国王费萨尔是这样说的：“宪法？要它做什么？《古兰经》就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完善的宪法。”这个国家的国旗是以伊斯兰教崇敬的绿色为底，上面用醒目的白色大字写着“除安拉外，再没有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沙特阿拉伯严格实行伊斯兰法，沙里亚法庭遍布全国各地，各种刑事犯罪仍按照古老的沙里亚法来惩处。1977年王室的一位公主（当时的哈立德国王的侄孙女米沙尔公主）与情人私奔，逃到机场被抓住，也照样按沙里亚法用乱石砸死，她的情人被斩首。这件事曾轰动了当时的国际社会。乌勒玛多是瓦哈卜家族的后裔，他们负责执行教法，维护宗教的纯洁性，对各种问题作出符合教法的解释和判定。

沙特阿拉伯最有特色的是“惩恶扬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一个半司法性的机构，在全国各地有2000多个分会。它有着人数众多的宗教警察（穆塔瓦），每日在各地巡察，负责监督人们按时祈祷，要求人们的饮食、衣着和言行符合教规，并对违犯者进行惩处，如鞭笞、石击等。西方文化在这个国家受到严格的限制，赌场、酒吧、夜总会都在严格禁止之列，甚至连电影院也不允许存在。麦加和麦地那这两个宗教圣地是禁止异教徒去的，利雅得、吉达等城市虽然对外国人开放，但外国人仍必须遵守许多规定，如不得饮酒，不得携带有女人图像的书刊。曾发生过西方妇女因穿短袖衬衫或短裤在沙特阿拉伯受到宗教警察干预甚至鞭打的事情。

石油的开采和巨额的石油收入，使沙特阿拉伯迅速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沙特王室政府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就是如

何使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符合传统的伊斯兰教规。当开始使用收音机、汽车、电视和兴办妇女教育时，政府都曾受到乌勒玛的批评，但统治者总是尽量不违反宗教原则，并争取得到宗教界的认可。例如，当乌勒玛对使用收音机提出质疑，认为这是“魔鬼的声音”时，国王就用收音机来播放《古兰经》，最后终于得到乌勒玛的认可；当沙特政府聘请美国石油专家来工作时，宗教界对让异教徒进入圣地表示反对，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就引用先知当年也雇佣非穆斯林的例子，证明这样做并不违反伊斯兰教。

为了使现代化不与伊斯兰教发生冲突，沙特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变通的办法。例如，为了避免妇女和家庭之外的男性接触，沙特阿拉伯开设了专门的妇女银行，工作人员和顾客都只能是女性；一些高层建筑有妇女专用的电梯；在大学里，男教师只能通过闭路电视为女学生上课；并规定如果没有家中成年男子的陪同，妇女不得单独驾驶汽车和旅行等。沙特阿拉伯政府只批准妇女从事有限的几种职业，如医务、低幼教育和一些社会福利事业等。所以，尽管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程度已很高，但它仍是个伊斯兰教色彩十分强烈的国家。

由于建立在政教合一和部族联系基础之上，加上有不断增加的石油收入，沙特王室政权的统治一直是比较平静和稳固的。但是，到了70年代末，沙特阿拉伯这个“伊斯兰王国”也没有能避开“伊斯兰复兴运动”浪潮的强烈冲击。

首先，国内外越来越多的舆论认为，君主制是违反伊斯兰教的。他们强调，《古兰经》中写道，穆斯林应该对他们的事务“互相协商”，这也就意味着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必须是共和制的，因为君主制将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中。另外，沙特王室成员对石油财富的巧取豪夺和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

式也受到了激烈的攻击。人们看到，尽管沙特国内禁酒禁赌，王室成员和政府官员却可在国外狂饮豪赌；虽然在名义上为了公众道德禁止放映电影，富人们却可在家中大肆观看暴力和色情录像；普通人因偷了一点东西会被砍手，而一些王室成员却可通过投机受贿转手之间获得数千万美元的不义之财；他们有豪华的宫殿，有私人飞机，可为婚礼、骆驼赛一掷千金。

1979年11月20日，是伊斯兰教历1400年的1月1日。沙特国内外的许多穆斯林这一天来到麦加的大清真寺祈祷，他们相信，在这个新旧世纪交替的日子来这个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祈祷将给他们带来吉祥和幸福。

坐落在圣城麦加中心的麦加大清真寺，穆斯林也称它为“禁寺”，是伊斯兰教的第一圣地。60年代以来，沙特阿拉伯经过10多年的努力和花了30亿美元的费用，把这个过去不到3万平方米的清真寺扩建成了有16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50万人做礼拜的世界最大的清真寺之一。麦加大清真寺是一个巨大的方形建筑，分上下两层，高24米，开有50道门，四周矗立着7座尖塔，中间形成了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中央耸立着著名的“克尔白圣殿”，中国穆斯林也把它称为“天房”，天房的墙上镶嵌着一块巨大的黑石。克尔白圣殿被认为是最神圣的地方，平时罩着一顶用高级黑色锦缎制做的幔帐。每年一度的朝觐时，穆斯林要围绕圣殿旋行七周。整座麦加大清真寺气势雄伟，庄严肃穆。这里绝对不允许异教徒进入，也不允许穆斯林在这里大声喧哗，打架斗殴，更不允许发生流血冲突，这些都被认为是对圣地的亵渎。

凌晨5点多钟，300多名装备精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分子突然出现在大清真寺内。暴动者们封锁了大清真寺的49个入口，通过高音喇叭向当时在寺内做晨祷的约4万名穆斯林宣布，他们要举行推翻沙特王室政府的起义。这些人为首的是一名叫朱海曼·乌泰比的人和他的内弟穆罕默德·卡塔尼。他们说，真正合法的统治者必须是虔诚的穆斯林，必须按沙里亚法来治理国家，必须来自古莱氏部落，必须由穆斯林社团推举产生，而沙特家族的统治是非伊斯兰的，号召人们起来推翻这个腐败的、投靠美国的统治集团，建立真正的、合法的伊斯兰统治。朱海曼还宣称，卡塔尼是“马赫迪”（救世主），并说由于他们在各地受到迫害，按照伊斯兰教传统，他们有权利在大清真寺寻求避难和保护。

40岁的朱海曼·乌泰比出生在阿拉伯半岛西部的盖西姆，曾在国民卫队中服役过15年，后进入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学习伊斯兰法律。他认为，沙特王室已完全背叛了伊斯兰教，必须用武力将其消灭。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你们都看到了，自从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在半岛建立统治以来，人们对伊斯兰变得愚昧无知了……他们放弃了奋斗，与基督教徒结盟，并追求物质的东西（指石油）。我们相信，继续这样的统治将毁灭真主的宗教，尽管他们假装坚信伊斯兰。我们祈求真主让我们从他们的统治下解脱出来。”

他还指责乌勒玛与统治家族互相勾结，“除了腐败，乌勒玛和谢赫（酋长）们的钱还能从哪里来”。他秘密发展了一批追随者，并购买了武器。他们计划在伊斯兰历15世纪开始时，趁沙特国王哈立德来大清真寺做晨祷的机会把他杀死，趁势

推翻沙特政府。他们秘密地把武器装在棺材里偷运进大清真寺，并通知他们的同伙们于11月19日晚分头来大清真寺内集中。到20日凌晨，尽管哈立德国王并未到大清真寺来做晨祷，朱海曼·乌泰比还是按计划发动了占领大清真寺的暴动。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沙特当局一时不知所措，因为麦加大清真寺是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这里绝对禁止发生任何暴力和流血。哈立德国王紧急召集了乌勒玛委员会进行协商，希望找到一个对策。乌勒玛们很快在《古兰经》里找到了答案，有一段经文说：“不要与他们在禁寺附近战斗，除非他们从里面攻击你们。如果他们从里面攻击你们，你们就应把他们杀死，因为这是对不信教者的惩罚。”有了这条经文，并得到乌勒玛的首肯后，沙特政府调集了1万多人的军队包围了大清真寺，巴基斯坦也派来了数千军警，国王甚至还从法国请来一批反恐怖专家。士兵们以装甲车为先导，冲进了大清真寺，占领者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暴动者们面对政府军的进攻，分散为若干小组，或上塔尖，或下底层，进行顽强的抵抗。经过两个星期的血战，这次暴动终于被平息了下去。但伤亡也是十分惨重的，战斗中，有127名军警被叛乱者打死，卡塔尼等117名叛乱分子和25名朝圣者也在混战中丧生。另有170名叛乱者被政府抓获。一个月后，包括朱海曼在内的67人被斩首处死。这些被处死的人中，除了沙特人外，还有埃及人、也门人、苏丹人、科威特人等。

麦加大清真寺事件使伊斯兰世界深感震惊，许多穆斯林认为这是对圣地的亵渎，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耻辱。还有人指责沙特阿拉伯政府应对这一事件负责。伊朗政府说，正是沙特家族的腐败统治才“导致使圣地遭到血腥的玷污”。

就在麦加发生暴乱的同时，半岛东部的哈萨地区也发生

了大规模的动乱。这里是沙特阿拉伯石油的主要生产地区，聚居着 20—30 万什叶派穆斯林。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和麦加大清真寺动乱的影响下，什叶派穆斯林不顾政府禁令，11 月 29 日举行了阿术拉哀悼日的纪念活动。成群结队的人举着霍梅尼的画像和标语进行示威，并与军警发生了冲突。8 个城市的动乱持续了近两个月，有 50 多名军警被打死，什叶派穆斯林也有 10 多人死亡，另外有 6000 多人被逮捕。在哈萨地区的动乱中，什叶派打出了一个“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组织”的旗号，公开宣称要推翻沙特家族的统治。

麦加大清真寺事件和东部什叶派的动乱，使沙特王室政府受到了强烈的震动。这个政权以前受到的威胁总是来自外部和世俗方面，如埃及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等。而如今反对势力竟然出自沙特王室赖以立国和为生的伊斯兰教。对此，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些人认为，伊斯兰反对势力的出现，是由于政府多年来对伊斯兰势力鼓励和纵容的结果，主张采取压制和打击的强硬手段；另有一种看法认为，沙特社会的伊斯兰色彩还不够强，沙特的伊斯兰教还不够纯净，要求进一步加强这个国家伊斯兰特征。政府综合了这两方面的意见，除了对反对势力严加防范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净化”伊斯兰教。沙特政府还对王室中的挥霍和腐败现象进行了整治，对社会中教法松弛的现象也作了整饬，并宣布要扩大民主程度，成立一个 60 人左右的“协商委员会”。当时的王储法赫德说：“有一条阿拉伯谚语说：疾病可以导致更健康的身体。清真寺事件向我们指出了一些我们原来注意不够的事情。”

但是，事情并没有了结，秘密的伊斯兰反对派仍然存在，

并不时在一些问题上对政府进行攻击。六清真寺事件数月之后，在利雅得还出现了这样的标语：“朱海曼，我们的烈士，你为什么不捣毁（沙特）王宫？斗争才刚刚开始。”

## 阿富汗——红星与新月的战斗

位于中亚的阿富汗是一个多山的内陆国家，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这个国家的人民中民族繁多，部族林立，有讲普什图语的普什图人，有属于突厥语系的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有讲波斯语的塔吉克人，还有其他许多较小的民族。尽管如此，伊斯兰教在人民中却有极深厚的影响，人口中98%都是穆斯林，全国有15000多座清真寺，平均每一千人中就有一座清真寺。阿富汗穆斯林还特别富有战斗性，近代俄国和英国曾试图把阿富汗纳入自己的殖民统治，但都因遭到当地穆斯林在“圣战”旗帜下进行的顽强抵抗而未能得逞。因此，阿富汗在近代不仅保持了自己国家的独立，传统的伊斯兰教也从未被削弱过。

早在70年代初，阿富汗就出现了一些伊斯兰反政府组织，反对当时查希尔国王政权的世俗化和西方化路线。1973年，首相达乌德发动政变推翻了查希尔国王，使阿富汗成为了一个共和国。1978年4月，左翼的人民民主党再次通过政变建立了亲苏联的政权，把国名改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并宣布阿富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个世俗性质的政权也受到了伊斯兰教势力的反对，全国各地很快出现了许多以“圣战”为旗帜的武装组织，不久就控制了全国近2/3的地区，大有夺取全国政权之势。为了支持和保护阿富汗的亲苏政府，同时也为了防止伊斯兰教

势力进一步发展，影响苏联境内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中亚地区的稳定，1979年12月，苏联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悍然出兵10万入侵阿富汗。从此，阿富汗国内伊斯兰反对派与政府的斗争也就发展成了当地穆斯林与苏联侵略军的战争。

为了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削弱反对势力，喀布尔当局也力图用伊斯兰教来改变自己的形象。1980年初，政府总理卡尔迈勒在他的讲话中开始大量使用伊斯兰语言，并保证宗教完全自由，允许各种教派存在，维护民族的传统和风俗。国家电台和电视台每天宣读《古兰经》。革命后曾一度采用的红旗也改成了带有象征伊斯兰教的绿色和黑色的国旗。后来上台的总理纳吉布拉还常到清真寺去做礼拜，会见宗教人士，做出各种忠于伊斯兰教的姿态。但由于喀布尔政府始终依赖苏联的保护，因此，这些姿态对于争取人民的支持并没有起多少作用。

阿富汗的抵抗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也没有共同的斗争纲领，是由根据不同的部族、地域、教派和意识形态组成的许多大大小小的组织构成的。它们只有两点是共同的：一点是所有的抵抗组织都以伊斯兰为战斗旗帜，另一点就是反对入侵苏军和现政府是它们的一致目标。所有参加抵抗运动的人都自称“穆吉哈丁”，这个词来自“吉哈德”（意为“圣战”），所以，外界把他们统称为“伊斯兰圣战者”。到80年代初，这些反政府武装形成了两个大的松散的集团，分别被称为“七党联盟”和“八党联盟”。

“七党联盟”是指总部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逊尼派穆斯林“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由七个党派组成，是全国最强大的反政府组织，有兵力10万人左右。这七个党派中，又分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类。三个力量最强的组织：

伊斯兰党（由希克马蒂亚尔领导）、伊斯兰促进会（拉巴尼、马苏德领导）、伊斯兰党哈利斯派（哈利斯领导），都属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这些组织的成员多为中小城市的商贩、工人、市民、教师等。它们的目的都是要将阿富汗建成一个伊朗式的伊斯兰国家，只是在斗争方式和具体目标上存在着分歧。

人们感到惊奇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和一些宗教学者，如希克马蒂亚尔是60年代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拉巴尼曾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过，是喀布尔大学的伊斯兰学教授。希克马蒂亚尔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从事政治活动，他主张用武装斗争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他建立了伊斯兰党，这个党的口号是“政治活动第一，宗教活动第二”。在抵抗运动中，其他人的目标不过是要赶走苏联人，推翻亲苏的喀布尔政府，而他却声称他还希望把圣战发展到苏联境内的中亚地区，把这些地区的穆斯林从共产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虽然这些组织的总部都在白沙瓦，但它们在阿富汗国内都有基地。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武装在抵抗运动中人数最多，他们在国内的势力范围主要是西部的赫拉特等地。拉巴尼的伊斯兰协会的军事力量由马苏德指挥，其活动地域主要是靠近喀布尔的潘杰希尔地区。

另外的四个党派则属于民族主义派别，其中盖拉尼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民族阵线和穆贾迪迪领导的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比较强大。这一派的主要成员多为毛拉、部落首领、牧主、地主等。由于土地改革、世俗化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也强烈反对苏联人和喀布尔傀儡政府。但与原教旨主义派别不同，他们只希望使阿富汗成为一个具有民主色彩的伊斯

兰国家，甚至赞成恢复原来的君主立宪制。

“七党联盟”在1984年的联合声明中说：

“鉴于我们笃信伊斯兰教的人民的历史性抵抗运动应该在国际社会取得其应有的地位，抵抗运动应该从人民中获得正式作为其事业的唯一代表权……七组织领导人一致同意统一反抗共同敌人的力量，建立强有力的统一战线，在《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的名义下，手携手，肩并肩，持续不断和毫不留情地进行解放祖国的斗争。”

“八党联盟”则是由8个什叶派穆斯林组织联合组成的“伊斯兰革命联盟”，总部在伊朗境内，也号称有10万圣战者。“八党联盟”的领导人都是什叶派教职人员，受伊朗革命的影响很深，并受到伊朗政府的支持。什叶派的反苏武装活动主要是在与伊朗交界的哈扎拉地区。

这些被外界称为“伊斯兰圣战者”的抵抗组织虽然斗争目标大不相同，组成的成份也差别极大，但他们的共同点是用伊斯兰教为旗帜，动员群众进行反对苏联入侵者和亲苏政府。所以，一些西方分析家说，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其他地方主要表现为反对西方，反对资本主义，而在阿富汗则表现为“伊斯兰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他们称，在阿富汗进行的是一场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红星与新月之战”。

正是由于这一特点，阿富汗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得到了多数穆斯林国家的支持，尤其是那些伊斯兰色彩强烈的国家的支持。因为在它们看来，如果苏联的意识形态能在阿富汗取得胜利，那它就将会进一步在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方发展，最

终将会带来比西方化更糟的结果。1981年1月，40个伊斯兰国家的首脑在沙特阿拉伯通过了《麦加宣言》，号召穆斯林进行全方位圣战。这个宣言说：“鉴于（苏联）在阿富汗犯下了侵略一个伊斯兰主权国家，侵犯阿富汗人民自决权的罪行，我们决心继续支持阿富汗人民进行战斗。”

长期以来，抵抗运动中的逊尼派组织一直得到巴基斯坦、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海湾国家、埃及等穆斯林国家的支持，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武器装备和财政援助。什叶派则得到与阿富汗相邻的伊朗的支持。有些国家的穆斯林还作为志愿者来到阿富汗，直接参加“保卫伊斯兰的圣战”。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出于遏制苏联的需要，也对阿富汗伊斯兰抵抗运动给予了慷慨的援助。80年代中期，阿富汗圣战者每年都可从国外获得大约5亿美元的援助，这一数字差不多是整个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在从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中，光是沙特阿拉伯就向阿富汗圣战者提供了10亿美元左右的援助，美国的援助也有近10亿美元。

在另一方面，喀布尔政府在军事和财政上也完全依赖于苏联，不仅有十多万苏军在战场上与圣战者浴血战斗，苏联的粮食、药品、武器军火也不停地运送到喀布尔，维持着脆弱的纳吉布拉政权。阿富汗成了一个国际势力的竞技场。为了反对苏联，美国以及西方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有的分析家说，正是因为有苏联支持的革命，有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金钱，有美国和西方的大量武器和物资，才会有阿富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蓬勃兴旺的发展。

由于有大量源源不断的外援，设在白沙瓦的各支游击队的总部不需要从事什么生产劳动，也不需要为武器装备操心费神，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这就是打仗，他们成了职业的



“圣战者”。圣战者们吃的是来自欧洲的牛羊肉，美国的大米面粉，东南亚的水果蔬菜，用的是最现代化的电子产品和武器装备。

伊斯兰抵抗组织的武装斗争严重打击了喀布尔的亲苏政权，也给苏联的军事占领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到1984年，全国70%的地区已在抵抗运动的控制之下。政府军的伤亡人数达1.7万人，苏军的伤亡在2万至3万之间。游击队的伤亡也超过了3万人。更使苏联政府狼狈的是，几乎在所有的国际组织和机构中，它都因出兵阿富汗而受到谴责，尤其是在第三世界更是成了众矢之的。

长期陷入阿富汗这个泥潭，使苏联在人力、财力和外交上都非常吃力。到1988年4月，日渐衰弱的苏联再也不堪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包袱了，它宣布逐步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当苏军全部撤走后，喀布尔政权勉强支撑了两年，最后终于在1992年初土崩瓦解。1992年4月以“七党联盟”为首的抵抗组织接管了喀布尔，改国名为阿富汗伊斯兰国。然而，阿富汗的战乱却仍没有结束。大敌当前，各派抵抗组织尚能一致对外，一旦外敌消除，圣战者们之间的纷争立刻就爆发了。谁来掌握国家权力？按什么样的模式来建立伊斯兰国家？各派之间无法取得一致，于是，又一场血肉横飞、兄弟阋墙的战争在他们内部开始了。

## 耶路撒冷之争

在地中海东岸与约旦河之间，有一片长长的楔形土地，这就是巴勒斯坦，《圣经》称为“流着奶和蜜的地方”。但今天这里却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争夺的一块是非之地，是当代中

东问题的核心。

3000多年前，犹太人曾生活在巴勒斯坦。公元一世纪前后，这里被罗马人征服，犹太人被迫向世界各地流散。伊斯兰教兴起后，巴勒斯坦成了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在此后的1300多年里，穆斯林一直生活在巴勒斯坦，成了这里的主人。但流散在欧洲的犹太人因不堪忍受当地民族的迫害和屠杀，19世纪后期他们中兴起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主张回到他们的故国巴勒斯坦，重建自己的国家。1917年，当时统治巴勒斯坦的英国发表了一个《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有了这张“通行证”，大批的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定居。但已在这里生活了许多世纪的阿拉伯人却反对犹太人的到来，于是，两个民族争夺一块土地的冲突就产生了。

1947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巴勒斯坦一分为二，让当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分别成立自己的国家。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很快成立了，但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国却没有建立起来。在随后爆发的第一次阿以战争中，划分给他们的土地也被以色列和另外两个阿拉伯国家埃及和约旦占领了。在30多年间，以色列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打了5次大的战争，几乎每次都是以以色列的胜利而结束。1967年的“六·五”战争阿拉伯人败得最惨，不仅原来巴勒斯坦的全部领土（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东耶路撒冷）都落入以色列手中，连埃及的西奈半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也被以色列人占领。

在过去，巴勒斯坦问题一直主要表现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民族冲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以民族主义为旗帜，斗争的领导者是世俗的民族主义者。然而，自从1967年以后，巴勒斯坦问题也逐渐“伊斯兰化”了。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伊斯兰教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耶路撒冷落入了以色列人手中。

在伊斯兰教中，耶路撒冷是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第三大圣城。据传，穆罕默德在创立了伊斯兰教后的第9年（即公元619年）的一个晚上，忽然受大天使伽百利的召唤，让他乘一匹飞马，从麦加来到耶路撒冷，并从这里登上七重天，聆听真主安拉的启示和祝福。穆罕默德在七重天上还见到了亚伯拉罕、摩西、耶稣等其他先知。《古兰经》中也有关于穆罕默德这次夜行的记载：“赞美真主，超绝万物，在一夜之间，使他的仆人从禁寺行到远寺，他在远寺的四周降福，以便我昭示他我的一部分迹象。真主确是全聪的，确是全明的。”（第17章第1节）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后，一度规定穆斯林祈祷的方向是耶路撒冷。

阿拉伯大军公元636年征服耶路撒冷后，在这里建起了两座宏伟华丽的清真寺，一座叫阿克萨清真寺，中国穆斯林也称为“远寺”；另一座叫做“岩石圆顶清真寺”，在这座清真寺高大的金色圆顶下，有一块巨大的岩石，据说穆罕默德就是踏着这块巨石登上七重天的。这两座精美的大清真寺被认为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建筑杰作。由于穆罕默德“夜行登霄”的故事和这两座雄伟壮观的清真寺，耶路撒冷备受穆斯林崇敬。建有这两所大清真寺的一块长方形平台被称为“尊贵的圣地”，其地位仅次于麦加的天房和麦地那的先知墓。

但犹太人却认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圣城，因为耶路撒冷曾经是古犹太国家的首都，古希伯来人在这里建立过犹太圣殿。至今，耶路撒冷还有一堵古犹太圣殿的残墙，被称为“哭墙”，因为每逢犹太教节日，一些犹太教徒还会到这堵墙

前祈祷哭泣，缅怀他们的先人和追忆民族的苦难。“六·五”战争中，以色列从约旦人手中夺取了耶路撒冷古城，称这是“解放”他们的圣城。战争一结束，以色列议会很快就通过了一个法案，宣布“统一的耶路撒冷是它永恒的、不可分割的首都”。为了恢复和修建犹太圣地遗迹，以色列政府拆毁和搬迁了一些穆斯林的建筑。有些狂热的犹太教徒还煽动要拆毁阿克萨清真寺，重建犹太圣殿。

因此，耶路撒冷之争成了整个伊斯兰世界与以色列斗争的一个焦点。1968年，在开罗召开的一次世界伊斯兰宗教学者大会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以色列对耶路撒冷伊斯兰宗教建筑的破坏，要求穆斯林起来保护伊斯兰的神圣教产（瓦克夫）。1969年7月，著名的阿克萨清真寺突然失火，虽然大火很快被扑灭了，但仍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清真寺里著名的欧麦尔礼拜堂被严重烧坏，有数百年历史的撒拉丁讲坛等一批伊斯兰艺术珍品也被焚毁。以色列当局后来说，被抓获的纵火犯叫麦考尔·洛汉，是一名澳大利亚人，患有精神病。但这一事件在伊斯兰世界激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应，穆斯林们对圣地的前途深感忧虑，都认为这是以色列有意对伊斯兰圣地的破坏。他们都感到，耶路撒冷被犹太人占领是全体穆斯林的耻辱，解放耶路撒冷，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的斗争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义务，也是衡量每个伊斯兰国家政府合法性的一个标准。

1969年9月，25个伊斯兰国家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召开了第一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发出了对以色列进行“圣战”，和解放圣城耶路撒冷的号召。以后，历次伊斯兰会议组织发表的宣言都要重复号召进行解放耶路撒冷的“圣战”。有13个阿拉伯国家明确表示，它们将与任何承认耶路撒冷为以

色列首都的国家断交。1973年埃及、叙利亚发动的“十月战争”与以往的几次阿以战争不同，采用了大量的伊斯兰口号，战争以先知穆罕默德战胜多神教徒的战役“巴德尔”为代号，并称是对犹太复国主义敌人的圣战。70年代各地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也无一不以支持巴勒斯坦事业、解放耶路撒冷为自己的口号，如伊朗的伊斯兰革命、黎巴嫩什叶派“真主党”等。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1979年宣布，每年伊斯兰斋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为“国际耶路撒冷日”。这个提议得到广泛的响应，每年这一天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方都要举行大规模反对以色列的集会示威。

在国际政治中，由于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问题越来越表现为伊斯兰世界与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的斗争，许多穆斯林国家是从伊斯兰的角度，而不是从民族的角度来参与斗争和承担义务。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占领，使它不仅只是阿拉伯人的敌人，也使它成了全世界十亿穆斯林的敌人。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一些非洲国家并不是阿拉伯国家，他们对以色列所持的强烈敌视态度，完全是出于伊斯兰宗教感情，而不是出于民族、国家利益等因素的考虑。另外，在支持巴勒斯坦斗争的阿拉伯国家中，原来起领导作用的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等世俗民族主义国家的影响下降，而传统伊斯兰教势力较强的海湾国家的影响上升。到70年代后期，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都承担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反以斗争更大的责任。这也使得巴勒斯坦问题的伊斯兰色彩更浓。

巴勒斯坦问题“伊斯兰化”的另一个方面是在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的斗争中，伊斯兰教的作用也愈加突出。一直领导巴勒斯坦人进行斗争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基本上是一个世

俗性的民族主义组织。但自70年代以后，巴解组织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伊斯兰语言。如1978年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到圣地麦加朝觐时宣称，解放巴勒斯坦是真主的命令，是任何一个穆斯林都不能免除的义务。除此之外，更加明显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量在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崛起。有一项调查表明，70年代初，每天祈祷五次的人只有41%，每天读《古兰经》的人为11%，到了80年代初，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为49%和14%。而难民营中参加宗教活动的穆斯林的比例远远高于在普通城镇和乡村的穆斯林。1979年在约旦河西岸的比尔宰特等几所大学的学生会选举中，伊斯兰组织都赢得了超过半数的选票。这说明人们把参加伊斯兰活动作为表达不满和寄托希望的一种方式。

诞生在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在40年代就传入了巴勒斯坦，并一直秘密存在于穆斯林中。在70年代期间，兄弟会的发展非常迅速。它公开的活动是宣讲教义、组织穆斯林祈祷、收取天课（扎卡特）并开展济贫事业等。实际上，它通过这些活动发展成员，建立组织，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在一份秘密文件中，穆斯林兄弟会提出这样几条纲领：1. 由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都失败了，唯一的办法是回到真正的伊斯兰教，只有伊斯兰才是反对以色列的有效武器；2. 敌人在与巴勒斯坦人的斗争中使用了宗教武器，因此唯一有效的回答是也在斗争中把伊斯兰教作为武器。伊斯兰教在过去的历史中证明是成功的武器；3. 伊斯兰解决办法的实际步骤是，首先是建立组织，开展对穆斯林的教育，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伊斯兰社会，然后进行对以色列的“圣战”。

被占领土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除穆斯林兄弟会之

外，还有“圣战者组织”、“伊斯兰解放党”等。它们都赞成用“伊斯兰办法”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即用圣战解放巴勒斯坦，反对任何形式的和平谈判。另外，这些伊斯兰组织都不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称巴解组织的《民族宪章》是世俗主义的纲领。在开始时，它们也不与巴解组织发生冲突，只是与之竞争。但到了后来，当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加深和实际利益发生矛盾时，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80年代初，在被占领土的几所大学里，时常发生学生之间的原教旨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的暴力冲突。

这样，在以色列当局看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兴起，可以遏制巴解组织的发展，分化巴勒斯坦人的力量。因此，它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活动，只要不超出一定的范围，并没有进行严格的限制，只是采取监视和防范的态度，而把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力量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

正是在这种适宜的内外条件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在以色列占领下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发展了起来。到80年代后期，它已成为当地最强大的一支政治和军事力量。在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1987年宣布开始的反以武装起义中，穆斯林兄弟会以“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为旗帜，成为反对以色列的主要力量，并大有取代巴解组织之势。

## 卡扎菲的“伊斯兰文化革命”

1969年9月1日，一群年轻的军官在利比亚发动了一场未流血的政变，推翻了年迈昏庸的伊德里斯国王，使利比亚从君主制国家变成了一个共和国。政变的领导人是27岁的穆阿迈尔·卡扎菲上尉，他自称是埃及民族主义领袖纳赛尔忠

实的学生和崇拜者。夺取政权后，卡扎菲把他自己由上尉晋升为上校，成为了执掌利比亚国家大权的铁腕人物。

长期以来，利比亚社会中流行着一种叫做“赛努西教团”的民间伊斯兰宗教组织，这是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派别。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派运动一样，兴起于19世纪初的赛努西宗教运动，要求信徒恪守经训、教法，过简朴生活，提倡禁欲，注重精神与道德的修养。赛努西运动还强调信徒们对教团领袖的服从，很多信徒还在一起集体从事生产劳动和过宗教生活，所以，赛努西教团为分散的部落和家族之间的联合提供了基础。1951年利比亚摆脱意大利的殖民统治取得独立，赛努西教团的最高领导人伊德里斯就成为了利比亚国王。伊德里斯王朝建立后，赛努西运动逐渐失去了它早期的原教旨主义色彩，趋于世俗化和保守化。

卡扎菲认为赛努西教团不符合真正的伊斯兰教，它已受到了“污染”，所以应该将其坚决取缔。他执政后，过去支持伊德里斯国王政权的传统宗教阶层（乌勒玛）受到打击，一些人被投进了监狱，还有一些人逃到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其他国家。但卡扎菲对伊斯兰教并不是采取否定的态度。他本人对伊斯兰教就表现出极端的虔诚，本来伊斯兰教规允许推迟祈祷，可是卡扎菲却经常会停止正在进行的会谈或与别人的会晤，走开去做祈祷。卡扎菲认为，伊斯兰教在本质上“比共产主义更进步”，“比资本主义更注重人的价值”，“它规定了经济制度，规定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富足、正义、自由的社会基础”，因此应该把它与阿拉伯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作为利比亚的发展道路。在伊斯兰世界，卡扎菲成了第一个公开宣布放弃走西方式现代化道路，而推行伊斯兰教和社会主义结合的道路的国家领导人。他相信，伊斯兰



教是注定要在世界上获胜的宗教。他说：“伊斯兰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也是一种社会革命。如果全世界都信奉伊斯兰教，全人类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自1971年起，卡扎菲宣布在利比亚进行“伊斯兰文化革命”，开展清除西方文化、净化思想的群众运动。利比亚长期是意大利的殖民地，伊德里斯国王时代，社会中保留了很多欧洲文化的影响，并沿用意大利的法律制度。“伊斯兰文化革命”最先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禁止饮酒和赌博，清除一切公共场所中挑逗、淫荡的内容，在所有通讯和出版物中使用阿拉伯语和伊斯兰历日期（包括发给外国人的各种证件），把一些原来用西方文字命名的地名、街道一律改为阿拉伯名称，并关闭了利比亚所有的基督教教堂、神学院，等等。在政府的鼓励下，许多青年学生和民众上街捣毁传播西方生活方式的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封闭放映西方影片的电影院，并冲入学校、书店、广播电台和新闻出版机构，焚烧各种“有害”的文化宣传品。这些做法在当时不仅使西方国家瞠目结舌，也使多数伊斯兰国家感到惊讶不已。

使很多人更为吃惊的是，1972年利比亚宣布将开始实行伊斯兰法律制度，将按照《古兰经》的规定对偷盗、抢劫、私通、做伪证和饮酒、赌博等罪行进行惩罚。而且，卡扎菲政府还宣布利比亚将根据伊斯兰经济原则禁止利息，收取宗教什一税。因为在70年代初，尽管伊斯兰复兴的潮头已经开始兴起，但还没有哪一个国家领导人敢像卡扎菲这样说干就干。

卡扎菲称利比亚的“伊斯兰文化革命”已使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他还利用利比亚的高额石油收入建立了“伊斯兰圣战基金”，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伊斯兰教事业给予资助，例如他一出手就给了美国黑人穆斯林组织500万美元，帮

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清真寺。70年代中，利比亚派出许多伊斯兰宣教人员，到一些亚、非、欧国家去传播伊斯兰教。对卡扎菲的“伊斯兰文化革命”，伊斯兰世界的一些宗教人士既惊又喜，惊的是在他们看来属于世俗和激进势力的卡扎菲竟然会对发展伊斯兰教有如此高的热情，但又不知道他这样做最后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喜的是不管怎么说，卡扎菲毕竟是在宏扬伊斯兰教，是用伊斯兰教与东方的共产主义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对抗。

然而，不久后，一些伊斯兰宗教人士和学者指出，卡扎菲的伊斯兰口号有许多怪诞之处，一些东西往往是他自己随心所欲的发明创造，与公认的教义准则是格格不入的。例如，他以“伊智提哈德”（独立判断或推理）为理由，基本上否定了在伊斯兰世界被奉为经典的《圣训》。他不承认“沙里亚”法律体系，认为它们都是后世的乌勒玛编造出来的，他所要实行的伊斯兰法必须是《古兰经》中有明文规定的。但他又说，每个信教者都可以根据需要自己来解释《古兰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卡扎菲表现得越来越离经叛道。例如，他1978年竟提出，伊斯兰教历不应从公元622年开始算起，而应从穆罕默德去世的公元632年开始；他嘲笑穆斯林到麦加朝觐是“没有意义的胡闹”。后来，他干脆说，《古兰经》可解决个人的道德和信仰，适用于个人事务，但不适用于公共事务。为了找到伊斯兰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卡扎菲从1976年到1979年写出了一本《绿皮书》。

《绿皮书》包括三个互相独立的小册子，分别就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全面反映了卡扎菲的激进思想。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所谓的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世界第三理论”。他之所以把这本书称为《绿皮书》，是因为

伊斯兰教崇尚绿色。但一些穆斯林认为，《绿皮书》实际上是把激进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与某些伊斯兰政治思想融合在一起，构成了卡扎菲的“革命哲学”。

卡扎菲根据《绿皮书》的政治思想在利比亚社会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践。1977年，他把利比亚共和国改名为“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取消了各级政府机构，代之以“人民委员会”。他还取消了土地私有制，让民众直接拥有和管理各种生产资料。由于利比亚石油产量很高，有大量的外汇收入，卡扎菲这些令人瞩目的试验也居然能进行下去。到70年代后期，卡扎菲甚至自认为是一个新的先知，可与穆罕默德相提并论。他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还有什么穆罕默德做过的事情我没有做？我给你们带来了解放，为你们赢得了国际地位。”一次，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他谈到了他的《绿皮书》，说：“《绿皮书》是人类解放的指南。它是福音书，是新时代的福音书，是人民大众的福音书……它的语言能够摧毁世界，也能拯救世界。”

到80年代，卡扎菲领导下的利比亚，由于其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已在国际社会成了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国家。但大多数伊斯兰世界的权威人士认为，卡扎菲的伊斯兰教已偏离了正道，成了一种宗教异端。爱资哈尔清真寺的宗教学者们宣布，卡扎菲严重歪曲了伊斯兰教，他是一个异教徒。沙特阿拉伯的乌勒玛最高委员会也称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反伊斯兰教的”，号召所有穆斯林起来反对他的思想。但卡扎菲对这些批评不屑一顾，仍然保持着他那桀骜不驯，我行我素的做法。

然而许多伊斯兰激进组织对卡扎菲却怀有好感，他们虽然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但对他敢做敢为的行动很佩服。尤

其是卡扎菲敢与美国和西方针锋相对地斗争，更是赢得了许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的喝彩。卡扎菲对各国伊斯兰反对派也从精神和物质上给予支持。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霍梅尼号召全世界穆斯林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卡扎菲率先响应。他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随后示威者们一把大火烧掉了美国驻利使馆。美国和西方国家纷纷骂卡扎菲是“疯子”、“狂人”、“恐怖主义分子”，卡扎菲也不在乎。

1981年，卡扎菲拿出了很大一笔钱，建立了一个“世界伊斯兰宣教协会”，向全世界宣传他的这一套宗教观点和主张，与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支持的“世界伊斯兰联盟”和“世界穆斯林大会”分庭抗礼。卡扎菲为这个协会在的黎波里修建了一座极漂亮豪华的五层楼总部，以及一座富丽堂皇的国际会议中心。“世界伊斯兰宣教协会”主要在黑非洲和东南亚开展活动，因为沙特、伊朗、埃及等国家在这些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个协会提供奖学金，为这些地区培训伊斯兰教职人员，召开国际会议，免费向许多国家提供伊斯兰宣传品和《绿皮书》。这个协会采用的一种传教方式是向贫困落后地区派出医疗队（其中有不少医务人员是利比亚用高薪聘请的西方人），一方面为当地人民免费治病，一面积极传播伊斯兰教。这在南部非洲尤其成功，津巴布韦的哈拉雷成了“世界伊斯兰宣教协会”在国外最大的活动中心。

不管怎么说，卡扎菲在利比亚发动的“伊斯兰文化革命”，推行的“伊斯兰社会主义”，以及他在国际上以他自己独特的“伊斯兰方式”所进行的各种活动，都是70—80年代国际伊斯兰大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极有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

## 这里，伊斯兰在静悄悄地复兴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伊斯兰复兴运动除了以暴风骤雨、轰轰烈烈的形式在一些国家开展外，也以不动声色、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在另一些国家进行着。而实际上，它对这些国家政治、社会和人民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亚于那些引起轰动的国家。

**巴基斯坦** 与有着悠久历史的埃及、伊朗、阿富汗等国家不同，巴基斯坦是一个年轻的伊斯兰国家。它原是印度的一部分，1947年才脱离印度单独成为一个国家。它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理由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不可能与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里。但实际上在50—60年代，世俗化还是在逐渐发展。尤其是这个国家与美国在外交上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在文化上也受美国的影响较深。政治斗争主要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与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之间进行，前者要求全面伊斯兰化，而后者对此却不以为然，经过长期的较量，原教旨主义派逐渐占了上风。巴基斯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最重要的领导人是阿布·阿拉·毛杜迪，他创建了这个国家最大的伊斯兰政治组织“伊斯兰促进会”。70年代中，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的世俗化倾向受到了以伊斯兰促进会为首的原教旨主义者的猛烈攻击。他们要求政治上全面伊斯兰化，并指责布托政府对孟加拉国1971年的分离负责。

1977年，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布托政府。为了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新政府成立后，立刻开始进行原布托政府一直不愿做的事：在全国全面推行“伊

伊斯兰化运动”。政府吸收原最大的反对派伊斯兰促进会成立了国家伊斯兰顾问委员会；一些有影响的原教旨主义者在政府中被委以重任。1979年全国开始全面实施伊斯兰法律；政府还特别通过一项法令，要求全国的雇主必须允许受雇者在祈祷时停止工作做祈祷，必须在星期五下午让雇员到清真寺做礼拜。1981年，齐亚·哈克宣布实行伊斯兰教的扎卡特税，废除银行利息，齐亚·哈克还宣布将阿拉伯语代替原来的英语作为国家的第一外语（乌尔都语是巴基斯坦的国语），在广播中增加伊斯兰节目，他甚至要求政府工作人员不得穿西服、打领带，而穿传统的民族服装。1982年，哈克又根据“伊斯兰民主”的口号，成立了一个协商委员会，并按《古兰经》的说法，把这个机构称为“舒拉”（协商）。一步接一步，齐亚·哈克政府的一系列做法，使巴基斯坦国内的伊斯兰气氛变得空前浓厚起来。

齐亚·哈克这种自上而下推行的“伊斯兰化运动”，虽然赢得了国内伊斯兰教势力的欢呼，也得到了一些伊斯兰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朗的支持，但却始终未能解决巴基斯坦所面临的一些最现实问题，贫穷、人口增加过快、地方主义、部族矛盾以及政党纷争等。这样，他仍然摆脱不了原教旨主义和世俗力量两方面对他的攻击，原教旨主义者认为他的伊斯兰化进程太慢，而且流于表面；而世俗力量则抨击伊斯兰化引起了国内的混乱。

**土耳其** 自从1922年凯末尔领导的民族主义革命成功后，土耳其走上了一条世俗化和欧洲化的发展道路。可以说，它是伊斯兰世界在世俗化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国家，但它同样也被卷入进了70年代兴起的伊斯兰潮流之中。

60年代后期，以民族秩序党为代表的一批伊斯兰原教旨

主义政党就开始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引起了世俗政府的不安。1971年在军队的支持下，民族秩序党被取缔，罪名是这个党的宗教性纲领与国家的世俗原则相抵触。但1972年，民族秩序党又以救国党的名义重新出现了，并以合法政党的身份参加了政治舞台上的角逐。与其他许多国家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一样，救国党的成员大多是受过世俗教育的知识分子，具有很强的参政能力。救国党的影响发展很快，在1973年的大选中获得了12%的选票。与此同时，一些民间传统的苏非派（神秘主义）教团也活跃了起来，绝迹多年的传统妇女服装“恰尔沙菲”又出现在街头，甚至出现在大学的校园里。清真寺的数量成倍地增长。一时间，伊斯兰教势力上升，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的冲突日趋激烈，暴力活动不断，加上经济情况越来越糟，全国局势动荡。

1980年军队发动政变，成立了以埃夫伦将军为首的军政府。军人政权重申坚持凯末尔的世俗原则，不允许宗教干预政治，要求宗教活动“回到清真寺里去”，并解散了所有政党。但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民主秩序的恢复，宗教政治活动又开始在各地活跃起来，在军队中、政府部门中、大学中都出现了原教旨主义的支持者，教团活动也在边远的乡村中蔓延。有人认为，到一定时候还要靠军队出面制止伊斯兰教势力的发展。土耳其就是这样一次次地靠军队把国家从伊斯兰的道路上拉回到世俗的道路上来。

**马来西亚** 即使在远离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东南亚地区，伊斯兰复兴运动也在“静悄悄地”进行。在马来西亚1500万人口中，穆斯林只占大约一半，主要是马来族，另外还有华人（30%）、印度人（10%）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他们都不信仰伊斯兰教。马来西亚1957年取得独立后规定伊斯兰教

为国教。

马来来西社会的特点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人普遍比较贫穷，而华人、印度人比较富，因此不同的民族集团之间还存在着宗教、阶级的差别。历史上，民族集团间曾发生过斗争和冲突。70年代中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要求使整个国家伊斯兰化和马来民族化的潮流，在野的全国第二大党泛马来西亚伊斯兰党不断向联邦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以伊斯兰法为国家法律，并要求提高乌勒玛（传统的宗教阶层）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同时，一些民间非政治性的伊斯兰组织，如马来西亚青年穆斯林运动、马来西亚伊斯兰福利组织等传教团体也在积极行动，一方面要求穆斯林加强信仰，另一方面大力在华人和少数民族部落中发展穆斯林。据这些组织称，自60年代开始，到1979年为止，已有16万人改信了伊斯兰教。全国的清真寺也从1967年的两千座增加到了1979年的四千座。这一时期，还发生了数起极端的穆斯林破坏和拆毁华人的佛教庙寺和印度教徒庙寺的事件。

长期执政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是以穆斯林为主的政党，它在推行民族一体化（马来化）的政策时，对伊斯兰活动持鼓励态度。特别是当1981年马哈蒂尔成为政府总理后，对伊斯兰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1982年马来西亚正式宣布实行“政府机构伊斯兰化”，并建立了一系列机构：伊斯兰银行和保险公司，伊斯兰经济发展基金，伊斯兰国际大学，伊斯兰医疗中心，等等。马哈蒂尔还在对外关系上突出马来西亚的伊斯兰色彩，尽力向伊斯兰国家倾斜，宣称“伊斯兰集团对我们来说，比不结盟运动和英联邦都更加重要”。他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和反对以色列的坚决态度，使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都称赞说：“马来西亚比某些阿拉伯国家与我们还要



亲密。”

## 伊斯兰复兴运动总览

总览 70 年代末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有这样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首先，从地域和空间来看，它是一个超民族、超国家、超越政治制度的国际性运动，不局限于信仰伊斯兰教的某一个或几个民族，也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波及整个伊斯兰世界。复兴运动以中东地区为核心，辐射到北非、南亚、东南亚、中亚、中非，并波及欧、美。伊斯兰世界中无论是保守的君主制国家，世俗化的议会制国家，还是激进的军事独裁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到运动之中。它波及的地域之广、民族之多，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从时间上来看，伊斯兰复兴运动比较集中地发生在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这一期间。它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发展的速度非常快。由于规模大，来势猛，伊斯兰复兴运动就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潮，对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形成了一次猛烈的冲击。这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二、这次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呈现出多中心、多样化。

虽然伊斯兰复兴运动来势猛、范围广、影响大，但它却不是—个统一的运动。它既没有统一的领导，也没有统一的纲领和目标。它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在有的国家表现为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如伊朗），在有的国家表现为循序渐进的社会改革和信仰复

归（如海湾国家和印尼、马来西亚等），在有的国家也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社会伊斯兰化”运动（如在巴基斯坦、利比亚、苏丹等），在有的国家则表现为各种激进的暴力恐怖活动（如埃及的“圣战者”，黎巴嫩的“真主党”等组织），还有的表现为以伊斯兰教为旗帜反对外部势力的斗争（如阿富汗穆斯林的反对苏联入侵的战争、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的斗争等）。

从规模和影响来看，伊朗毫无疑问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伊斯兰运动的一个中心。埃及由于有老牌的穆斯林兄弟会，国内存在着长期和激烈的政教斗争，对整个伊斯兰世界形成了极大的影响，也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一个中心。沙特阿拉伯因其重要的宗教地位，加上其政府推行的伊斯兰内外政策，当然也是一个中心。另外，利比亚、巴基斯坦、阿富汗，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中心。尽管它们都是以伊斯兰为旗帜，但在实际内容上差别极大，有的甚至是互相冲突的。

例如，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它们都宣称伊斯兰教是自己的立国之本，在国内都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并坚决反对世俗化和西方化。按理说，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应该比较密切。但情况并不是这样。由于双方分属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教派，两国实行不同的政治体制，伊朗是议会制的共和国，沙特阿拉伯是家族世袭制的君主国。因此，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双方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伊朗把沙特作为输出革命的目标，鼓动沙特国内的什叶派和极端分子起来造反。而沙特则在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中全力支持伊拉克，并与科威特、阿联酋等国组成“海湾合作委员会”与伊朗对抗。这种情况直到1990年的海湾战争后才发生改变。

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分歧和对抗在自80年代以来

的多次朝觐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1987年7月朝觐期间，数千名伊朗朝觐者在麦加大清真寺外高举霍梅尼的画像，呼喊反对美国、苏联，反对以色列的口号，举行示威游行。沙特当局认为这种政治活动不符合朝觐目的，派出军警进行了干预。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流血冲突，最后造成402人丧生、649人受伤的“麦加惨案”。死亡者中有275名伊朗朝觐者、85名沙特警察和42名其他国家的朝觐者。伊朗政府把这次惨案归咎于沙特和美国，德黑兰成千上万愤怒的伊朗群众高喊“复仇！”并袭击了沙特和科威特驻伊朗的使馆。沙特政府则指责事件是伊朗方面有预谋的行为，是伊朗人故意挑起的。沙特报纸说伊朗朝觐者中有许多人实际上是伊朗革命卫队成员，他们携带武器前来麦加挑衅，目的是进行颠覆活动，伊朗的活动是“亵渎神明的行为”。有的评论说，麦加惨案实际上是一次伊朗什叶派与沙特逊尼派之间的宗教战争。也有人说这是伊朗对沙特阿拉伯作为“圣地保护者”地位发起的挑战。

1990年7月，朝觐期间圣地麦加又发生一次震惊世界的惨案。这次主要是由于数万朝觐者在穿过一条隧道时秩序发生混乱，引起互相拥挤、踩踏后致使1400多人死亡。其中有562名印尼人、447名土耳其人、400名伊朗人。这一悲惨事件发生后，再次引起伊朗政府对沙特王室的激烈抨击。

三、从不少国家的情况来看，复兴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并不限于宗教界人士，而更多的是普通穆斯林群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及专业技术人员。整个运动有一种知识化、年轻化、激进化的趋势。有人对埃及伊斯兰激进组织进行过调查统计，发现这类组织中大约有40%的活跃分子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中有大学生、职员、工程师、教师、下级军官等。突尼斯、苏丹、

阿富汗等国的伊斯兰组织的领导人大都是大学教授。相反，传统宗教界人士在整个运动中的作用并不突出。在巴基斯坦、利比亚、马来西亚等国家中，由官方倡导的“社会伊斯兰化”运动受到下层穆斯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伊朗由于其独特的社会结构，伊斯兰革命的领导核心是传统的上层宗教界，但革命的主要支持力量仍然是下层穆斯林群众。

这一现象意味着伊斯兰复兴运动主要是一种广泛的、群众性的政治社会运动，而不是狭义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思想的复兴。它的目的是希望利用伊斯兰教来解决当前各伊斯兰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与以往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宗教复兴”是不同的。

为什么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会出现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呢？人们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认为，伊斯兰教的发展有一种规律性，那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大约一百年左右）伊斯兰教的内部就会产生“宗教复兴”或“宗教改革”运动，清除外来影响，重新净化宗教，从而保持伊斯兰教的活力。因而，他们认为这次复兴运动也是这种周期性运动的一部分。确实，从时间上来看，这次复兴运动兴起于伊斯兰教历14—15世纪之交（1979年底），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它与这种“百年复兴”思想是有一定联系的。

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告诉我们：“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同时也告诉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每个不同的阶级都利用它自己认为合适的宗教”。对于伊斯兰复兴运动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仅用一般的逻辑推理是很难得出正确结论的。我们只有从伊斯兰教本身的特殊性，从当代伊斯兰世界的社会状况和历史背景来进行综合的分析和判断，才能比较客观地认识伊斯兰潮兴起的

原因。

同历史上所有的政治社会运动一样，70年代末兴起的这个“伊斯兰复兴运动”也有它特定的政治和社会内容，反映了各伊斯兰国家社会中的内外矛盾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世界经历了一个激烈变化的时期，在世俗化、西方化的冲击下，家庭关系、部族关系发生了动摇，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速度远远超过了人们思想意识的发展水平。在这种激烈的变化中，伊斯兰教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方面的连续性，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感到陌生和苦闷的人们纷纷聚集在伊斯兰的旗帜下，以伊斯兰教为标准去衡量和判断身边所发生的变化。另外，一些国家认为各种外来的政治思想、社会制度、发展道路都不能解决本国所面临的问题，于是有着辉煌历史的伊斯兰教便成了它们的选择。

由于伊斯兰世界地域广阔，国家众多，情况各异，这就决定了伊斯兰复兴运动不可能是一场统一的运动，而只能是在伊斯兰教旗帜下各个不同国家所发生的各种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反映，它们的表现形式、领导力量、斗争目标都不尽相同。但从总体来看，复兴运动的发展有一点却是比较明显的，这就是伊斯兰大潮中的原教旨主义倾向。

## 第四章

# 真主之路

我们已看到，70年代末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许多领域。但它又远远不是一个统一的运动，复兴浪潮此起彼伏，时疾时徐；复兴运动中派别众多，五花八门，行动各异。然而，人们不难看出，有一股始终贯穿其中的强大力量在推动着运动的发展，左右着运动的方向。这股力量坚决地反对世俗化和西方化，要求改变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主张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返回伊斯兰教的初始教义。它是这场运动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伊斯兰复兴运动中最强大的潮流，是这场运动的主旋律。这股思潮现在被广泛地称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投身于这一运动的人被称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埃及一位这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把他们所致力运动称为“真主的道路”。

###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一词最初起源于基督

教，原来指的是基督教中“严格遵循基督教信仰中原初的、根本的、正统的信条”的派别。现在这个词已被用来指各种宗教中要求返回初始原典教义的派别和主张。近一些年来，世界上几个大的宗教中都有“原教旨主义”倾向抬头的趋势，除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外，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犹太教原教旨主义、印度教原教旨主义、锡克教原教旨主义的出现，各种宗教间冲突的加剧，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甚至还有的人认为，近年在东亚的中国、日本、韩国等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都出现了重新认识和追求传统的东方儒家文化的趋势，这是“孔教原教旨主义”在兴起。

什么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从伊斯兰教的历史说起。

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时，也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社团（即乌玛）。他本人既是宗教领袖，同时也是最高行政领导人。他通过接受真主启示的方式，颁布了大量的宗教命令和法规，这样就使当时乌玛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完全处于伊斯兰教的绝对支配之下。后来，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很多穆斯林逐渐把这个时期理想化了，认为这个时期的伊斯兰教是真正的、纯洁的伊斯兰教，没有夹杂任何不纯正的东西，是伊斯兰的“黄金时期”。

以后每当伊斯兰世界内部出现危机，或无力与外敌对抗时，一些穆斯林往往就会把问题归结为信仰的淡漠或是伊斯兰教受到了玷污，认为人们的信仰偏离了伊斯兰的原旨教义。于是，就会发起要求严格遵守《古兰经》和《圣训》，摒除杂芜，返回原旨教义的运动。这种主张就是原教旨主义，也有人称为复古主义。在他们看来，早在穆罕默德在世时，伊斯兰教就已臻于完善，后人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恢复伊斯兰教

的本来精神。但实际上，尽管原教旨主义者强调要净化宗教，返回原典，但他们并不是要求使社会完全回到7世纪穆罕默德所生活的时代中去，而是用当时的伊斯兰社会与现实进行比较，以宗教理想作为判断是非、衡量得失的标准，并以《古兰经》和《圣训》中的宗教原则为指导，最终达到加强信仰、革除弊端，使宗教重新获得活力的目的。所以，原教旨主义的实质乃是伊斯兰教在发展过程中，进行自我调节，自我更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的一种手段。

原教旨主义并不是当今世界才有的新事物。从伊斯兰教历史来看，曾出现过多次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思潮和运动。如早在7世纪就出现的哈瓦利吉教派就认为，当时的哈里发已背离了真正的伊斯兰教，穆斯林应该起来同他战斗。14世纪当阿巴斯王朝崩溃，伊斯兰世界被蒙古大军征服时，出现了由著名教法学者伊本·泰米叶（1263—1328）倡导的宗教复兴运动。当时蒙古西征大军铁骑所到之处，阿拉伯民族和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遭到空前的灾难。严酷的现实迫使他去思考，怎样才能使四分五裂的伊斯兰世界重新统一？如何才能恢复昔日阿拉伯国家的强盛？泰米叶通过对伊斯兰各派学说的研究，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伊斯兰教已与早期的伊斯兰教有了很大的差别，它已受到了许多异教的影响，出现了新的多神崇拜和异端学说，他决心复兴早期伊斯兰的原始教义，提出了“回到《古兰经》里去”的著名口号。因此，伊本·泰米叶也被后世看作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鼻祖。18世纪当奥斯曼帝国衰落，出现宗教危机时，阿拉伯半岛兴起了旨在净化伊斯兰教的瓦哈比运动，提出用宝剑恢复正教信仰的主张。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扩张，伊斯兰世界开始全面衰落时，也曾出现过北非的赛努西运动，苏丹的马赫迪



运动，以及后来的“沙拉菲亚”运动（即伊斯兰现代主义改革与复兴运动），等等。这些都是某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世界不仅从外部受到东西方大国的控制和渗透，内部世俗化、西方化的趋势也在迅速发展，各国都面临失去自身伊斯兰特征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激进的、斗争性更强的、同时也更富于政治色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便在各国内传播开来，它强调“只有伊斯兰才是唯一的出路”。原教旨主义强烈抨击社会中权势阶层的腐化堕落，要求实现平等和正义，表达了中下层穆斯林群众的愿望，也体现了他们希望改变现实的要求，因而吸引了大批在社会急剧变化中感到失望和幻灭的群众的拥护，并成为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主流。

当前兴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浪潮，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历次运动，因为在今天，科学技术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已极大地丰富起来了，如何用伊斯兰教的原旨教义来解释并适应这一切，是当代原教旨主义者面临的重要问题。原教旨主义者所关心的问题还包括，穆斯林社会在利用和享受西方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如何防止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持穆斯林社会的特征；在新一代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如何发挥乌勒玛的作用；如何在当代社会中按伊斯兰教义维护穆斯林妇女的地位等等。因此，从这些问题的提出，也可以看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是一种“狂热无知”、“愚昧落后”的纯粹复古、倒退运动。

伊斯兰复兴运动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这就是当代原教旨主义者中的绝大部分人并不是伊斯兰国家中传统的宗

教界人士，恰恰相反，他们中最活跃的人往往是一些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甚至有许多人是在西方国家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在西方社会中生活过很长时间的人。传统的宗教势力还往往是他们攻击的重点目标，他们认为传统的宗教阶层对内与腐败的统治集团相勾结，而对外来非伊斯兰教势力的入侵和渗透却软弱无能。

学术界有些人认为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来称呼当代这股伊斯兰潮流并不恰当，因为一方面“原教旨主义”这个词原出自基督教，另一方面，“原教旨主义”也不能准确地表达这股潮流的性质和特点，因为这个运动的重点是在政治而不是在宗教本身。因此，除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一些名词，如“伊斯兰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好斗的伊斯兰”、“激进的伊斯兰”等，指的也都是这一趋势。而许多穆斯林则只是把它称为“伊斯兰运动”或“伊斯兰主义”，或者是用阿拉伯语“伍苏勒”（“usul”，意为根源、原理）来表示。但总的看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词在政治界、学术界、新闻界已被广泛采用，而且也为许多人所接受。

对当代群众性伊斯兰复兴运动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原教旨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除了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的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之外，还有这样几个重要人物：巴基斯坦的阿布·阿拉·毛杜迪，埃及的赛义德·库特卜，以及伊朗的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另外，埃及的穆斯塔法·西巴伊、萨拉姆·法拉吉、贾瓦德·亚辛，伊朗的阿里·沙里亚提，土耳其的内季姆延·埃尔巴坎和苏丹的哈桑·图拉比等人，在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也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 当代第一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家 ——毛杜迪

尽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古已有之，但在当代条件下，根据原教旨主义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政治学说者，巴基斯坦的阿布·阿拉·毛杜迪（Abu Ala Mawdudi, 1903—1979）算是第一个人。

毛杜迪 1903 年出生于印度北部贾巴尔普尔的一个伊斯兰宗教家庭，从小就在家里接受传统的宗教教育，后又进入清真寺学校学习。但后来由于家庭中发生变故和他自己的健康原因，他未完成正规的宗教课程，而是通过自学成为一代著名的伊斯兰思想家。也或许正是因为毛杜迪不是完全按传统的正规伊斯兰教育方法培养出来的，他的思想才没有受传统思想的约束，才能创造性地发展伊斯兰政治思想。毛杜迪自己也说过，他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传统的乌勒玛（职业宗教学者），他们把精力耗费在一些虚玄神秘的问题和琐碎无用的考证上。

毛杜迪开始时曾是一名印度民族主义的热情支持者，参加过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但随着 20 年代中印度穆斯林恢复哈里发运动和民族主义者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的失败，以及看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越来越大的分歧，他对民族主义运动感到失望，从而把目光转向了伊斯兰教。他的伊斯兰政治思想形成于本世纪的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初，当时他担任一份宗教刊物的编辑。从当时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情况来看，印度的穆斯林既有可能组成一个单独的国家，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由印度教徒占统治地位的国家

中的少数民族。在这种情况下，毛杜迪提出了他自己的一套政治理论，既深入地论述了他关于国家形式、政治制度的看法，也涉及到诸如妇女地位、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关系等社会问题。

在政治上，毛杜迪一方面反对“异教徒”英国人的统治，反对穆斯林作为少数民族生活在印度教徒统治下的印度，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极力反对当时由真纳、伊克巴尔等“穆斯林民族主义者”领导的“穆斯林联盟”，认为“穆斯林联盟”的目的不过是要建立一个世俗的民族国家。毛杜迪强调，他所追求的不是一个“穆斯林国家”，而是一个“伊斯兰国家”。这个伊斯兰国家应该由具有基于《古兰经》和《圣训》的伊斯兰政治思想的人来领导，必须严格按伊斯兰法律“沙里亚”来治理。国家的统治者必须由人民直接选举，而且他应该有义务听取协商会议的意见。他还提出，这个伊斯兰国家的人民应该是“真正优秀的穆斯林”，他们应该摒弃一切印度教的、西方的以及非伊斯兰的影响，通过他们自己的模范行为来恢复和维护伊斯兰价值，通过具体的实际行动来建立一个完善的伊斯兰社会。

毛杜迪政治纲领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他很强调社会中杰出人物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一个伊斯兰社会的建立必须从上到下来完成，也就是说，必须依靠具有伊斯兰思想的领袖人物的领导。为了培养一批能领导实现社会伊斯兰化的优秀人材，他于1941年创建了“伊斯兰促进会”，并终身担任这个组织的主席。由于他非常强调促进会成员的质量，新成员要经过长期考察后才能被吸收，因此，促进会的人数一直不多，但影响却很大。例如，在1970年的大选中，虽然伊斯兰促进会只有2500多名正式成员，却在全国获得了250

万张选票。在开始时，他的追随者人数并不多。直到1947年印度穆斯林组成了独立的国家巴基斯坦后，毛杜迪的学说才开始进一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因为印巴分治后，大批从印度迁到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生活贫苦，安全得不到保障，对民族主义者领导的政府不满。另外，一些富裕的商人、地主也支持“伊斯兰促进会”，把它看作是一支与激进的左翼势力对抗的力量。

1947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分为两个国家后，毛杜迪从印度迁到巴基斯坦定居。虽然这时他已经生活在巴基斯坦，但他却反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并公开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因此，从1948年到1950年，他被巴基斯坦政府监禁。后来，他向当局作出了妥协，软化了他对政府的攻击，并致力于以非暴力和有组织的方式把巴基斯坦改变为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活动。尽管如此，随着巴基斯坦政坛上宗教与政治斗争的变化起伏，毛杜迪作为宗教力量的象征，后来又数次被投入监狱，1953年因牵连一起暴乱活动而几乎被判处死刑。但他建立的“伊斯兰促进会”一直作为合法的政治组织存在，并自50年代起多次参加了地方和全国性的选举。然而，伊斯兰促进会企图通过合法竞选取得政治权力的努力却很不成功，每次赢得的选票都很少，这种情况直到70年代才开始有所改变。

如果我们把伊斯兰促进会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相比，我们会发现两者有一些共同之处。这两个组织的创始人，哈桑·班纳和毛杜迪都不属于传统的乌勒玛阶层，而是普通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这两个组织都致力于社会的伊斯兰化，强调恢复早期伊斯兰的政治活力，反对世俗的民族主义，而且它们都对各自国家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这两个组织又有着极大的差别。虽然穆斯林兄弟会的成立早于伊斯

兰促进会，但兄弟会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政治纲领，只是含糊地提出要使埃及社会伊斯兰化，而促进会从一开始就根据毛杜迪的伊斯兰国家学说，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兄弟会在开始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带有民间帮会色彩的下层群众组织，而促进会却是一个由政治精英组成的现代政党。二者最大的区别大概在于，兄弟会很早就开始了暴力斗争，并一再遭到严厉的镇压，经历大起大落；而促进会的主要手段是非暴力斗争，希望通过合法的渠道来获得政治权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毛杜迪后来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政治学说。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根据古老的“哈瓦利吉”思想提出来的“净化伊斯兰教”的观点。他强调，世间一切权力皆属真主，只有真主才能统治人类，任何人的统治都是违反伊斯兰教的。他认为，没有实施真主统治，没有按神圣教法来治理的社会，都是处于“伽赫利耶”（即伊斯兰教之前的蒙昧时代）状态之中。毛杜迪说，现代穆斯林社会的“伽赫利耶”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先知穆罕默德及四位早期哈里发之后的历代政治领导人对伊斯兰教的附加和歪曲；一是受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他认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不应该仅只消极地接受伊斯兰教的信条，而且要积极投身于“扬善除恶”的集体行动之中，也就是在现实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社会生活中强化伊斯兰价值，使之摆脱“伽赫利耶”状态。他的这一观点，对当代各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和组织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某些社会和家庭问题上，毛杜迪却表现得非常保守。他主张社会中要实行男女分离，妇女出门必须戴面纱。虽然应该给予妇女选举权，但不应让她们获得重要的行政、立法权

力，他说：“根据伊斯兰教，各种政治和行政事务都是不适宜妇女活动的领域。”

毛杜迪一生写了 60 多部著作和大量的文章，作过 1000 多次演讲，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许多方面。他最有影响的著作是用大约 30 年工夫写成的《阐释古兰经》。他的这些原来用乌尔都语发表的著作和言论被译成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英语广为流传。他被看作是有着高尚品格和巨大智慧的伊斯兰思想家。他虽然不是职业的伊斯兰宗教人员，但他却被巴基斯坦人公认为是比任何人都学识渊博的伊斯兰学者。他的许多主张虽然未能实现，但对后来几届政府推行伊斯兰化运动，以及对下层的群众性伊斯兰反对派运动都有重要影响。70 年代末，齐亚·哈克在巴基斯坦推行“伊斯兰社会化”运动，许多做法都是按照毛杜迪的观点进行的。在此期间，伊斯兰促进会在社会中的地位也获得了空前的提高。

除在巴基斯坦外，毛杜迪的影响在印度、阿富汗、伊朗等地也非常突出。

## 阿拉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灵魂——库特卜

赛义德·库特卜 (Sayyid Qutb, 1906—1966) 出生在埃及中部阿西尤特省一个叫作穆夏的小镇。他年轻时来到首都开罗求学并寻找工作，后来当了一名教师。他早期是一名世俗的民族主义者，曾热情地支持过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这时，他广泛阅读了近现代伊斯兰思想家如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杜、拉希德·里达等人的著作，并深入地了解了埃及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下层穆斯林的思想状况。30 年代后期库特卜开始发表有关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文章

和著作。

库特卜 1948 年至 1950 年到美国去学习了一年，主修教育管理。这次学习使他对西方社会和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他感到，尽管西方世界物质生活发达，但精神空虚，社会腐败。他认为“西方道路”不可能解决穆斯林国家的社会问题。通过对英国在埃及、巴勒斯坦和法国在叙利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地的所作所为的观察，库特卜认为，西方国家的目标就是要完全征服和消灭伊斯兰。在他同时代的许多人转向了更加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却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即依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来解决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50 年代初，他的一部重要著作《伊斯兰与资本主义的冲突》问世，这也标志着他的思想已完全从世俗的民族主义转向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赛义德·库特卜从一开始就对穆斯林兄弟会持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并参加了兄弟会的一些活动，但此时他并没有正式加入兄弟会。同时，他与军队中民族主义者的“自由军官组织”也保持着密切的来往。1952 年，“自由军官组织”在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下推翻了法鲁克国王政权，建立了埃及共和国。但由于穆斯林兄弟会未能进入新政府，也没有获得任何权力，兄弟会与纳赛尔领导的民族主义政权的关系开始恶化并发生冲突。库特卜出于对新政府的不满，1953 年正式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走上了与纳赛尔政权对抗的道路。

1954 年，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些成员策划暗杀纳赛尔未成功，政府开始大规模镇压穆斯林兄弟会，数千人被逮捕，一些人被处死。库特卜也遭到了逮捕，经“人民法庭”审判后，他被判处 15 年徒刑。由于体弱有病，他服刑期间有很大一部



分时间是在医院中度过的，这样他就不必去做苦工，而可继续他的思考和写作。

由于对现政府从支持和希望转变为失望和仇恨，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斗争的一再受挫，加上长期的牢狱生活，使库特卜的思想变得十分激进。他集中了毛杜迪、哈桑·班纳等人的伊斯兰政治思想，经过他自己创造性的发展，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也更富有战斗性和号召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理论。他在狱中先后写出了《我们的宗教》、《我们这个宗教的前途》、《里程碑》（一译《路标》）等著作，并通过探望他的妹妹秘密地把手稿带出监狱，由外面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印刷、散发。这样，尽管库特卜还在狱中，他的著作已在外面秘密流传，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64年，纳赛尔政府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库特卜因健康原因也被提前释放了。库特卜出狱后，由于他的名气和影响，他立即又被穆斯林兄弟会推选为领导机构的成员。不久又被卷入进一些激进的兄弟会成员策划暗杀包括总统、内阁部长在内的一大批政府要员的密谋之中。密谋泄漏后，1965年8月库特卜和一批兄弟会成员再次被捕受审。在这次审判中；库特卜深知难以得到政府的宽恕，所以他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在法庭上全面阐述了他的伊斯兰政治思想。他的这些超国家、超民族、超阶级的理论震动了法庭，也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轰动。1966年8月，库特卜和一批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被政府处决，他当时正好60岁。

库特卜一生著述很丰富，其中影响最大、也最能代表他激进思想的著作是他在狱中写成的《里程碑》。他在这本书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理论，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

1. 对现实的彻底否定。库特卜认为，当代世界，包括所有的穆斯林国家现在都仍处于“伽赫利耶”（即伊斯兰教之前的蒙昧时代）之中。他说：

“我们今天处于与伊斯兰之前同样的，甚至是更糟的伽赫利耶之中，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伽赫利耶：人们的观念和信仰、习惯、风俗，人们文化、艺术和文学的来源，以及人们的法律和立法。即使那些被我们认为是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源泉或伊斯兰哲学和思想的东西，实际上也是这种伽赫利耶的组成部分。”

他认为，这种“伽赫利耶”在政治上表现为对真主在世间的权力的侵犯，即一些人自称有权规定道德、观念，制定法律和制度，从而导致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压迫。他称，无论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或者还是当时流行于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是“伽赫利耶”，因为它们都是出自人，而不是出自真主，都是让人服从人，而不是服从真主。他说，阿拉伯民族主义不是把主权归于真主，而是归于阿拉伯民族，因而是非伊斯兰的。

2. 重建真正的伊斯兰秩序。库特卜说，要摆脱“伽赫利耶”的办法就是采取行动建立真主完全的主权和统治权：

“宣告真主独一无二的神性……就意味着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种类和方式的人的统治，意味着在地球上摧毁人的王国，建立真主的王国……将权力从人类篡权者手中夺回，交还给独一无二的真主，取消人的法律，建立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神圣法律。”

库特卜提出，为了实现真主的统治，穆斯林要进行“希吉拉”（迁徙），要彻底脱离当代的这种“伽赫利耶”，重建一

个不受污染的和完全按照伊斯兰方式和标准而建立的社会，要完全排除诸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样一些非伊斯兰的影响。他提出的“希吉拉”并不是指地理上的迁徙，而是要求穆斯林用行动向“伽赫利耶”进行战斗，为真主的事业而奋斗（即圣战）。库特卜称：

“它仅靠说教和祈祷是不会实现的，因为那些把枷锁套在人民脖子上的人和篡夺了真主在地球上权威的人将不会因这样的解释和劝诫就让出他们的位置。”

库特卜强调说，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清除现存的非伊斯兰秩序，建立伊斯兰社会。这种“清除”不仅仅是改造或变革，而是彻底的摧毁。至于未来真正的伊斯兰社会具体是什么样子，库特卜并没有详细论述过，因为他认为，只有当清除了现存的非伊斯兰秩序之后，才有必要来考虑未来伊斯兰社会的具体法律和制度。

赛义德·库特卜的原教旨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下层穆斯林群众不满现状，要求变革的心理。他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时，慷慨陈言，视死如归，被许多人视为是为了伊斯兰理想而献身的烈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他的思想的传播。这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理论为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组织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他的著作是许多原教旨主义者的必读教材。在他的影响下，一些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也变得更加激进。兄弟会中后来又分化发展出一些更加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如“圣战者组织”、“赎罪与迁徙”等。

## 从宗教学家到国家领袖的霍梅尼

在世界上许多人的心目中，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具体形象就是伊朗的霍梅尼。这位头缠黑布、身着长袍，长着一把浓密的白胡须、两道粗黑眉毛、面目冷峻的老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简直就是国际伊斯兰激进力量的象征。

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 1902—1989）1902年出生于伊朗小城霍梅因的一个宗教世家，他的外祖父、父亲和哥哥都是阿亚图拉（什叶派高级宗教学者）。他本人在阿拉克和库姆接受了系统的宗教教育，后也成为一名学识渊博的伊斯兰学者。他自1922年起长期执教于库姆伊斯兰学院，并于40年代后期获得“阿亚图拉”的称号。到60年代初，霍梅尼成为伊朗六大阿亚图拉之一。他一生中写下了30多部宗教和政治著作，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讲演稿。他最早的政治性著作是一本叫做《揭示秘密》（1941年）的小册子。

霍梅尼与伊朗国王政权的公开冲突始于60年代初。他对巴列维国王推行的“白色革命”等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措施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并发动人民起来推翻国王政府。在霍梅尼和其他宗教界人士的号召下，1963年初，伊朗的库姆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国王出动军队进行镇压，并逮捕了霍梅尼。为了避免更大范围的动荡，国王不久又释放了他，但警告说：“除了自由、独立和外国势力的作用这三点之外，你可以谈论一切。”霍梅尼的回答却是：“但除此之外，我还能谈些什么呢？”他对追随者们说：“我准备让刺刀穿透我的心脏，但决不向暴君屈服。”他还拒绝了朋友让他迁居国外的请

求，说：“如果我们大家都走了，那么这个国家里就没有捍卫伊斯兰教的人了。”

1963年下半年，德黑兰等地又发生了大规模动乱，霍梅尼再次被捕，但他仍没有向国王低头。1964年他被强迫解送到土耳其，一年后他迁到伊拉克的纳贾夫，在那里著书立说，教授学生，继续进行反对国王的斗争。1977年底，霍梅尼49岁的儿子穆斯塔法在他的身边突然死去，人们都认为这是伊朗国王的特务机构“萨瓦克”进行的谋杀。1978年伊拉克政府在伊朗国王的压力下，宣布霍梅尼为不受欢迎的人，他再次被迫迁到法国巴黎郊区居住。尽管他在国外辗转流亡，但在国内伊朗人的心中已成了一位与专制腐败的国王政权顽强斗争的伟大英雄。在巴黎郊区，霍梅尼让他的随从们在他的住所外搭了一座帐篷式的清真寺，每天按时祷告，还在帐篷的四壁上用波斯文和法文写上“若屈辱，毋宁死”、“阿亚图拉霍梅尼将根据真主的裁决结束伊朗国王延续了2500年的统治”等标语，以表明他反对国王的斗争决心。

也就是在这一年，伊朗全国上下爆发了反对国王政权的动乱，数十万人走上街头，高举霍梅尼的画像，呼喊反对国王的口号，并与军警展开搏斗。在一波高过一波的群众示威浪潮冲击下，国王被迫离开伊朗，流亡国外。霍梅尼作为反对派领导人在国外遥控指挥了推翻巴列维国王的“伊斯兰革命”。1979年1月31日，霍梅尼结束了15年的流亡生活，凯旋般地乘飞机回到德黑兰，在机场受到了上百群众的热烈欢迎。这位年迈的伊斯兰学者成了掌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权力的“宗教领袖”，使伊朗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在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中，他领导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困难，对内开展了“社会

伊斯兰化”运动，对外既反对西方的资本主义，也反对东方的共产主义，以其独特的形象和和行为方式活跃于国际舞台之上。1980—1988年间，他还领导伊朗与相邻的伊拉克进行了长达8年、伤亡惨重的两伊战争。

霍梅尼晚年因年迈多病，一直深居简出。但在1989年2月，他还发出了要求全世界穆斯林杀死亵渎伊斯兰教的英国作家拉什迪的命令。1989年5月，他因肝癌接受手术治疗，6月3日病情恶化，在德黑兰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7岁。霍梅尼的葬礼也反映出他在伊朗人民中的巨大威望。6月4日那天，数以百万计的人群聚集在德黑兰街头，许多人放声大哭，用手不停地敲打自己的头，撕扯自己的衣服和头发，有的人哭得昏了过去。为了摸一下霍梅尼的灵柩，汹涌的人群阻挡住了灵车，争先恐后的人们互相拥挤践踏，结果造成6人死亡，数百人受伤。霍梅尼的裹尸布也被撕扯成了碎片。最后，当局出动了直升飞机才把霍梅尼的遗体运到墓地安葬。

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伊斯兰政治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他1970年在纳贾夫对其学生发表的一系列讲演中。这些讲演后被系统地编成了一本题为《伊斯兰政府：教法学者的统治》的书。与其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家相比，霍梅尼除了强调伊斯兰的包容性、要求在社会中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之外，他还根据伊朗的实际情况，在以下三个问题上提出了极有创新性的观点：

第一，认为君主制是违反伊斯兰教的。霍梅尼认为，无论在《古兰经》还是在《圣训》中，都没有关于实行君主制的任何记载，相反，却有指责君主制的地方。霍梅尼说，真正的伊斯兰国家的主权是属于真主的，国家的领导者只需要按真主的旨意来执行。而在君主制下，一切权力（包括立法

权)都在国王手中,这是专制和腐败的根源。因此,君主制是违反伊斯兰的,所有的现存君主制政权都必须推翻。他说:“伊斯兰从根本上反对整个君主制的概念……君主制度是最可耻和最万恶的反动制度。”

这样,霍梅尼就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当时强大的伊朗国王政权,从根本上动摇了国王政权的合法性。不仅如此,这一理论还威胁到了诸如约旦、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其他实行君主制的伊斯兰国家政权以及马来西亚的世袭苏丹政权,起了鼓动这些国家的穆斯林起来反对本国君主政权统治的作用。

第二,要实现伊斯兰的统治,必须建立伊斯兰政府,而领导伊斯兰政府的必须是伊斯兰教法学家。

霍梅尼认为,由于伊斯兰是包容一切、至高无上的神圣法律,它就必须以国家的形式体现出来。只有一个伊斯兰政府才能在社会中实施伊斯兰法,才能有效地征收什一税和天课,并把它们正确地用于社会需要。他写道:“必须有一个政府来承担伊斯兰法律的实施和全面应用各种伊斯兰措施,这在逻辑上是完全必要的。”

那么,由谁来领导这样一个伊斯兰政府呢?按伊斯兰教什叶派教义,只有先知穆罕默德及其之后的十一位继承者(伊玛目)才是伊斯兰社团合法领导人。霍梅尼认为,在第十二伊玛目隐遁期间,只有具有全面伊斯兰教法知识的教法学家才有资格来承担领导穆斯林社团的责任。在他看来,只有教法学家才最懂得穆斯林社团应该如何生活,国家应该如何按伊斯兰法律来治理。正是根据霍梅尼的这一思想,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建立了完全由教法学家领导的政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规定:

“在马赫迪伊玛目隐遁期间，对伊斯兰社团事务的指导将由虔诚的、具有时代感和勇气的教法学家负责；由人民多数选出的行政管理者将接受他的领导。”

第三，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霍梅尼又提出了“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口号。霍梅尼认为，现存的国际体系是不合理的，应该用伊斯兰世界体系来代替这一体系，使整个世界成为“在真主法律之下的人类之家”。他宣称，伊朗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真正的伊斯兰政府的国家，因而负担起领导实现全球伊斯兰化是伊朗的神圣使命。他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说：

“我们应该努力向世界输出我们的革命，应该抛开不输出革命的想法，因为伊斯兰是不分国家的，是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的。”

对于大多数穆斯林来说，霍梅尼的这些观点是非常独特和新颖的。霍梅尼自己也说过，他关于伊斯兰政府的思想在传统伊斯兰教中，甚至在《圣训》中都是找不到根据的。但他强调说，它们是根据伊斯兰的精神，按“伊智提哈德”（独立判断或推理）的原则提出来的，是以先知和其他伊玛目为榜样发展而来的。也正是根据这种“伊斯兰逻辑”，伊朗在革命后可以采用许多诸如“宪法”、“议会”、“总统”、“内阁”等这样一些来自西方的政治概念。

霍梅尼的政治思想体系与其他伊斯兰政治理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但提出了用伊斯兰教破除现存的政治制度，而且还按照现代的政治原则详细设计了新的国家政治结构，不仅如此，它还把这一构想推向伊朗国界之外，使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政治理论。由于他的这种理论在伊朗成为政治现实，所以对整个穆斯林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不满现状的下



层穆斯林群众的反抗活动尤其具有吸引力。正如埃及伊斯兰学者哈桑·哈乃菲在为霍梅尼的《伊斯兰政府》一书阿拉伯文版写的序言中所说的：

“与阿富汗尼一样，霍梅尼领导的是一场突破了教派界限的伊斯兰革命，它恢复了早期伊斯兰存在于《古兰经》和《圣训》源泉之中的革命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朗是迄今为止当代世界唯一成功地把伊斯兰政治理论付诸于国家政治生活实践之中的国家，因而它的伊斯兰政治理论也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虽然伊朗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国家，在教义上与占伊斯兰世界人口多数的逊尼派有一定的差别，但由于它成功地把宗教完全融入了当代政治之中，所以它的理论和经验也就对整个伊斯兰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当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在伊朗到处都可听到这样一个口号，反映出穆斯林对霍梅尼的崇敬：

“有三个打碎偶像的人，亚伯拉罕、穆罕默德、鲁霍拉·霍梅尼！”

##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

在库特卜、霍梅尼等人的思想影响下，以及在穆斯林世界政治现实的刺激下，70年代后期以来，中东北非地区出现了一些更加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和组织。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的政治主张非常极端，而且也更加富于“行动性”，所以产生的影响却很大。他们的出现对中东北非一些国家现存的政治秩序构成了新的挑战，这一现象还有向其他地区辐射和蔓延的趋势。

这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都赞同“一切主权归于真主”的观点，认为现实中一切社会问题都要靠“伊斯兰办法”来解决。他们反对“主权在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法律社会”等所谓“世俗主义”的说法。他们都强烈地反对社会和政治现状，认为现实的一切都是“反伊斯兰教”的，要求通过“革命”或“圣战”来摧毁现实，建立真正的伊斯兰社会。他们之间只是在行动的方式和斗争的目标上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

曾参与暗杀埃及总统萨达特而被埃及政府处死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阿卜杜勒·萨拉姆·法拉吉在他写的小册子《不存在的训令》中表达了这种极端的观点。他认为，要建立伊斯兰国家只有靠“圣战”才能完成，而圣战是被穆斯林忽略了的一条《圣训》。他说尤其是要对统治者进行圣战，因为是他们妨碍了伊斯兰国家的建立。他认为一般性的说服和教育是不起作用的，“难道通过这样的说教和虔诚行为就能够建立伊斯兰国家了吗？回答是毫不迟疑的，不。”只有靠奋斗（圣战），靠毫不延误和毫不妥协的战斗。他宣称，专制的暴君“要用剑来铲除”，伊斯兰国家的建立要靠“对抗和流血”。

与其他一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一样，法拉吉表达其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方法是通过摘录大量《古兰经》和《圣训》中的战斗性词句，并援引一些伊斯兰教历史上著名人物，如伊本·泰米叶等人的激烈言词。对于一般下层穆斯林群众来说，这种宣传手段往往能收到极大的效果。

另一位埃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阿卜杜拉·贾瓦德·亚辛在一本题为《当代的伽赫利耶》的书中进一步发挥了毛杜迪和库特卜的思想。他说，埃及只是名义上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实际上还处于伊斯兰教之前的基督教影响之下，当代的

西方文化又加强了这种基督教势力。他认为，所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都是非伊斯兰思想。他甚至认为埃及宪法中关于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享有平等权利的规定也是反伊斯兰的。如何才能实现一个纯粹的伊斯兰社会呢？他说，在国际上，要进行圣战，不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而且要进行“征服”；在国内，如果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就不可能实现“伊斯兰社会”。他说道：

“伊斯兰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国家，或者说是在某种权威管理下的一个共同体的宗教……今天的伊斯兰号召不应该背离伊斯兰的这一根本支柱……除非它已采取了一个国家的形式，否则就不能说伊斯兰已被建立起来了。”

以上这些伊斯兰思想家和理论家尽管分属不同的民族、教派，他们的理论在风格、形式上存在着差异，在内容和口号方面也各自有所侧重，但他们却有着一些最基本的共同点，可以归纳如下：

1. 他们都认为人对世界是不可知的，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愿望来改造世界。一切都必须依靠真主的意志，而真主的意志已明确表达在经训之中了。《古兰经》和《圣训》应该是思想的源泉和行动的准则。伊斯兰教具有包容一切的特点，它无论是对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还是对微观的每个人的生活、言行，都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

2. 他们都提出了反对存在于当代穆斯林社会中非伊斯兰的东西，反对社会中的不公正、压迫和腐败。同时，他们都强烈地反对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穆斯林社会的侵略和渗透。他们号召穆斯林群众起来打破现存秩序，建立真正的伊斯兰社会。

3. 除霍梅尼外，这些伊斯兰思想家都来自下层的普通穆斯林，他们都反对传统的宗教阶层（乌勒玛）。尽管他们有时也引经据典，但实际上他们提出的都是一些新思想和新观念。虽然霍梅尼属于传统的乌勒玛阶层，他的理论也有着强烈的反传统性，并富有现代政治色彩。

正是在这些极端思想的鼓励下，原教旨主义者在当代伊斯兰世界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剧，掀起一波又一波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汹涌浪潮。

这种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活动在 80 年代末的埃及尤其突出。除了进入议会的穆斯林兄弟会温和派、大学校园中活跃的伊斯兰社团组织之外，埃及社会中也出现了许多小型的极端组织。这些组织有不少是从原来的“圣战者”组织中分裂出来的，它们大都赞成使用暴力为斗争手段。它们一般以当地清真寺为活动中心，向人们宣传极端主义思想，并且还在居民中开展一些济贫、互助等福利活动。这些组织独立性很强，互相之间没有多少联系，也没有什么全国性或地区性的领导机构，因此，政府很难对它们进行控制和镇压。它们却常在各地开展暴力活动，如袭击政府官员、士兵和警察、基督教徒，甚至袭击外国游客。政府虽然不时也采取一定的打击措施，如逮捕或处死一些极端分子，但往往会遭到更猛烈的报复行动。一家埃及报纸的评论员在 80 年代末说：“埃及就像一间装满了汽油的房子，等待着火种的到来。”

## 谁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在一些人看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大概都是由一些贫苦落后、愚昧无知的下层百姓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满脑子

都是中世纪狂热、落后的观念；或者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就是那些食古不化、思想陈腐、对当今的世界一无所知的宗教学者。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在许多国家里，活跃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往往是那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有的人还在西方社会中学习和生活过。他们中有工程师、医生、大中学教师、律师、学者，在社会中属于中等阶层。他们懂得现代科学知识，也熟悉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方式。

休·里奇，一名英国前外交官，曾在中东地区生活和工作过25年。他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现象甚觉不解，从1986到1990年的四年里，他到30个穆斯林国家进行了研究调查，访问了許多人，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1990年他给英国亚洲事务皇家学会作了一个关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活动的讲演。在讲演中，他根据收集到的材料，模拟了两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谈话。从这份谈话当中，人们可以了解参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以下是休·里奇模拟的两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海德尔和他的姐姐法里达二人面对西方听众发表的谈话。）

**海德尔：**我名叫海德尔·卡利姆，今年29岁，大学刚毕业不久。我先是在国内上大学，后又到国外大学学习。我现在没有工作，因为我们的这个“卡费尔”（异教徒）政府不能给我们提供就业。我父母每星期五都要到清真寺去，从这一点来说，他们都是穆斯林。但我很快就发现他们不过是“塔克里迪”，即传统的、老式的穆斯林。但这一点无关紧要。让我来谈谈我是怎样发现这一切的。

1980年，我被送到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学习工程。当时我非常想亲身体会一下西方社会和文化，因为我们许多人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习惯都很羡慕。但不久后我就大失所望，我对我所看到的一切都不喜欢。由于精神的空虚，人们活跃的思想僵死了。我发现我来到的是一个崇拜物质、崇拜消费的社会，它没有目的，没有根基，因没有道义目标而颓废。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会陷入邪恶、犯罪和精神混乱的原因。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接受这种与我们自己文化价值相违背的新文化。我要回到我自己国家纯洁的伊斯兰社会中去，回到真正的人类理想中去。但使我感到震惊的是，我发现我自己的国家却也不再纯洁了，也不再是真正的伊斯兰国家了。它像一个可怜虫，变成了对我在英国所看到的那一切的模仿。我的第二个反应便是羞耻和愤怒，羞耻的是我们竟成了这样的人，愤怒的是因为这是殖民化的结果，是西方仍在继续对我们的国家侵入的结果。

在英国，我遇到了许多年轻的穆斯林，有埃及人，尼日利亚人，巴基斯坦人，马来人，印度尼西亚人，泰国人，伊朗人，等等。他们全都有着同样的想法。我也了解到在我们周围，甚至在大学里，都有许多伊斯兰组织在活动。我们可以进行自由的辩论，谴责我们的政府，组织和发起一些活动，而我们在国内是不能这样做的，因为那些“大人物”们在监视着我们。

虽然当时发生了伊朗革命，但我们并不在意我们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就是消除西方影响，建立伊斯兰国家，与麦地那那时的先知一

样，将沙里亚作为我们的法律。但是我们意识到，如果不先铲除我们的统治者，我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切。他们请来了西方势力，并依赖西方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统治者们完全是代表西方利益，我们怎能信赖他们呢？正是他们这种拙劣的统治导致了像1967年“六天战争”这样的大灾难。

我们看到霍梅尼成功地用伊斯兰教赶走了西方，我们也要这样做。因此，当时我们支持霍梅尼和伊朗革命，他代表的是伊斯兰，而不只是什叶派。我们许多人在道义上也支持伊朗反对伊拉克的战争，因为在我们看来，这是一场伊斯兰与“卡费尔”（不信教者）的战争，而西方以及我们自己国家的统治者支持的却是伊拉克。现在，我们已不再依靠伊朗了，我们已经制定出了我们自己的斗争策略。我们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事也不再那么关心了，当然，我们也认为它们两国的停战类似于侯达比亚协议，先知穆罕默德与麦加人达成的这个协议使他后来得以强大地返回麦加。

你想问我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我要说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人提出来的问题，因为你们所强调的是伊斯兰的分歧，而我们要强调的是它的统一。我们要回到先知在麦地那时的纯洁的伊斯兰教，当时这些教派分歧根本就没有产生。先知穆罕默德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

在英国呆了两年后我回到自己的国家，并与我在伦敦时加入的组织取得了联系。全国大约有30个这样的组织，大部分都是秘密组织。我对参加一些非法活动感到十分兴奋，并感觉到我们组织的团结。我们准备为我们的事业献出生命，这在什叶派中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也

崇拜伊玛目侯赛因，以及其他许多为伊斯兰而牺牲的榜样，如在伍侯德战役中牺牲的先知的叔父哈姆扎。

我发现传统的上层逊尼派“乌勒玛”，即所谓的宗教学者们的那些说教是多么的陈腐不堪。他们只不过是国家的傀儡而已。假如政府允许什么东西存在，“乌勒玛”们就宣布它是“合法的”，假如政府要禁止什么东西，他们就会说它是“不合法的”。如果政府要搞社会主义，“乌勒玛”们就赞颂社会主义；如果政府要搞资本主义，他们又会表示，资本主义与伊斯兰是一样的。他们已阉割了先知穆罕默德所创立的伊斯兰，使它成了一种神学家们的宗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从这种神学宗教的桎梏下解脱出来。他们使伊斯兰变得僵死停滞，使它不能成为一种在当代具有活力的力量。只是在我读了班纳、库特卜和沙里亚提的著作之后，我才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伊斯兰，而在此之前，我只把它作为一种西方概念中的宗教来看待。而这些具有学识的伊斯兰活动家们是另外一种“乌勒玛”，他们回到了最初始的源泉，《古兰经》和《圣训》，用它们来阐释和解决当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今天，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类“乌勒玛”。

我还发现我们国家的经济也通过诸如银行贷款、多边合作这类东西而被迫依赖于西方，而基于利息的银行贷款根本就是违反伊斯兰教的。我知道所谓西方的援助计划只不过是企图让我们永远不能自立。我们的经济必须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力量之上，建立在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之上。

当我看到我们社会的堕落情况时，我就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了。这一切都是来自西方——赌窟、夜总会、酒



吧和半裸着身子游来荡去的女人。我们的风景胜地充斥着行为放荡的西方游客，他们的榜样影响着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政府说他们带来了外汇，我们说他们带来了邪恶。因此，我们放火烧了一些他们使用的这些地方。我们自己的统治者也不比他们好多少，他们也作为这样的旅游者到欧洲等地去寻欢作乐。

当我们来看一看社会和道德问题时，我们就会看到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我们的领导人把国家的财富占为他们自己家庭所有。在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都是如此，西方化的上层人物变得越来越富，而群众却变得越来越穷。开始我们以为这种贫富之间的社会对抗只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公式，在伊斯兰教中是没有的。但后来我们发现伊斯兰教也谈到了关于财富的分配问题，霍梅尼提出的关于被压迫者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库特卜和沙里亚提以前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写过这个问题。

伊斯兰教是我们走向未来的通行证。它并不像西方所认为那样，是一种落后的、与科学和进步不相适应的东西。事实正好相反，《古兰经》里包括了需要用来阐述医学和科学的一切，甚至可用来阐述原子能的奥秘。我讨厌你们西方，讨厌你们过去的殖民主义，讨厌你们现在的新殖民主义，讨厌现在你们企图控制全球经济，讨厌你们道德的放纵、吸毒、流行文化、牛仔服、可口可乐、汉堡包，讨厌你们企图强加给我们的一切东西。这一切与我们的文化都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我欣赏你们的汽车、建筑、技术和太空计划，在这些东西中没有什么是反伊斯兰教的。技术并不只属于西方，它是真主给全人类共同利用的，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有得到它的权利。

难道你们没听说过阿维森纳、阿威罗伊、铿迪和法拉比这些历史上著名的穆斯林科学家吗？但我们现在从西方得到的是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它的文化，而我们却没有从西方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它的技术。西方技术的根源是伊斯兰教的，而西方文化的根源却不是伊斯兰教的。假如我们一直保持伊斯兰文化，我们现在也不会落后于西方。我们必须赶上和超过西方，恢复我们在历史上的地位。我们需要建立大学和工厂，而不是体育馆和跳舞厅。

问题在于你们是从你们西方的角度来看待一切的，你们按照你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体系来判断整个世界。你们对伊斯兰教妇女地位的看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你们认为，你们所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是把妇女锁进黑暗的时代。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一种解放妇女的力量。我想，关于这一问题最好还是让我的姐姐法里达来谈。

**法里达：**对于我们妇女来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使我们获得解放。我就认为它是使我自己从妇女的二等地位中解放出来的道路。妇女在“伽赫利耶”时代，即先知以前的蒙昧时代，就是处于二等人的地位，她们只是被当作性工具。可以肯定，如果穆罕默德要是把妇女作为奴隶，或是仅把她们当作性工具（当今的西方妇女就是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提高妇女的地位，禁止杀死女婴，制定对待妇女的规定，并使当时流行的男子可以娶9个妻子限制为4个。

《古兰经》规定女子可得到的遗产份额较少，是因为

男子需要更多的东西来养活全家；另外，因为女子更富于感情，其智力只为男子的一半。这些我都接受。但《古兰经》也强调了对妇女进行教育的重要性，以便使她们能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假如没有家庭义务，《古兰经》中什么地方说了妇女不应该工作。难道穆罕默德的妻子赫蒂彻不是经营着一支骆驼商队，并雇佣了穆罕默德他自己吗？难道他的另一个妻子阿伊莎不是参加了他所有的战役吗？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男女分隔的社会。因此，如果我们需要一位女医生，那么就要教育培养出这样一位医生来。同样，学校的女教师、大学的女讲师，甚至监狱的女看守也是如此。你认为我们刻苦学习获得大学学位之后就会心满意足地呆在家里吗？我们正努力使我们从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过去，除了起来反抗正统伊斯兰教之外就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获得自由，这也就意味着事实上成为西方化的妇女。但现在由于有了伊斯兰运动，并回到先知时代的伊斯兰教中去，我们就能够在伊斯兰教本身之中获得自由。现在穆斯林妇女所需要的是一次解放运动来恢复和实现她们真正的本性，同时成为男人进行新“吉哈德”（圣战）的伴侣。

伊斯兰教要求妇女穿朴素的衣服，就像我现在穿的这种“希贾布”，它既可以防止在西方发生那种性骚扰，而且从经济角度来考虑对我也是适宜的。我不再需要买那些昂贵的西方时装，我自己愿意穿这样的服装，没有谁强迫我。是我说服海德尔，使他成为一名活跃的伊斯兰主义者，而不是像你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是他说服我。

伊斯兰教可能要求男女分开，我们也可能在各种活

动中坐在后面。但关键是我们也参加了。我们也能走出家门去向其他妇女宣传伊斯兰的这种新精神，也能积极参加政治活动。难道你们没看过那些妇女在德黑兰街头参加游行的照片吗？你们见过有妇女在伊朗国王执政时参加政治示威吗？我们要参加这种新的伊斯兰活动，表达我们的政治呼声，支持我们在第一线的兄弟们。

你们错误地理解伊斯兰妇女的情况，是因为你们把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与传统主义的伊斯兰，甚至与西方化了的伊斯兰进行比较，这些实际上不是伊斯兰。可能会有个所谓的穆斯林姑娘来到你们的家里，她身穿超短裙，向你们要酒喝，然后就骂“那些该死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要把我们赶回黑暗的时代”。她才该死，是的，因为她不是穆斯林。你们是从错误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

《古兰经》说“在真主眼中，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是那些中世纪的学者们篡改了沙里亚，他们利用两个世纪的时间差距重新建立了男子的统治地位。而对于我来说，“回到《古兰经》”也就意味着回到更大程度上的男女平等。

**海德尔：**谢谢你，法里达姐姐。她刚才谈的那些说明了你们对伊斯兰的偏见，也说明了你们想怎样摧毁伊斯兰。看看你们的新闻媒介吧，充满了仇视和歪曲的报道。《每日邮报》最近登了一篇文章说伊斯兰教比共产主义还要邪恶。在伊朗伊拉克战争开始时，一个英国的高级政治家说，如果伊朗获胜，那将是西方文明的末日。最近法国总理说：“对西方最大的威胁是席卷东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你们认为我们全都是国际恐怖分子。

我们对于使用暴力的立场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吉哈德”（圣战）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对不信教者的斗争，它是伊斯兰一项重要的法定功修。但它是一种当伊斯兰受到攻击时，譬如说遭到像萨尔曼·拉什迪那样的叛教者攻击时，用来进行防御的手段。在有的情况下，我们有义务打击我们的某些背叛了伊斯兰，从而成了不信教者的统治者。但我们并不因此而在世界各地开展恐怖活动。在黎巴嫩所发生的事情只是地区性和教派性的活动。我们的斗争主要是在内部反对我们自己的统治者，反对让西方思想来侵蚀和毁灭伊斯兰。

因此，概括起来，我对西方，以及对苏联集团，所要说的是：走远一点，不要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对我们的要求返回先知纯洁的伊斯兰教的愿望横加干预。你们在殖民时代已说得够多了，现在该轮到我们的了。

##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还是政治？

从前面这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家、活动家的著作、声明、谈话和表白中，我们对所谓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大概已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一下它的主要特征：

首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是一个政治运动，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运动。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包含的内容极为广阔，它既有政治法律的层面，也有道德精神的层面，而且还包括社会生活的层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强调的伊斯兰教并不是作为道德精神或者社会生活的伊斯兰教，而是它的政治层面。为了实现其政治主张和政治要求，它也会提出一些

宗教口号，包括一些复兴伊斯兰教的内容，但它的真正目的是要在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实行伊斯兰教法，也就是建立宗教政权，实现宗教的统治。为了达到这种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的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夺取政权，在夺得政权之后通过国家机器全面推行社会伊斯兰化，实现伊斯兰的“法治”。

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家们的连篇累牍的文章、著作和谈话中，以及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的活动中的，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它的政治性，看到它对政权的向往。因此，可以这样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要害就是政权问题。在这一点上，它与强调穆斯林的共同感情，主张加强穆斯林国家间的交往、合作的那种新泛伊斯兰主义是不同的，与民间那种以强化下层群众的宗教意识为特征的信仰复兴运动也是不同的。

其次，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有比较系统的政治理论和主张。哈桑·班纳、毛杜迪、库特卜、霍梅尼等人在20世纪前半期已基本构建起了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理论框架，近些年来又有一些后起的原教旨主义者从各方面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使其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理论都是以伊斯兰宗教原则为基础，用现代政治学、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的。当代伊斯兰世界受这种理论的影响很大，许多重大事件是直接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发生的。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理论主要论证了现代世俗政治体制的非法性以及不合理性，论证了建立伊斯兰统治的必要性、可行性和迫切性。一些思想家、理论家还设想了当伊斯兰国家建立起来之后，应该如何来巩固和推广它的问题。这种理论执著地坚持《古兰经》本义，但也反对按传统的方法来解释

经典，而提倡根据现实情况，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灵活地变通地处理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第三，在斗争手段上，原教旨主义者往往根据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采取和平与暴力并用的方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中既有赞成采用暴力的派别，也有主张采取温和或和平方式的派别。还有的派别将暴力与和平手段交替使用，能政治就政治，能军事就军事，何种方法奏效就采用何种方法，目的就是取得政权。

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为了夺取政权，往往采用绑架、暗杀、爆炸等恐怖手段同现政府开展战斗。这种战斗有时甚至还扩大到对支持政府的外国势力的袭击，企图通过打击外国势力，使本国政府陷入更深的政治经济危机。在取得政权的少数国家中（如伊朗、苏丹等），伊斯兰政府对反对派也采取暴力手段进行镇压和打击，并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性地推行社会伊斯兰化。在伊斯兰政治理论的指导下，这类国家还往往主动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导致国家之间关系紧张，甚至引起军事冲突。

根据一些原教旨主义理论家的思想，也有一些原教旨主义派别很强调要运用现代政治斗争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夺取政权的目。所谓现代政治斗争手段，主要是利用组织政党、参加竞选、议会斗争等合法方式来取得政权，或者改造社会。由于世界范围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也影响到了伊斯兰世界，一些国家近年来扩大了国内的政治参与程度，还有的国家放弃了原来的一党专政，这样，便为原教旨主义运动开展合法斗争提供了机会。不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都希望通过这一途径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来看，采取合法的、非暴力的斗争方式受到原教旨主义运动中越来越

多的人的赞同。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条道路也是很有效的。

第四，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核心骨干大多数是非宗教职业的知识分子。在传统的伊斯兰宗教运动中，主要的领导力量是宗教职业者，是乌勒玛、毛拉集团，其社会基础是那些下层受传统思想影响的信教群众。而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和领导者绝大多数是受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中还有不少人受过西方教育，在西方国家学习或工作过。即使是像霍梅尼这样的宗教职业者，他的理论也具有强烈的现代政治色彩，也使用了大量的现代政治语汇。

这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往往有较高的学历（博士、硕士或学士学位），有较好的职业或社会地位（如教师、工程师、医生等）。他们之所以接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并不是出于盲目的狂热，而往往是一种经过比较后作出的选择。他们希望建立的伊斯兰国家，是按他们自己对伊斯兰教关于政治、经济、社会和伦理道德的理解而设计的，而这种理解的基础往往是建立在现代思想，而不是传统教义之上的。

从上述特征可以看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仅是一种宗教运动，而且是一种政治思想和政治运动。它的出现，既可以视为一种对西方势力的反应，也可以看作一种现代化模式的探索，还有人认为它是民族主义复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 第五章

### 圣战！圣战！

在伊斯兰大潮中，来势最为迅猛的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中，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圣战”。在阿富汗国内的浴血战争中，圣战是压倒一切的声音；在埃及你死我活的政教斗争中，人们听到的是圣战的呼声；在阿尔及利亚、约旦的民主竞选中，政治反对派的旗帜是圣战；在以色列占领下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哈马斯”组织一呼百应的战斗口号还是圣战；在黎巴嫩，许多西方人在“真主党”的圣战行动中成为阶下囚、刀下鬼；在海湾战争中，圣战是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动员号令，也是许多国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声援伊拉克的呐喊呼声。

到底什么是伊斯兰教的圣战？在今天，它的具体表现是什么？要了解当代国际上的这股伊斯兰潮，就必须了解伊斯兰教的圣战。

#### 吉哈德——伊斯兰的圣战

阿拉伯语“吉哈德”(jihad)一词的原意是为了某种既定

的目标而“尽力”或“奋斗”，其宗教含义是为了真主的事业而尽力，为传播对真主的信仰而奋斗。按传统的伊斯兰教义，世界被划分为两大部分：由穆斯林统治的伊斯兰地区，由异教徒统治的非伊斯兰地区。从理论上说，伊斯兰教的最终目的是把对真主的信仰传播到世界上所有的地方，让全世界都接受伊斯兰教。这种使非伊斯兰地区变为伊斯兰地区的手段就是“吉哈德”，也被称为“圣战”。教义认为，吉哈德是真主指引穆斯林到达天堂的直接道路，穆斯林通过参加吉哈德，便可获得来世的拯救。

伊斯兰教法学家们一般是把穆斯林履行吉哈德义务的方式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用心”，指穆斯林的精神自省，与自身的邪恶意念斗争，净化心灵，更虔诚地信仰伊斯兰教，这种吉哈德被称为“大吉哈德”。据说，穆罕默德非常重视这种方式的吉哈德，据《圣训》记载，一次他率众完成军事活动回到麦地那后说：“我们现在已完成了小吉哈德，我们该投身于大吉哈德了。”随行的人问他什么是大吉哈德，他答道：“对自己的吉哈德。”第二、三种分别是“用口”和“用手”，指穆斯林通过宣传、规劝、辩论和自身的榜样来传播伊斯兰教。《古兰经》中规定：“对于宗教，绝无强迫。”（第2章第256节）“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你应当以最优美的态度与人辩论。”（第16章第125节）第四种是“用剑”，即指战争或武力，要求穆斯林勇敢地与异教徒战斗，以“生命和财产”来宏扬和保卫伊斯兰教。在早期伊斯兰教中，参加战争是穆斯林履行吉哈德义务最主要的方式。

在伊斯兰创教初期，为了动员穆斯林积极参加传播宗教和进行对外扩张，吉哈德在教义中有很高的地位，并充满鲜明的战斗性和进攻性，具有浓厚的尚武精神和牺牲精神。《古

兰经》中说，“以财产和生命为主道而奋斗”的穆斯林比那些“安坐家中”的穆斯林能得到更多的报酬和更高的地位。有一段《圣训》说，“吉哈德本身就等于笃诚的朝觐”。在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教义中，吉哈德的地位比在逊尼派中更重要。哈瓦利吉派明确把吉哈德列为与五大功修同样重要的第六大功修。

但是到了近现代，吉哈德的战斗性和进攻性逐渐减弱，伊斯兰现代主义者更强调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来履行吉哈德义务。他们认为，伊斯兰地区与非伊斯兰地区可以和平共处。他们说，早期伊斯兰教被强大的敌对力量包围着，为了伊斯兰的生存和发展，穆斯林不得不拿起武器与敌人进行战斗。另外，早先由于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缺少传播伊斯兰教的有效手段，为了使真主的声音能够冲破阻隔，传达到遥远、偏僻地方的人民，也只好借助战争这一“唯一的、最后的”手段。而今天，伊斯兰世界已很强大，穆斯林也可以利用各种现代化的通讯传播技术来传播伊斯兰教。因此，现代主义者认为，现在已没有必要再利用战争和武力来宏扬和传播伊斯兰教了，即使在不得已而使用武力时，也要强调吉哈德的防御性。他们还认为，吉哈德不应仅限于战争和对伊斯兰的宣传，只要是能促进伊斯兰事业的一切活动，都应属于吉哈德，包括履行宗教义务、加强信仰、发展教育，甚至努力工作、发展生产也被认为是履行吉哈德义务。突尼斯前总统布尔吉巴号召说：“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突尼斯还遭受着贫穷和落后的折磨，这使我们在世界面前蒙受耻辱。能使我们消除这种耻辱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停地工作和进行富有成效的劳动。就像用剑进行吉哈德一样，摆脱落后也是吉哈德义务。”

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强调战斗精神的圣战又开

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种传播媒介之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的衰弱，根本原因就是背离了伊斯兰教的真正精神和原则，其中也包括背离了早期的吉哈德精神。他们反对现代主义者对吉哈德作出的解释，认为这是对伊斯兰教的背叛，只会削弱穆斯林的战斗意志，使他们放弃必要的暴力斗争，把他们引入歧途。原教旨主义者强调，吉哈德只能以宝剑、以生命去完成。他们反对与异教徒的和平共处，声称只有当伊斯兰教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后，才可能有永久的和平。他们也否认吉哈德仅仅是一种防御性的手段，坚持认为“进攻”和“防御”是吉哈德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

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的理论家阿卜杜勒·萨拉姆·法拉吉 1981 年在一本叫作《吉哈德，被遗忘的责任》的小册子中说，吉哈德是早期伊斯兰最显著的特征，是最重要的支柱之一，但后来却被穆斯林淡忘了。放弃吉哈德使伊斯兰世界变成了现在这样可悲的状况：四分五裂，蒙受耻辱，遭到蔑视。他要求穆斯林重新恢复早期的战斗精神，以吉哈德为手段重建伊斯兰社会。他说，当今吉哈德的唯一方式就是武装斗争，其他方式都是愚蠢的和怯懦的。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必须首先起来与内部的敌人（国内背叛了伊斯兰教的统治者）战斗，然后再与外部的敌人（异教徒）战斗。他还宣称，“专制的暴君要靠剑来铲除”，伊斯兰国家的建立只有靠“对抗和流血”。

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称，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一切问题都只能通过战斗来解决，要清除外来势力，结束政教分离的状况，建立伊斯兰政府，全面实施沙里亚法，除了吉哈德之外别无他途，这也就意味着流血和牺牲。他们宣称，不但要与异教徒和无神论者进行战斗，更重要的是与穆斯林中

的叛教者进行战斗，那些与异教徒和无神论者勾结在一起的人已不能再被看作是真正的穆斯林了，他们对穆斯林社团的危害更大。他们还认为，由于敌人已经深入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内部，吉哈德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种集体责任，而成了一种个人的神圣义务，每个穆斯林都可以不受时间、地点和方式的约束，可以随时随地向伊斯兰的敌人发起进攻，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安拉奋斗。

因此，对于大多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来说，吉哈德也就是战斗和流血牺牲的代名词。80年代以来，埃及的“圣战者组织”和“赎罪与迁徙”、黎巴嫩的“真主党”、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以及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原教旨主义组织，都是在“圣战”的旗号下开展它们的活动。圣战也就成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浪潮中最响亮的声音。

##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及其分支组织

半个多世纪来，穆斯林兄弟会与埃及政府一直处于绵延不断的斗争中，它几经起落，到80年代仍然是埃及最大和最有影响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但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斗争策略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70年代末奥马尔·泰勒马萨尼成为兄弟会的领导人后，兄弟会公开宣布它放弃暴力和恐怖活动，虽然它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社会，但它要采用合法的、非暴力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因此，在穆巴拉克任总统的十多年间，穆斯林兄弟会一直是一个合法的组。它先是与新华夫脱党联合，后又与自由派的劳工党结盟，参加了议会竞选。1987年，穆斯林兄弟会与劳工党组

成的“伊斯兰联盟”获得了60个议席，一举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合法反对党。兄弟会还控制了埃及四家主要反对派报纸中的两家，拥有七个实力雄厚的股份公司，掌握着大量在海湾国家工作的埃及劳工收入的外汇。兄弟会在许多问题上仍对政府持批评态度，但总的立场日趋温和。

但在同时，一些原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对它的立场日益软化持反对态度，他们纷纷脱离兄弟会，重新建立了一些激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其中较著名的有伊斯兰解放党、真主战士、圣战者组织、赎罪与迁徙等。这些激进组织都激烈地反对现存的政治秩序，主张以暴力推翻政府，致力于建立伊斯兰国家和全面实行沙里亚法。它们都深受赛义德·库特卜等原教旨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但它们之间在对埃及社会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因此斗争的形式和方法也就存在着分歧。

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埃及仍是一个穆斯林社会，大多数埃及人仍是虔诚的穆斯林，但这个国家的领导集团已不再是真正的穆斯林，因此，必须进行一场革命把他们推翻，重新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政府。伊斯兰解放党、圣战者组织就是持这种观点。而另一种观点却更加极端，认为现在整个埃及社会都已不再是真正的伊斯兰社会了，已成了类似于伊斯兰教产生之前的蒙昧时代（“伽赫利耶”）状态，它已不可救药。虔诚的穆斯林应该完全脱离这个社会，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信教者的社会，并使它逐渐取代这个旧的社会。“赎罪与迁徙”组织就持这种极端看法。

赎罪与迁徙组织的正式名称实际上叫做“穆斯林协会”。由于它提出“赎罪与迁徙”这个口号，因此埃及新闻界和官

方就用这个名称来称呼它。这个组织的创建者是阿赫迈德·舒凯里·穆斯塔法。他原是一个农业技术员，早年参加了穆斯林兄弟会。1965年因散发兄弟会的传单被逮捕。1971年获释后，他对老一代兄弟会领导人感到失望，认为他们太软弱和富于妥协性，于是他自己秘密组建了赎罪与迁徙组织。穆斯塔法写了一本叫做《寻求》的书，为了避免受到“玷污”，他甚至不愿意用机器来印刷他的这本书，而让人用手抄写。他在书中写道：现在的埃及社会已完全腐败了，成了一个污秽的地方，真正的信教者不能再生活在这些“异教徒”当中了，他们必须离开这里，组成自己纯洁的伊斯兰社会。他们必须彻底抛弃中世纪以来附加到伊斯兰中的一切东西，完全按照《古兰经》和《圣训》生活，最后通过圣战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他援引先知穆罕默德移居到麦地那为例，认为只要信仰者生活在异教徒中就不可能战胜异教徒。

在穆斯塔法的带领下，一些赎罪与迁徙的成员离开了社会，住到了上埃及米尼亚的一些山洞里，进行“学习”和接受军事训练。他们大都是来自埃及农村和小城镇中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只把他们自己的成员称为穆斯林，而称外界的其他所有人为“异教徒”。由于认为社会上的清真寺都已落入了异教徒的控制之中，他们拒绝去清真寺参加祈祷，而是在家里由他们自己的领拜人带领着做礼拜。他们不与外界通婚，不与组织之外的亲戚往来，也不让孩子到一般的学校去读书，并拒绝服兵役。赎罪与迁徙组织后来还在科威特、约旦、叙利亚发展了一些成员。

赎罪与迁徙组织并不是完全消极地逃离社会，它派出一些小组去袭击那些最“污秽”的地方，如夜总会、酒吧间和电影院等地方。1977年1月，由于政府取消食品补贴，开罗

发生骚乱，赎罪与迁徙组织也乘机行动，纵火焚烧了市中心的几个夜总会和电影院。这次骚乱后，政府逮捕了60名赎罪与迁徙组织成员。7月，赎罪与迁徙组织绑架了曾在报上写文章谴责他们的埃及前宗教基金部长扎哈比，以他为人质要求政府释放被捕人员。当这一要求被拒绝后，他们杀死了扎哈比。埃及安全机关随后破获了赎罪与迁徙秘密组织，逮捕了620人，并将包括穆斯塔法在内的5人处死。据当时官方公布的材料说，这个组织大约有3000—5000名成员。穆斯塔法死后，赎罪与迁徙组织表面上消失了，但它的成员有的转入了其他组织，有的建立了更为极端的秘密小组织。

比起赎罪与迁徙来，“圣战者组织”更加富于行动性，所以对埃及政府构成的威胁也更大。1981年刺杀萨达特总统的陆军中尉伊斯兰布里等四人都是圣战者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出现于70年代后期，主要的领导人是阿西尤特大学一位双目失明的宗教学教师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和埃及军事情报机关的拉蒂夫·佐穆尔中校。实际上，圣战者组织只是一个总的名称，它下面有许多独立的小组织，它们构成了一个松散的网络，在行动时打出圣战者组织的旗号。

圣战者组织最基本的目标就是要推翻他们称之为“腐败的、不信教的”政府，重新建立一个伊斯兰政府。它的一个领导人说：“我们相信埃及人基本上是所有伊斯兰民族中最虔诚的信教者……虔诚的埃及人民所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领导者。”圣战者组织的理论家萨拉姆·法拉吉明确提出，建立这样一个伊斯兰政府唯一正确的方式就是要通过圣战。他指责赎罪与迁徙组织脱离社会的做法是“奇怪的行为”，只会导致偏离圣战的正确道路。圣战者组织很注意在军队中发展成员。萨达特被刺后，埃及政府逮捕了大约2500名原教旨



主义分子。在被捕的圣战者成员中，有4%是军人、警察和情报机关的官员。1986年埃及政府宣布破获了一起圣战者组织的密谋，在被捕的30人中，有两名军队的少校、一名上尉和一名中尉。当局指控他们建立了几个目的在推翻政府的军事训练中心。

1986年2月，包括开罗的五个省发生了大规模的警察骚乱，大约17000名治安警察砸汽车，焚烧酒吧、夜总会，袭击豪华的旅馆、别墅，造成了约5亿美元的损失。作为国家重要安全部门之一的警察闹事，这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也使埃及政府受到极大的震动。政府派出军队去镇压闹事的警察，经过五天战斗才平息了动乱，结果是死亡115人，其中闹事警察被打死89人。有关当局称，这次动乱背后有伊斯兰极端分子，主要就是圣战者组织成员的煽动和指挥。

关于圣战者组织成员的人数，各种材料的说法不一。一家埃及报纸说大约在5万至7万之间，但真正参与暴力活动的只有1/4。

到90年代初，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浪潮再次兴起的鼓舞下，埃及圣战者组织又活跃了起来，恐怖暴力活动不断发生。1991年发生了数起以信基督教的科普特人为目标的暴力事件。而从1992年到1993年初，外国旅游者则成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袭击对象，从开罗的金字塔旁，尼罗河边到上埃及的卢克索、阿斯旺等旅游胜地，都发生了西方游客遭袭击的流血事件。多数情况下袭击者都自称是圣战者组织的成员。他们公开宣称，他们袭击西方游客，是因为这些西方人把非伊斯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带到了埃及来；另外，袭击外国人的目的也是为了打击埃及的经济，因为旅游业是埃及最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之一。

1993年2月到6月，埃及发生了一系列爆炸案，警方追踪结果，疑点都集中到了圣战者组织精神领袖奥马尔·拉赫曼的身上。但这位盲人学者已于1990年定居到了美国的新泽西州。而2月份，美国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也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爆炸事件，8名被捕获的嫌疑分子也都是拉赫曼的追随者，这证明埃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活动已蔓延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美国警方立刻拘捕了拉赫曼。埃及政府要求把他引渡回国，美国也答应了。但美国有关部门立刻就接到圣战者组织的传单，扬言如果拉赫曼被引渡回埃及，美国在海外的人员将遭到报复性袭击，吓得美国也不敢轻举妄动。

## 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

1991年12月26日，阿尔及利亚举行了独立30年来的首次多党议会选举。4天后国家宪法委员会公布了第一轮投票结果。这一结果令许多人深感震惊，在选出的231个席位中，执政多年的民族解放阵线只获得了可怜的15席，另一个世俗政党社会主义力量阵线获得25席，无党派独立人士获得3席，而最大的反对党——“伊斯兰拯救阵线”却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夺得188席！阿尔及利亚新国民议会共设430个席位，余下的199席的归属预定在1992年1月16日的第二轮投票中确定。也就是说，在下一轮选举中，伊斯兰拯救阵线只要再有28席就能以第一大党的地位组织政府，而这对于选举中一路势如破竹的拯救阵线来说，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国内外许多人都相信，伊斯兰拯救阵线将会取得全面胜利，阿尔及利亚将成为另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伊朗政府热烈欢呼“伊阵”的辉煌胜利，并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尽快

建立一个伊斯兰政府”。

伊斯兰拯救阵线是阿尔及利亚最主要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它实际上是一个由大约10个不同的伊斯兰团体组合而成的联合阵线。它最主要的领导人是阿巴斯·马达尼博士，此人是一所大学的教育学教授，讲起话来滔滔不绝，颇有鼓动性。伊斯兰拯救阵线从1989年3月诞生到选举获胜一共只有两年多的时间。这个组织从未提出过任何治理国家的具体政治纲领，只是宣传要把阿尔及利亚建成一个伊斯兰国家，它提出的口号是，不要宪法，不要法律，《古兰经》就是一切。在开始时，它也并不想通过选举来参政，直到1991年6月，它还号召人民不要参加选举，而应该用罢工、罢市和起义来推翻世俗政府。伊斯兰拯救阵线以清真寺为阵地，攻击执政的民族解放阵线贪污腐败，宣传伊斯兰社会的平等和正义，深得中下层穆斯林人民的拥护。但其他政党对它却不屑一顾。社会主义力量阵线的领导人阿哈默德认为它算不上一个政党，说它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正因为如此，伊斯兰拯救阵线的胜利才引起了阿国内民族主义和世俗力量极大的不安和惊慌。在第一轮投票之后，阿总工会、商业界、银行界、文艺和科技界的许多人都纷纷行动起来，呼吁选民阻止伊阵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则加紧出击，扩大战果，在全国发动了新一轮的宣传攻势。整个国家形势处于一派动荡不定之中。在此情况下，1992年1月11日，总统沙德利宣布辞职，让军队出面控制了局势。军方和政界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议后，宣布取消原定1月16日的第二轮选举，并决定成立以布迪亚夫为首的5人最高国务委员会。布迪亚夫警告说，虽然伊斯兰教是全体阿尔及利亚人的宗教，但“决不允许任何人垄断宗教或是利

用它来达到可鄙的目的”。

对于眼看就要到手的政权又被夺走，原教旨主义者非常愤怒。伊斯兰拯救阵线进行了反击，它宣布不承认最高国务委员会的权威，在各地的清真寺组织了反政府的集会和示威，许多地方的清真寺用高音喇叭号召开始对异教徒进行圣战。拯救阵线的成员在首都阿尔及尔街头设置街垒路障，并与军警发生冲突。动乱迅速蔓延，一个多月内，全国就造成了上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整个阿尔及利亚局势极度动荡，政府调集了大批军队和警察，以控制日益混乱的局面。3月初，军政府正式宣布伊斯兰拯救阵线为非法组织，说它企图以颠覆行动危害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当局逮捕了数千伊阵成员和支持者，还发布命令禁止举行大型集会和利用清真寺进行政治宣传。伊斯兰拯救阵线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但暴力事件却有增无减，军人和警察成了被袭击的主要目标。

6月29日，最高国务委员会主席布迪亚夫来到工业城市安纳巴主持当地文化中心的落成典礼。当他正在讲台发表讲话时，帷幕后突然响起一声爆炸，就在烟雾还未消散时，一名手持冲锋枪的男子冲过来向布迪亚夫一阵猛射。布迪亚夫应声倒地，遭到了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同样被刺身亡的命运。究竟谁是这一谋杀事件的策划者？其动机又是什么？虽然没有哪个组织声称对此负责，但人们都把怀疑的目光投向被取缔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布迪亚夫死后，阿尔及利亚军政府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之间镇压——报复——再镇压——再报复的暴力循环在不断地重复着。

军人政府在全国逮捕了两千多名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包括首都阿尔及尔的7个地区实行无限期宵禁。当局通过了一个反恐怖法，成立了特别法庭和反恐怖特种部队，宣布对恐

怖分子从严惩处。但这些措施并不能有效地制止动乱，在1992年中仅警察部队中就有约250人被打死。1992年12月，国防部长也差一点在一次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袭击中丧生，后来他只好把全家搬到军营中住。到1993年1月，也就是伊斯兰拯救阵线被取缔一周年时，全国又一次出现了普遍的暴力流血冲突。政局一向比较稳定的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开始陷入不停的动乱之中。

1993年3月，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发自阿尔及尔的一篇报道写道：

“在阿尔法区一个寒冷的黄昏，数以百计的青年聚集在街头，有的倚靠在街灯下，有的站立在车旁，有的蹲在街边，他们成群结伙地吸烟、聊天，以度过一个傍晚的时光。店铺的窗上仍留着被子弹打穿的洞。而在一年前，这些地方却充满民主的喧闹，生气勃勃，群情激荡。成千上万的人在激进教派分子的带领下游行，祈祷，竞选。今天，在市区的各个角落，只见军用卡车满载身穿战斗服的武装士兵；晚上十点半钟就戒严，人们只能呆在家中，不敢外出。同时，暴力残杀事件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东西，人们饱受惊骇与不安。失业的年轻人无事可做，白天只有挤在咖啡馆里，吐露彼此的不满。在没有前途和希望之余，他们只有走上与政府对抗的道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阿尔及利亚的崛起也并不是一夜之间的事。

位于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经过8年的武装斗争，于1962年赶走法国殖民主义者取得独立。当时社会主义思潮正流行于整个阿拉伯世界，受此影响，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在1963年的宪法中规定它是一个“民主人民共和国”，1967年又进一步

规定阿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的领导人称，要把伊斯兰道德标准与社会主义革命原则融为一体。在60—70年代中，由于政局稳定，并有丰富的石油收入，阿尔及利亚曾有过一段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安定繁荣的时期。但到了80年代，由于石油收入减少和人口急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加上长期执政的民族解放阵线党内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日益严重，国内局势每况愈下，最终出现了普遍的动荡和动乱。

在这种形势下，伊斯兰复兴的浪潮自然也蔓延到了阿尔及利亚。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伊斯兰教是改变现实、摆脱困境的良方。全国的清真寺从80年代初的4000多座激增到90年代初的1万多座。参加祈祷和礼拜的人越来越多，近几年，每逢星期五，清真寺内总是爆满，寺外也是黑压压的祈祷人群。其他各派政治力量对现状也十分不满，而一些西方国家，如法国、美国，也时常攻击阿尔及利亚，说它在政治上“专制”、“独裁”。在国内外压力下，阿尔及利亚前总统沙德利于1989年2月宣布修改宪法，取消了原宪法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不再强调实行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党专政，并且还在公民权利方面增加了政治结社和罢工的自由，从而拉开了阿尔及利亚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的序幕。沙德利宣布政治改革后不久，伊斯兰拯救阵线就应运而生，成为向执政30年的民阵党发起挑战的强大对手。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阿尔及利亚政坛的崛起，使许多西方国家深感吃惊。一些人说阿尔及利亚将很有可能成为另一个伊朗。他们分析说，由于阿尔及利亚经济情况很糟，以前又一直依靠苏联，与西方的来往不多，因此，在穆斯林国家中，是一个很容易被原教旨主义攻破的薄弱环节。法国报纸惊呼，在伊斯兰旗帜下的阿尔及利亚将是对法国和整个欧洲

的严重威胁。而一名美国观察家则不无揶揄地评论说，西方国家想支持阿尔及利亚走民主道路，民主没有来到，却请来了“神主”。

## 令西方人谈虎色变的“真主党”

1989年7月的一个夜间，一个以色列突击小分队悄悄越过黎以边境，深入到由黎巴嫩伊斯兰教什叶派真主党控制的地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真主党的核心人物阿赫迈德·欧贝德绑架到了以色列。这次绑架行动，对于专门以绑架西方人作为人质的真主党来说，实在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想不到在自己手中还有十多名美国和西方人质的情况下，自己的重要人物竟会在自己的地盘内遭到反绑架的命运。以色列军方宣称此举是为了报复两名以士兵在黎南部的安全区遭真主党绑架。

真主党一怒之下，两天后把他们关押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希金斯绞死，把绞死这个美国人的录像带送到电视台播放，并扬言说：“你绑架我一个，我杀死你一个。”在还有十多名人质被真主党扣押的情况下，美国连忙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不要再轻易去招惹真主党。但以色列却态度强硬地说，假如真主党还敢绑架以色列人，以色列仍将采取“以牙还牙”的报复行动。面对这种两不相让的对局，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却束手无策，既感到愤怒，又觉得沮丧。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虽然对真主党的情况几乎了如指掌，但就是不敢轻举妄动，一是怕在真主党手中的西方人质遭到处决，二是自从1980年4月美国企图用武力解救被扣在伊朗的人质失败后，只要一提动武，美国政府就会受到国会

和公众舆论的反对。

真主党抓住美国的这个弱点，在以色列的行动后不久又让美国人质安德森、西西比欧在电视上露面，谴责美政府不关心人质的死活，要求释放欧贝德。美国政府对此实在是哭笑不得，深感烦恼。

在黎巴嫩这个只有400万人口的中东小国里，宗教派别非常复杂。除了占人口1/3的伊斯兰教什叶派以外，较大的派别还有逊尼派、德鲁兹派、基督教马龙派等。为争夺国家权力，各个教派之间长期混战不已。什叶派虽然人数较多，但一直处于受压无权的地位。1979年伊朗什叶派伊斯兰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刺激了黎巴嫩什叶派的崛起。黎巴嫩什叶派原来的领袖名叫穆萨·萨德尔，是一名著名的宗教学者，成功地创建了第一个黎巴嫩什叶派政治组织，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但在1978年，穆萨·萨德尔却在到国外出访时神秘地失踪了。什叶派中本来就有殉教传统，萨德尔的失踪被许多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看作是为事业殉难，因而极大地激励了他们的战斗精神。70年代末，什叶派中出现了亲叙利亚的“阿迈勒运动”，开始在黎巴嫩政坛崭露头角。1982年，以色列为了消灭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发动了侵略黎巴嫩的战争，而伊朗也针锋相对地派出了约2000人的革命卫队进入黎巴嫩，并帮助更激进的什叶派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这样，真主党就在这一年7月成立了。

真主党是一个典型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其创始人和领导者是穆罕默德·侯赛因·法德拉拉。他曾在什叶派圣地、伊拉克的纳贾夫学习过，是当时流亡在纳贾夫的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学生。他回到黎巴嫩后一直以宗教为职业，80年代初成为黎巴嫩三大宗教领导人之一，1985年获得什叶派



最高教法学家“阿亚图拉”的称号。早在1976年，法德拉拉就在他的著作《伊斯兰与逻辑力量》中提出要建立一个叫做“真主党”的组织，并对这个组织的纲领、目标作了论述。到1982年，他的这个想法终于成为了现实。真主党的另一个重要领导人是阿巴斯·穆萨维，他不但学识渊博，精通什叶派教义，而且极富组织能力，是真主党的实际决策者。与伊朗一样，真主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中都是什叶派高级神职人员。

真主党认为它不是一个“普通意义的政党”，而是一个在教法学家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它宣称以霍梅尼的革命思想为指导，建立伊朗式的伊斯兰国家。它还强调什叶派的殉教精神，用圣战来与“邪恶势力”进行战斗。法德拉拉说：“靠我们的枪，靠真主的恩宠，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将从黎巴嫩的废墟中诞生，它将仿照伊朗的榜样，清除一切西方势力。”1985年真主党在一封《致被压迫的黎巴嫩人民》的公开信中说：“伊玛目霍梅尼一再谕示，美国是造成我们苦难的罪魁祸首，是所有邪恶的根源。我们同美国进行战斗，为的是行使我们的正当权利，为的是保卫我们的伊斯兰教和国家的尊严……”这样，从一开始，真主党就把美国和西方作为它最主要的敌人。

真主党成立后不久，就导演了一起空前规模的反西方恐怖活动。1983年10月23日，一个黎巴嫩青年驾驶一辆满载烈性炸药的卡车，突然冲进贝鲁特国际机场附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地的一幢大楼，只听一声巨响，血肉横飞，240多名美、法官兵立刻死于非命，地面上留下了一个直径40英尺，深9英尺的大弹坑。第二天，真主党的一名发言人说，这起自杀性攻击是它下属的一个叫做“伊斯兰圣战”的组织干的。这一被称为“历史上最大的非核爆炸”恐怖事件立刻使得真

主党名扬四海。此后，真主党又制造了几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包括1984年美国驻黎使馆被炸，死伤近60人。自杀性爆炸是真主党使用最多的方式，后来几乎成了该党特有的“战斗手段”。

真主党打击西方的另一主要手段就是绑架人质。从1984年到1991年间，在黎巴嫩被什叶派武装绑架的西方人质共有92人，其中大多数是真主党所为。被绑架者几乎都是西方人，被绑架者中有外交官，有新闻记者，有商人、医生、工程师、教授，还有旅游者，其中有4名是女性。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连英国圣公会派往贝鲁特交涉释放人质的特里·韦特主教也成了真主党的“战利品”。仅在1987年1月，就有十多名西方人在贝鲁特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一时间，贝鲁特成了使西方各国谈虎色变的“绑架之都”。被绑架的这92人中，有8人被杀，另外有3人在扣押期间丧生。真主党在阿拉伯语中叫“希兹布拉”（Hizbullah），由于它频繁地绑架西方人质，“希兹布拉”一词在西方新闻媒介中成了一个人人皆知的名词。一提起这个名词就意味着西方人在中东失踪，还有人把真主党称为“黑洞”。

真主党把每一次人质绑架案都冠以一个组织的名称，如“圣战者组织”、“革命正义组织”、“全球被压迫者组织”等等，既造成混乱又扩大声势。实际上，多数绑架活动都是真主党的几支行动小分队进行的。绑架的目的，一方面是打击和威吓西方国家，造成恐慌和混乱；另一方面是利用人质要挟有关国家，使之答应自己提出的条件。由于许多国家都卷入中东和黎巴嫩的冲突，这些人质也就成了各国之间折冲樽俎的“筹码”，他们的命运同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联系到了一起。

例如；1986年4月，美国飞机从英国起飞空袭了利比亚，

第二天两名英国人质和一名美国人质就在贝鲁特被处决。1984年几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在法国被捕，1985年黎巴嫩就发生了一系列法国人被绑架的事件，绑架者随即要求法国释放被关押的犯人。而1986年当法国不同意欧共体谴责叙利亚为恐怖主义国家，并表示愿意与伊朗改善关系时，6名法国人质就先后得以获释。人质危机闹得整个西方世界沸沸扬扬，美国等国家的领导人硬也不是，软也不是，感到十分头痛。后来，各国看准伊朗、叙利亚对真主党能产生影响，便通过各种渠道，以经济制裁等手段对这两个国家，尤其是对伊朗施加压力，希望伊、叙出面压真主党释放人质。这一招还真起了作用。经过不断努力，费了许多时日，在许多国家，包括联合国的斡旋下，到1992年6月，活下来的西方人质才被全部释放。

除了反西方外，真主党的另一个目标就是以色列。按照霍梅尼的说法，“美国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撒旦（魔鬼），而以色列是全体穆斯林的头号敌人”。真主党在其口号中一直宣称要消灭犹太复国主义，不允许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存在。1982年以色列大举入侵黎巴嫩后，在与以色列交界的黎巴嫩南部建立了“安全区”。真主党就不断派遣小分队进入以色列划定的安全区内，袭击以色列巡逻队和哨所，绑架或杀死以色列士兵，或者对以色列境内进行炮击。

真主党的这些骚扰活动使以色列感到很头痛，也不断采取行动进行报复。用以色列军方的话来说，就是“你杀我一个人，我夷平你一个村庄”。1992年2月，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潜入一个以色列军营，用刀斧砍杀了三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第二天，以色列出动两架直升飞机，深入黎巴嫩境内，袭击了真主党头号实权人物穆萨维乘坐的汽车。穆萨维和他的妻

子、他六岁的儿子，还有两名保镖都被烧死在汽车里。

真主党强烈反对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自1993年以后，中东和平进程明显加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约旦相继同以色列达成了和平协议。在这种情况下，真主党成了唯一从境外向以色列实施打击的力量。它不断从黎巴嫩南部用喀秋莎火箭炮袭击以色列北部地区，造成以色列军人和平民的伤亡。据外电报道，真主党的军事战斗部队现在约有3500—4000人。主要的军事领导人是35岁的纳斯普拉，他现任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真主党的军事人员一般都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能使用各种不同的武器，包括一些相当先进的现代化武器。这些人员的培训以及武器资金，都主要是靠伊朗提供；叙利亚也给了它某种形式的支持。

在黎巴嫩国内的政治斗争中，真主党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当内战停止后，在1992年9月举行的20年来首次选举中，它一举夺得议会中的12个席位，成为黎巴嫩政局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

## 异军突起的“哈马斯”

1992年12月中旬，5名以色列士兵在加沙遭袭击身亡，两天后一名警官被绑架后也被处死。作为报复行动，以色列当局把被占领地区的415名巴勒斯坦人驱逐到其境外的黎巴嫩南部。而黎巴嫩政府也拒绝接受这批人，从而使他们处于进退无门的境地。这一事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以色列称这批人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并说他们大多数是“哈马斯”的成员。

80年代初，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埃及伊斯兰原教旨主

义者刺杀萨达特总统、黎巴嫩穆斯林武装力量崛起等一系列事件的鼓舞，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伊斯兰教势力也日趋活跃，并出现了“伊斯兰圣战”、“伊斯兰解放党”等大大小小的地下政治和军事组织。到 80 年代末，几经分化组合，在占领地区形成了两支最主要的反以力量：一支是巴解组织主流派法塔赫，另一支就是哈马斯。“哈马斯”是阿拉伯语“伊斯兰抵抗运动”(Harakat al-Muqawama al-Islamiya)的简称；它自称是属于分布在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会”组织的一个分支。

据以色列有关人士估计，到 1992 年，哈马斯的成员约有两万人，并拥有大量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影晌尤为强大，据说当地有 50% 的人都是哈马斯的支持者；其势力在约旦河西岸稍小一些，但近来发展也很快。哈马斯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大多数是年轻人，而且其中有很多人是有知识分于和大学生。哈马斯的活动经费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巴勒斯坦当地穆斯林的捐助和成员们缴纳的会费，另一个来源是国外的资助，包括一些伊斯兰国家政府，如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给予的资助，以及海外穆斯林的私人捐助。后一项是近年来哈马斯主要的财政来源，每年都有上亿美元。

哈马斯的创建者和领导人是阿赫马德·亚辛教长。他 1985 年曾被以色列当局以谋杀罪逮捕入狱，后在人质交换中被释放。当 1989 年以色列宣布“哈马斯”为非法组织后，他再次被捕，现仍在以色列狱中。亚辛教长腿有残疾，经常坐一辆轮椅行动，被称为“轮椅上的原教旨主义活动家”。哈马斯的另一位领导人是阿卜杜勒阿齐兹·兰蒂西，他曾获得过博士学位，是加沙伊斯兰大学的教师。

1988年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广泛散发了一份《哈马斯宪章》。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包括：1. 哈马斯是穆斯林兄弟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组织，也是世界性伊斯兰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哈马斯的指导原则是神圣的伊斯兰教，它反对世俗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2. 哈马斯的斗争目标是在从地中海到约旦河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哈马斯强调说，整个巴勒斯坦的土地都是伊斯兰的“瓦格夫”（神圣教产），它的任何一部分都是不可放弃的。3. 哈马斯致力于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敌人、解放巴勒斯坦的“圣战”。它宣称“圣战”是每个穆斯林的职责。哈马斯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来参加解放巴勒斯坦的“圣战”。4. 反对任何一种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提议、方案和国际会议。哈马斯认为，巴勒斯坦的主权属于真主，它是不可谈判，也是不可出让的，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除了圣战，别无他途。5. 哈马斯认为它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斗争目标接近，但是，它反对巴解组织要把巴勒斯坦建设成为一个世俗国家的计划。它宣称“只有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朝一日接受了伊斯兰道路，我们才会成为它的战士”。

哈马斯的反以活动主要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组织被占领地区的巴勒斯坦人进行反对以色列的游行、示威、罢工等抗议活动，这类示威抗议往往会发展为与以色列军警的暴力冲突，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声援；另一种就是开展武装斗争，如伏击以色列的军车，制造爆炸事件，组织小规模突击队袭击、绑架以色列军警和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犹太定居者，等等。由于有很多支持者，他们在袭击行动得手后很容易在当地穆斯林的掩护下隐匿起来，使以色列军警无法查找。

1990年10月耶路撒冷发生21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警

打死的“圣殿山惨案”后，哈马斯声称“我们的斗争已成了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战斗”，它号召对犹太人进行“白刃战”。武装活动日趋频繁，袭击的目标也从以色列军警和定居者发展到以色列国内的犹太人。仅在1992年下半年，哈马斯就进行了10多次这种袭击，造成以色列30多人伤亡。这种零星的打击使以色列当局十分头痛，它造成了不可忽略的累计伤亡，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普遍的恐惧和不安。

哈马斯开展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打击巴勒斯坦人中与以色列的“合作者”。它在一份传单中宣布：“任何（与以色列的）合作者都是叛教者，都将按真主的法律被处死。”据以色列军方公布，被巴勒斯坦人杀死的“合作者”的人数，1988年为16人，1989年为139人，1990年为176人，1991年为240多人。这些“合作者”大部分是被哈马斯处死的。哈马斯还要求穆斯林严格按伊斯兰教规生活，要人们按时礼拜，要求妇女戴头巾面纱。在加沙的墙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标语：“哈马斯认为不戴面纱是某种通敌行为。”

以色列政府称哈马斯为“恐怖组织”。为了消除哈马斯的威胁，以色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驱逐、逮捕、监禁以及对其分化瓦解。1991年初，在一次较大规模的行动中，以色列逮捕了300多名哈马斯成员，把这个组织的4名领导人驱逐到黎巴嫩南部。1992年12月，当5名以军士兵遭袭击而死亡后，以政府再次采取严厉措施，把400多名哈马斯成员和支持者驱逐到南黎巴嫩，逮捕了1500多人，并声称，哈马斯的大部分基层组织已被摧毁。以色列总理拉宾宣称：“我们决不允许恐怖主义分子危害我们人民的生命安全，也决不允许他们危害中东和平进程。以色列将与恐怖主义者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我们决不怜悯他们。”

自1948年开始，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打了五次大的战争，小的冲突不计其数，结下了难以消除的民族仇恨。以前，阿拉伯方面认为他们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要消灭小小的以色列是不难做到的，因此，它们提出不和平、不承认、不谈判的三不政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各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下，也提出要“摧毁犹太复国主义”、“把以色列赶到大海中去”的口号。但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不但阿拉伯人未能消灭以色列，以色列反而在几次阿以战争中变得一次比一次强大，占领了大片阿拉伯领土。有的阿拉伯领导人后来开始认识到要凭借武力消灭以色列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和平谈判，才能收回被占领土，也才能建立巴勒斯坦国家。埃及前总统萨达特最先采取行动，1977年访问耶路撒冷，1978年与以色列达成了和平协议。1982年，沙特阿拉伯在摩洛哥的非斯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提出八点和平方案，暗示了对以色列的承认，这个方案得到了多数阿拉伯国家的赞同。但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仍坚持原来的立场，反对与以色列和谈。直到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在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美国国务卿贝克八度穿梭中东各国，才终于使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第一次坐到了谈判桌边。1991年10月30日，中东和平会议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举行。长夜漫漫的中东和平开始出现了曙光。

一直坚持要消灭以色列的巴解组织，20多年来命运多蹇，几经起落，历尽坎坷。它的总部先从约旦被驱赶到黎巴嫩，后又再次被迫迁到突尼斯。最后在势单力薄、难以再战的情况下，也宣布放弃暴力斗争，愿意同以色列进行谈判。但这一立场的转变受到了哈马斯的坚决反对，认为与以色列进行和谈是投降和出卖巴勒斯坦利益，是“向魔鬼屈服”。哈马



斯提出一些比原来巴解组织更激烈的反以口号。它称：“以色列将随着伊斯兰的兴起而结束它的存在，伊斯兰将像摧毁它以前的所有的敌人一样摧毁以色列。”哈马斯威胁说，与以色列谈判的人将被看作是以色列的合作者，将会受到应得的惩罚。1993年2月，代表巴解组织与以色列进行谈判的费萨尔·侯赛尼在他东耶路撒冷的家中遭到两名蒙面人枪击，他大难不死，侥幸脱险。以色列警方调查后说，谋杀者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很可能是哈马斯成员，目的就是企图扼杀中东和平进程。以色列当局立刻派人把侯赛尼保护了起来。

就是在阿以和谈开始以前，巴解组织与哈马斯虽然在反对以色列的大方向上有共同之处，但双方在意识形态以及斗争的目标和方式等问题上也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一些原来巴解组织的支持者，尤其是在以色列统治下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既仇恨以色列的军事占领，也对巴解组织的一再失利和退让深感失望。他们一方面看到了伊斯兰教在中东地区的复兴，和它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也为哈马斯的激进立场和战斗精神所吸引，于是纷纷转向哈马斯。

哈马斯与巴解为了争取支持者和扩大自己的影响，经常互相攻击。巴解组织指责哈马斯企图取代巴解组织，破坏巴勒斯坦事业，为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服务。而哈马斯则攻击巴解出卖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是背叛伊斯兰教的“异教徒”。双方甚至从唇枪舌剑发展到兵戎相见。1991年下半年，巴解和哈马斯的支持者在加沙和纳布卢斯多次发生冲突。1992年3月，双方又在加沙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死伤100多人。据报道，被哈马斯以“与以色列合作者”名义秘密处死的人中，就有一些是巴解组织的支持者。1994年11月，加沙又发生了哈马斯支持者与巴勒斯坦警察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冲

突，有 16 人死亡，250 人受伤。对于巴勒斯坦这两大派的“鹬蚌相争”，以色列自然乐得坐收“渔人之利”。

1993 年 10 月，以色列与巴解组织的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双方在挪威的奥斯陆达成了《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正式结束了长期的冲突状态。以、巴双方后来又于 1994 年达成了《加沙—杰里科先行自治协议》，长期流亡在外的巴解领袖阿拉法特回到了加沙。对此，哈马斯进一步采取了各种针对以色列人以及巴解组织的暴力行动，以达到破坏协议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哈马斯的活动得到了伊朗、苏丹、黎巴嫩的“真主党”、埃及“圣战者组织”等国外伊斯兰力量的支持。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巴以协议是“朝着犹太复国主义对被占领土的罪恶统治合法化迈出的一步”。一些哈马斯成员发誓要暗杀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和支持和谈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

哈马斯对巴、以和平谈判最大的威胁是采取针对以色列人的自杀性爆炸活动。自巴、以达成奥斯陆协议之后，哈马斯制造了一系列爆炸事件，如：

1994 年 12 月 13 日，一名哈马斯分子在耶路撒冷市中心搞了一次汽车爆炸事件，使 7 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995 年 1 月 22 日，以色列纳塔尼亚市发生一起自杀性爆炸事件，19 人当场被炸死，62 人被炸伤。事后哈马斯发言人称该组织对此事件负责；

1995 年 4 月 9 日，加沙地区连续发生两起针对以色列人的爆炸事件，造成 8 人死亡，30 余人受伤。巴勒斯坦警方在加沙大规模搜捕哈马斯分子，有 180 多人被逮捕；

1995 年 7 月 24 日，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一辆公共汽车发生自杀性爆炸，至少 6 人被炸死，30 多人被炸伤，周围的建

筑严重受损；

1996年2月24日至3月19日，哈马斯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阿什克伦、特拉维夫等连续制造了四起大规模的自杀性爆炸恐怖事件，共有62名以色列人被炸死，受伤者近200人；

.....

在巴、以奥斯陆协议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大约有近200名以色列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平民）在哈马斯制造的爆炸恐怖事件中丧生，受伤者近千人。这一系列爆炸活动极大地触痛了以色列人对自身安全非常敏感的神经，许多原来支持阿以和平的人也改变了立场。他们说，如果和平进程带来的就是这样的结果，那还不如维持原来的敌对状态。自1992年上台后一直致力推进和平的以色列工党政府因此受到极大的压力。在一系列爆炸恐怖事件的刺激下，以色列人中反对同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的势力上升，以色列总理拉宾本人也在1995年11月4日遭一名犹太极端分子刺杀身亡。工党政府在国内的地位被动摇了，终于导致利库德集团在大选中获胜，内塔尼亚胡上台，巴、以和平进程也面临极大的困难。

哈马斯挑选的自杀性攻击者，都是该组织最忠诚的成员，他们一般都出自贫穷的家庭，有众多的兄弟姐妹。他们对以色列人极为仇恨，愿意用自己的生命为真主的事业去奋斗。据说，在加沙地区大约有数百名哈马斯的敢死队员，他们随时准备服从命令，用自己的生命去执行向犹太人袭击的任务。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在自己身上绑上烈性炸弹，混入以色列人集中闹市区或公共汽车上，然后引爆炸弹。事后，自杀性攻击者成为“烈士”，受到其他成员的敬仰，而且他的家庭也会得到哈马斯组织的关照，许多人会自动地向攻击者的家人捐助

钱物。

##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海湾战争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的10万大军突然侵入并占领了科威特。这一举动犹如波斯湾上空的一道闪电，拉开了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帷幕。

到1991年初，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在波斯湾打响了。战争的一方是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而另一方却是以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为首，加上英国、法国、加拿大、埃及、沙特、科威特等10多个国家组成的多国部队。双方力量的差异和悬殊自不待言。在多国部队连续30多天飞机、导弹的狂轰滥炸，以及4天的地面进攻下，这场被美国称为“沙漠风暴”的战争最后以伊拉克一败涂地并被赶出科威特而告结束。

然而，就在海湾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时，另一场“战争”也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打响了。

被世界上许多人看作不自量力、野心勃勃的“狂人”、“暴君”的萨达姆·侯赛因，却被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看作是伊斯兰世界的“英雄”。虽然他指挥的伊拉克军队在战场上溃不成军，一败涂地，但他却被认为是敢与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方势力对抗的“勇士”。尤其是萨达姆在战争中使用“飞毛腿”导弹袭击伊斯兰的敌人以色列和投靠西方的沙特阿拉伯，更是赢得了许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喝彩。在他们看来，萨达姆虽败犹荣，伊拉克与强敌对抗反映了伊斯兰世界不屈的战斗精神。

伊斯兰世界政治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世俗的、极端的民

族主义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以前曾经被认为是“伊斯兰的敌人”，但在海湾战争中，他竟又成了“伊斯兰卫士”，成了各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们的偶像和英雄。

确实，萨达姆·侯赛因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们根本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伊拉克执政的阿拉伯复兴党的口号是“统一、自由、社会主义”，宗教在这个党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萨达姆对伊斯兰教的态度也与其他世俗的民族主义者一样，主张使其个人化和非政治化。他对伊斯兰政治反对派的镇压毫不手软。伊拉克人口中什叶派占多数，但掌权的却一直是逊尼派，什叶派对此很不满。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80年代初，伊拉克什叶派中反政府活动一度非常活跃。什叶派的领袖人物是阿亚图拉巴克尔·萨德尔，有“伊拉克的霍梅尼”之称。为了防止伊朗革命在伊拉克重演，1980年4月，萨达姆以煽动骚乱为由将萨德尔和他的妹妹一起公开绞死。同年，萨达姆又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这场空前惨烈的两伊战争持续了8年，霍梅尼一再称那是“一场信教者与异教徒之间”的战争，称萨达姆是“伊斯兰的死敌”。

但1990年8月海湾危机爆发后，萨达姆却举起了伊斯兰大旗。他在动员伊拉克军队时用充满感情的声音说：“我们是伊斯兰的战士，如今真主的敌人已向我们发起了进攻。阿拉伯的勇士们，为真主和信仰而战吧！”面对强敌，他对他的高级将领们说：“只有真主才能决定将会发生什么，而我们在这种决定中的作用几乎为零。”决战之前，萨达姆命令在伊拉克军队的军旗上加上“真主最伟大！”的字样。

萨达姆·侯赛因抓住穆斯林仇视西方、仇视以色列的心理，要求把海湾问题与巴勒斯坦问题联系起来解决，声称要用化学武器摧毁半个以色列；他利用穆斯林群众对伊斯兰世

界的贫富悬殊现象的不满，以及对沙特、科威特王室家族统治的不满，提出均贫富的口号；当多国部队云集沙特阿拉伯时，他又利用穆斯林对伊斯兰圣地的虔诚感情，声称异教徒玷污和亵渎了圣地，号召发动圣战，从沙特王室手中解放麦加和麦地那，从以色列人手中解放耶路撒冷。萨达姆深深懂得，在阿拉伯世界要成为英雄不必非要获胜，重要的是进行战斗。因此，他不仅说了，而且做了，他面对强敌毫不退让，一再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向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发射“飞毛腿”导弹。这样，自然就赢得了许多穆斯林的好感和支持。

海湾战争中，约旦、埃及、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等很多伊斯兰国家都出现了穆斯林自动走上街头，举行声援伊拉克，反对西方军队进入阿拉伯半岛的游行和示威。甚至在英国的伦敦、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南非的开普敦等地也都发生了当地穆斯林支持伊拉克和反对美国的集会和游行。

在巴基斯坦，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一次次走上街头，他们焚烧布什的模拟像，抬着象征性敌人的棺材，冲击美国驻拉合尔、伊斯兰堡、卡拉奇的外交机构。示威者们要求多国部队停止对伊拉克的进攻，立即从伊斯兰圣地撤走，称这是一场“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对伊斯兰的进犯”，伊拉克穆斯林是在进行反对侵略者的圣战。他们甚至把萨达姆·侯赛因称为现代的萨拉丁（中世纪领导穆斯林与欧洲十字军战斗的英雄）。在南部的海德拉巴，一位穆斯林领导人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我们热爱萨达姆·侯赛因，因为他为了伊拉克的强盛而日夜辛劳，而沙特和科威特的统治者却在他们欧洲的舒适豪华的宫殿中享乐。我们热爱他，因为他总在谈论解放耶路撒冷和从地球上铲除以色列。我们热爱他，因为他做到了他的承

诺，用他的飞毛腿导弹打击了特拉维夫。在所有阿拉伯领导人中，还有谁能够对以色列这样做呢？”

美国的“沙漠风暴”行动开始后，约旦首都安曼失去了昔日的平静，穆斯林兄弟会连日举行游行集会，发表声明支持伊拉克。它在声明中号召“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来反对异教侵略者，参加这场决定命运的战斗，支持伊拉克兄弟从巴勒斯坦圣地和纳季德、希贾兹（沙特阿拉伯）清除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斗。”人们点燃了美国、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国旗，一些西方人挨了揍，一家英国银行和一个法国文化中心被愤怒的人们捣毁。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除了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外，甚至号召其成员组成志愿军，前往海湾参战以支援伊拉克。

在穆斯林群众和伊斯兰组织强烈的反美情绪面前，一些国家政府的态度也出现了转变。摩洛哥政府原来一直禁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公开活动，但在海湾战争期间，它却破例准许几个组织参加群众集会。阿尔及利亚的官方报纸开始只是呼吁和平解决冲突，后来也发出了战斗号召，称“海湾开始的战争不仅是伊拉克，而且也是所有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反对西方列强和它们创造出来的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突尼斯政府动员人们输血，把血浆送到伊拉克。

在海湾危机中，人们感到惊奇的不是萨达姆对伊斯兰教的利用，而是世界上竟还有这么多穆斯林对伊拉克的支持。在一般人看来，伊拉克以强凌弱，无端吞并一个主权国家，这其中的是非曲直，公理人心早已一目了然。因此，从联合国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异口同声地谴责伊拉克，要求它从科威特撤军。但是，许多穆斯林却不是这样看的。历史上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压迫，阿以冲突一再失败的屈辱，经济上的贫

富悬殊，西方文化对伊斯兰社会的侵蚀，现实社会中一切令人沮丧的问题，使他们强烈地希望改变现状，强烈地希望伊斯兰世界中产生一位能代表他们利益的英雄。一位曾在伊拉克生活了多年的巴勒斯坦妇女说：“我知道萨达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他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实现他自己的野心，但如果要我在萨达姆与乔治·布什之间作选择，那我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萨达姆。”

海湾战争虽然以伊拉克的惨败告终，但正如一些西方记者分析的那样，这场战争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进一步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

## 苏丹：以伊朗为样板

地处非洲之角的苏丹，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是，它在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掀起的圣战浪潮中也起到了令人不可小觑的作用。

虽然苏丹是一个阿拉伯国家，阿拉伯语是它的国语，实际上阿拉伯人只占它人口的40%，集中在与埃及接壤的北部地区，南部的居民基本上是非洲黑人，中部大部分居民是介于阿拉伯人与黑人之间的混血人种。苏丹人口中穆斯林占70%左右，有15%的人口是基督教徒，另外还有约15%的人口信奉原始部落宗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能在这样一个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都不占绝对多数的国家里发展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使很多人感到困惑不解。

其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苏丹是有传统的。18世纪后期，英国殖民者占领埃及后又侵入苏丹。1881年苏丹人阿赫默德自称是人们期待的救世主“马赫迪”，领导穆斯林进行了



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埃的起义。马赫迪号召人民起来参加“圣战”，铲除人世间的和平，建立平等、正义的理想国家。马赫迪起义军经过几年战斗，打败了英埃军队，于1885年率军攻克喀土穆，击毙了英国总督、被称为“基督教将军”的戈登。这个戈登以前曾到过中国，是镇压中国太平天国的刽子手。起义军统一苏丹后，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马赫迪国家。这个原教旨主义国家存在了15年，到1899年才又被卷土重来的英埃军队镇压下去。但马赫迪的战斗精神和原教旨主义思想却作为一种传统在苏丹穆斯林中传了下来。

现代苏丹1956年独立。由于紧邻埃及，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很早就在苏丹建立了分支组织，发展非常迅速。另一方面，属于马赫迪派的大众性伊斯兰组织“安萨尔”也在社会中有很大的影响。正是看到国内这种强大的伊斯兰势力，以及国际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1983年秋，当时的总统加法尔·尼迈里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运动。他宣布在苏丹全面实施“沙里亚法”，颁布了一批被称为“九月法令”的命令，如规定禁酒、废除银行利息、对偷窃者断肢等，并任命了一批伊斯兰人士担任政府要职，按伊斯兰原则制定内外政策。为了表明他走伊斯兰道路的决心，尼迈里还出版了一本叫做《为什么走伊斯兰道路？》的书，强调只有通过伊斯兰道路才能取得苏丹民族的统一和进步。

在尼迈里任命进入政府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中，有一位名叫哈桑·图拉比。此人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是法国巴黎的索本神学院和英国的牛津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获得过宪法学的博士学位，当时是喀土穆大学法学院的院长，也是苏丹穆斯林兄弟会的重要的领导人之一。除阿拉伯语外，他还能流利地讲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尼迈里让他负责政府

的法律事务，并作为总统的外交顾问。尽管哈桑·图拉比本人是一名坚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但他却清醒地认识到，尼迈里的伊斯兰化太过于激进，已超过了苏丹的现实；而且，更重要的是，尼迈里本人是一名众所周知的民族主义者，曾狂热地追随过埃及的纳赛尔，现在他积极推行伊斯兰化路线，明显地是企图利用伊斯兰来为自己服务。因此，图拉比和其他兄弟会领导人虽然支持尼迈里，但却没有太深地卷入尼迈里的伊斯兰化运动之中。

图拉比一直从事伊斯兰政治活动，曾三次被捕入狱。他经过深入的思考，尤其是经过对70年代末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观察，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著书立说，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其中主要的有《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思想复兴》、《伊斯兰思潮的主导性》以及《自由、统一、舒拉（议会制）和民主问题》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系统地阐述他的政治理论和观点，构筑了一套完整的伊斯兰国家理论体系，其中包括伊斯兰法制、伊斯兰民主、政党、现代科学教育、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通过他的政治活动以及他的著作，图拉比不仅在苏丹，而且在伊斯兰世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拥有众多的拥护者和崇拜者。果然，尼迈里的伊斯兰化运动未能坚持多久。1985年4月，在经济困难和政局动荡之中，一批高级军官发动政变，把尼迈里赶下了台，扶持“安萨尔”的领导人、马赫迪的曾孙萨迪克·马赫迪上台当了总理。由于穆斯林兄弟会和图拉比在国内政治中盘根错节的势力和在国外的重要影响，马赫迪的政府不但没有触动他们，反而让他们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兄弟会的政党“伊斯兰民族阵线”在议会中占了20%的席位。1989年6月，苏丹再次发生军事政变，这次政变的领导人是奥马尔·阿赫迈德·巴希尔将军。他是

兄弟会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图拉比的崇拜者。事实上，据有关报道，这次政变就是在“伊斯兰民族阵线”的直接策划和参与下进行的。1990年，议会正式宣布苏丹是完全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国家。这样，随着政局的一次又一次变动，一个完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就在苏丹建立起来了。这个国家的掌权者是以巴希尔将军为首的军政府，而实际上一切重大问题的决策却离不开满腹经纶的哈桑·图拉比，他的公开职务是“阿拉伯伊斯兰人民会议”的秘书长。1996年4月在全国议会第一次会议上并当选为议长。

苏丹的情况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又提供了一种成功的模式，这就是，伊斯兰政权的建立并不一定要通过大规模的群众革命，也不一定要靠投票箱中的选票数量，而可以通过这种更迅速、更简捷的道路——军事政变。

许多年来，苏丹南方占人口1/3的基督教徒和其他少数民族与北方的穆斯林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隔阂，时常发生内战。政府推行的伊斯兰化运动受到了南方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当有鲜明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巴希尔军政府上台后，政治反对派立刻与南方的宗教反对派结合在一起，在许多地区掀起了动乱。军政府也不手软，宣布对这些反伊斯兰教势力进行“圣战”。一位发言人称，“苏丹的基督教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残余，而那些多神教徒则仍还处于前伊斯兰时代的蒙昧之中，只有靠圣战，才能使整个苏丹统一在伊斯兰的光辉之下”。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苏丹的胜利，除了穆斯林兄弟会的努力之外，与伊朗的支持和影响也是分不开的。巴希尔将军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和苏丹的救国革命比作一对孪生兄弟，并称伊斯兰革命是救国革命的样板，号召学习伊朗的经验。

苏丹 1989 年 6 月政变后不久，伊朗就表示全力支持巴希尔军政府，并表示要加强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合作。伊朗主动提出向苏丹派遣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据英国《卫报周刊》报道，到 1992 年初，在苏丹的伊朗军事专家大约有 800 人左右，他们中一部分人集中在苏丹东部的几个营地，帮助训练苏丹武装人员。苏丹政府公开承认说，苏丹接受了伊朗的石油、食品和军车等援助物资。到 1991 年底，苏丹已从伊朗获得了大约价值 500 万美元的武器。而据外国的一些消息说，伊朗还向苏丹提供了大笔现金。伊朗与苏丹日益密切的关系也反映在双方的高层互访方面。1991 年 12 月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访问了苏丹，代表团中包括了伊朗的经济部长、内政部长、革命卫队司令等重要人物。这个多达 200 多人的代表团在喀土穆受到了隆重接待。1992 年 4 月，苏丹也派了一个重要军事代表团访问德黑兰。不久后，两国又达成协议，伊朗租用苏丹港 25 年，在此建立海军基地。

伊朗之所以大力支持苏丹，除了双方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方面有共同语言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苏丹地处中东与非洲的联结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伊朗与苏丹结盟，就可以从东西两面形成对埃及、沙特等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的夹击之势，并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北非的发展建立基地。用苏丹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哈桑·图拉比的话来说，“苏丹是阿拉伯世界和非洲伊斯兰革命的桥头堡”。

苏丹虽然很贫穷，但它地域辽阔，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其态度的向背对地区力量的平衡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直到 80 年代中期，苏丹一直都是美国在非洲提供经援和军援最多的国家。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很重视与苏丹的

关系，80年代中，沙特、科威特等海湾国家也给了苏丹不少援助；伊拉克与苏丹历届政府的关系都不错，以至于在海湾战争中，苏丹是为数不多的公开支持伊拉克的几个国家之一。世事沧桑，现在，苏丹在治国方略上仿效伊朗，不能不说是伊朗在外交上的一个大胜利。

与当年伊朗的霍梅尼一样，图拉比也相信，伊斯兰在一个国家胜利之后，这个国家就有义务向其他国家输出伊斯兰革命。作为阿拉伯世界以及非洲第一个实现了“伊斯兰统治”的国家，苏丹积极地“帮助”其他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伊斯兰事业，发挥它“伊斯兰革命的桥头堡”的作用。

对苏丹伊斯兰势力影响最感不安的是几个北非阿拉伯国家。

埃及与苏丹有很长的共同边界线，尼罗河贯通两国，加上历史、文化、民族等方面的联系，多年来两国关系十分密切。但自1989年苏丹巴希尔政权建立后，两国关系日渐恶化。埃及国内的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近年来非常活跃，经常制造一些暴力恐怖事件，如暗杀政界要人、袭击信基督教的科普特人、袭击西方游客等，使穆巴拉克政府十分头痛。埃及称有证据表明这些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受到了苏丹政府的支持，例如，埃及警方说1990年10月暗杀议长马哈古卜的凶手就是在苏丹受的培训；被埃及政府通缉的“伊斯兰圣战者”组织领导人、盲教长奥马尔·拉赫曼1990年在苏丹获得政治避难权，后他又去到了美国。埃及政府甚至还指责说，苏丹穆斯林兄弟会的武装人员已进入上埃及，参与了当地伊斯兰极端分子发动的骚乱。海湾战争期间，埃及加入了多国部队，而苏丹却支持伊拉克，也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1993年初，埃、苏两国部队在边界发生了武装冲突。

阿尔及利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伊斯兰拯救阵线”1992年初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几乎就要合法地取得政权，后军方出面强行取消了选举结果，并对拯救阵线进行了镇压。在军政府的打击下，一些拯救阵线分子纷纷逃到苏丹，在那里经过学习和军事训练后又返回阿尔及利亚，开展反政府的地下武装斗争。阿政府一方面严加打击，一方面也指责伊朗和苏丹插手，要求国际社会予以制止。同样，突尼斯、摩洛哥政府也指责苏丹支持它们国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颠覆活动。突尼斯最大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拉希德·盖努西不但经常居住在苏丹，而且他甚至还持苏丹护照活动于其他国家。美国报纸还说，著名的国际恐怖组织——阿布·尼达尔的成员也频繁出现在苏丹。

据西方一些通讯社报道，苏丹境内设有专门为各国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培训人员的营地，由苏丹人进行思想灌输，伊朗人负责军事训练。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埃及的圣战者等原教旨主义组织都有人在这里受训。苏丹对北非各国伊斯兰运动的支持，使它获得了“非洲的伊朗”之称，而图拉比也就成了“非洲的霍梅尼”。

1991年4月，喀土穆召开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国际会议，与会者来自55个国家。他们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中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有：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主席拉希德·盖努西、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主要领导人易卜拉欣·舒克里、阿富汗圣战者军事领导人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的主要负责人阿巴斯·马达尼，当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派了一个高级代表团参加会议。这个会议的正式名称是“阿拉伯伊斯兰人民会议”。身穿白色长袍，头缠白色头巾，温文尔雅，总是面带微笑的哈桑·图拉比是这

次聚会的东道主，也是这次会议上的风云人物。他号召穆斯林应该加强团结，消除分歧。他特别强调了要消除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分歧。在他的倡导下，会议通过了一个宣言，其核心思想就是要表明“无论美国和西方在海湾战争之后显得多么强大，真主才真正是伟大的”；为了获得伊斯兰对西方的圣战的胜利，为了在各国建立伊斯兰政府，穆斯林采取任何斗争方式都是正当的。

西方的分析家们把这个会议称为“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大聚会”。他们认为这个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极富象征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在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独领风骚 50 年的民族主义的衰落，取而代之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正式登上了国际政治的舞台。

1993 年 8 月 20 日，美国政府宣布将苏丹列入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称苏丹帮助训练国际恐怖分子和参与恐怖活动，并开始采取行动对它进行经济制裁。苏丹是继伊朗、叙利亚、利比亚之后，又一个被美国列为“国家恐怖主义”黑名单的国家。苏丹政府坚决拒绝这一指控。在首都喀土穆，数十万人举行大规模反美抗议示威。苏丹政府领导人巴希尔将军称：“美国实际上是敌视我们信仰伊斯兰教。”1993 年 12 月，第二届阿拉伯伊斯兰人民会议如期在喀土穆的尼罗河畔召开，图拉比在会上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1995 年 3 月，苏丹又举行了第三届阿拉伯伊斯兰人民会议，黎巴嫩的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以及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朗、阿富汗、波斯尼亚等国的各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再次会聚一堂，图拉比仍是他们热情的东道主。这些伊斯兰组织的代表提出，为了摆脱西方在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控制，应该建立一个伊斯兰联合国，发行一种统一的伊斯兰货币。

## 第六章

# 走向 21 世纪的伊斯兰

今天，我们的世界正处在一个新旧转换的大变动时期。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存在了半个世纪的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已不复存在，东西方对峙的冷战局面已经消失，多极化格局正在开始出现。在从两极到多极的过渡中，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冲突也随之产生了，另外一些因素则在潜伏、酝酿和发展之中，整个世界仍处于一种未定的状态中。在这个过渡时期中，传播日广而又躁动不安的伊斯兰将会发挥什么作用？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作为一种文明体系，一种政治思想和社会制度的伊斯兰将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请注意，这里用的是“伊斯兰”，而不是“伊斯兰教”。确实，“伊斯兰”远不止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这是今天许多人关心的问题。

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中，现在有一种说法很流行，认为代表共产主义的“红色”正在消退，而代表伊斯兰的“绿色”（因伊斯兰教崇尚绿色）却正在全球蔓延，它正在动摇西方的价值观念，并对西方世界的稳定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有人预言，下一个世纪世界的主要冲突将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面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的



咄咄逼人的进取之势，美国一个驻开罗记者惊呼，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正以强劲的势头把世界带入 21 世纪。许多穆斯林自己也认为，伊斯兰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衰落之后，现在终于开始复兴了，它将在未来的时代中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

尽管表述不同，但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伊斯兰正在对人类的今天和明天产生着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 《撒旦诗篇》引起的轩然大波

1988 年 8 月，印度国会中的两名穆斯林议员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印度政府禁止一本叫做《撒旦诗篇》的书在印度出版和发行。他们声称，已加入了英国籍的印度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写的这本小说亵渎了伊斯兰教，书中影射和丑化了先知穆罕默德和神圣的《古兰经》。印度政府调查后，很快就下了禁止这本书在印度出版和销售的命令。接着，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孟加拉、印尼、马来西亚等许多穆斯林国家以及南非也下了禁书令。

不久，《撒旦诗篇》由英国企鹅出版公司出版，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开始发行。全英穆斯林组织联盟也迅速采取了行动，他们把这本书中有冒犯伊斯兰教的段落摘录和复印下来，寄给一些伊斯兰国家驻英使馆和伊斯兰组织，呼吁他们采取行动，并要求英国政府禁止《撒旦诗篇》在英国继续发行。成千上万旅居英国的穆斯林在伦敦等地开始举行集会抗议。在穆斯林聚居的布莱福德，人们群情激愤，点火焚烧了一本又一本《撒旦诗篇》。抗议和谴责的浪潮很快就蔓延到欧洲其他国家，蔓延到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埃及……1989 年初，穆斯林的矛头开始从这本书转向了书的作者，有人喊出了“绞

死拉什迪”的口号。2月12日，几千名愤怒的巴基斯坦人冲击了美国文化中心，警察开枪镇压，五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月14日，伊朗最高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说话了。他发布了一道法特瓦（宗教命令），提出不仅要禁书，还要惩罚书的作者和出版者：

“我谨以真主的名义通知全世界虔诚的穆斯林，《撒旦诗篇》一书的作者及出版者已严重冒犯了伊斯兰教、先知和《古兰经》，必须将他们处死。我要求每个穆斯林不论在何处发现他们就立即执行其死刑，旨在使任何人都将不再敢亵渎穆斯林的神圣价值。无论谁因此而牺牲都将成为光荣的烈士，并将直升天堂。”

命令既下，举世震动。伊朗广播电台反复播送了霍梅尼的这道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法特瓦”。德黑兰街头立即出现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队伍，狂怒的人们高呼口号，响应霍梅尼的死刑令。伊朗政府也马上公布了处死拉什迪的悬赏金：杀死拉什迪的穆斯林可以得到260万美元，外国人可以得到100万美元。国外的一些穆斯林组织和个人也纷纷为悬赏捐款。数日之后，这笔悬赏金一升再升，上述两个数字分别超过了600万美元和400万美元。

据英国反恐怖专家说，霍梅尼的死刑令发出后不久，就有几支训练有素的伊朗职业杀手已开始潜往英国。世界许多国家怒火冲天的穆斯林，包括英国的穆斯林也都表示，只要他们发现拉什迪，一定要亲手将他杀死。

而西方世界对霍梅尼的死刑令却是一片愕然。他们从自己的观念出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和容忍这样的命令。西

方国家的议会和政府纷纷指责伊朗和霍梅尼，美国说“一个国家的政府绝对没有权利判处另一个国家公民的死刑”；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说“这纯属无耻的恐怖暴徒行为”；法国外交部长说，对于“用唆使谋杀的方式来诅咒，感到万分惊诧”；荷兰表示：“文明世界决不能容忍这种号召国际恐怖主义的行为。”萨尔曼·拉什迪是英国人，英国政府一方面向伊朗提出强烈的抗议，停止了正在进行的与伊朗改善关系的外交谈判，说“伊朗政府不尊重国际行为准则，两国难以建立正常关系”，后来又进一步断绝了两国的外交关系，同时伦敦警察厅采取了对拉什迪的安全警卫措施，把他送到一个秘密地点严密保护起来。

全世界45个伊斯兰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无论是与伊朗关系好还是不好，虽然有的在私下对此事也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但谁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态度，也没有哪一个替拉什迪说一句免死的话。只有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强调说，拉什迪本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本书的后面是反对阿拉伯和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与犹太人”。而一些国家的伊斯兰反对派组织却都对死刑令表示了赞同，如黎巴嫩的“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圣战者组织”都立刻发表声明，坚决拥护霍梅尼的法特瓦。

《撒旦诗篇》到底是怎样一本书，竟然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巨大的波澜？这本小说以荒诞的手法描述了一个名叫穆罕默德·麦亨德的商人受到神的耳语启示，成了先知，他在一座叫贾希利亚的城市创立了一种宗教。在拉什迪笔下，麦亨德不仅是一个冒牌的先知，而且也是一个反复无常、鲜廉寡耻的江湖骗子和好色之徒，他的妻子们是一群妓女并与先知穆罕默德的妻室同名，他的几个追随者也都是些好逸恶劳

的卑劣之徒。一些读过这本书的人称书里的内容完全是虚构的，而且该书本身也写得很糟，语言晦涩难懂，叙述也十分混乱，使人很难读得下去。但穆斯林认为，拉什迪是用象征手法，以麦亨德来影射先知穆罕默德，并把圣地麦加描绘成贾希利亚那样一座黑暗污秽的城市，因此他犯了亵渎伊斯兰教的弥天大罪。

书的作者萨尔曼·拉什迪 1947 年出生在印度孟买的一个穆斯林家庭，13 岁随父母移居英国，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在英国社会中长大的他已完全放弃伊斯兰信仰，但据说他也不信其他任何宗教。在写《撒旦诗篇》之前，拉什迪曾发表过《午夜之子》等另外几部小说，在英国文坛小有名气。获得过普克文学奖。但他没想到这部《撒旦诗篇》竟会给他引来杀身之祸，使他成了全世界 10 亿穆斯林的死敌。

42 岁的萨尔曼·拉什迪自己辩解说，他只不过是叙述了一个想象的故事，“这是一部复杂的讽喻作品，它描述了一种宗教的诞生，所叙述的是大英帝国对原印度居民的态度”。并说他根本无意污蔑伊斯兰教。尽管如此，在霍梅尼发出死刑令几天后，拉什迪还是发表了一个表示悔过的声明，他说，“作为《撒旦诗篇》的作者，我认识到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世界许多地方虔诚穆斯林的痛苦，我对此感到深深的遗憾”。但毫无用处，霍梅尼立刻通过电台说，拉什迪不能得到宽恕，“他的悔过能算什么，即使他重新成为虔诚的穆斯林，我们也必须把他送到地狱里去。连 1% 的可能也没有！”

1989 年 6 月 3 日，也就是在下达处死拉什迪的命令 3 个多月后，87 岁的霍梅尼去世了。但那道死刑令却仍使拉什迪度日如年地在警方保护下过着隐居生活，他的妻子不堪忍受这种死亡阴影下的日子，与他离婚分了手。近两年，拉什迪

也作过几次试探性的露面，但仍不敢脱离警察的保护。他有一次到法国巴黎作了一次“公开访问”，当他前往艾菲尔铁塔“自由漫步”时，乘坐的是一辆雷诺—25型防弹车，另有20辆警车护卫，英、法警方挑选了50名反恐怖特工人员对他进行贴身警卫，才战战兢兢地完成了他的这次“公开露面”。拉什迪对这种监狱般的隐居也深感痛苦，但又无可奈何，他对记者说：“现在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能自由地看望我的儿子，和到街上去买东西。”拉什迪给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写信，再次表示他希望得到伊朗政府的宽恕，但仍遭到拉夫桑贾尼的拒绝。1993年2月，伊朗政府举行了纪念霍梅尼发出追杀令四周年的活动，并表示不能解除霍梅尼对拉什迪下的死刑令。直到1994年4月，当伊朗司法总监雅兹迪在被问到是否要取消对拉什迪的死刑令时，他回答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原判决仍继续有效，它仍为所有穆斯林所接受。”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霍梅尼要求处死拉什迪的命令，使《撒旦诗篇》也成了一本不可触及的书籍。出版这本书的英国企鹅出版社的经理因受到威胁，也与拉什迪一样躲了起来，提出要求警方给予保护。1990年南非一家出售这本书的书店被人纵火焚毁。1991年7月，《撒旦诗篇》日文本的翻译者、日本筑波大学的比较文学副教授五十岚一在家中被人杀死。当他把这本书译为日文后，在日本很畅销。但不久他便接到一些奇怪的警告电话，然而他当时并不在意，称“我并没有做什么错误的事情”。1992年10月，这本书的意大利文翻译者卡普里奥洛也遭到暗杀身亡。1993年5月，土耳其一家报纸试着节选了书的一小部分发表，结果立即引起伊斯坦布尔等地成千上万穆斯林的抗议游行。

《撒旦诗篇》事件本身固然是一个文学作品伤害人们宗教

感情的事件，但整个伊斯兰世界竟会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是许多人所始料不及的。这一事件极其客观地反映出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对各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群众所产生的影响，反映了穆斯林自我意识的回归和加强。可以推测，假如这一事件发生在30年前，或是20年前，伊斯兰世界的反应是绝不会有这样激烈和广泛的。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埃尔温·托夫勒是这样来看待《撒旦诗篇》事件的，他说：

“当阿亚图拉霍梅尼指责小说《撒旦诗篇》亵渎神明，并号召殉教者去刺杀作者萨尔曼·拉什迪时，他对世界各国政府发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信息。转瞬之间，霍梅尼的声音便通过卫星、电视和文字媒介传遍了世界，然而他的真实用意却完全被误解了。

也许有人认为拉什迪的书情趣低下，嘲弄了一种宗教、亵渎了《古兰经》和《圣训》，有蓄意冒犯人数众多的穆斯林之嫌。霍梅尼也确实这样说过，但这绝不是他真正传出的信息。

霍梅尼实际上是向世界宣告，民族国家已不再是世界舞台上唯一的或最重要的角色了。”

这位学者认为，他实际是在告诉我们，必须服从于更高的伊斯兰教教规，宗教和教会的权力可以取代民族国家的权力。霍梅尼事实上是在向把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单位和全球舞台之主角这一惯例发起挑战。“按照过去的法规设想，组成我们脚下这个星球的是一个被整齐划分为国家的单元，各国拥有自己的国旗和军队、辖有明确的疆土，在联合国占有一个席位，同时还拥有其他的某些合理的法权。”

然而霍梅尼发出的死刑令确实使西方国家感到震惊。作为伊斯兰教一位赫赫有名的宗教领袖，他所发出的宗教指令，

已经远远超出伊朗什叶派国家的国界，而且超出了伊斯兰范围，而播扬到更大的世界地域之内。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写道：“萨尔曼·拉什迪事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全世界穆斯林的共同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在对付西方时，他们的立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一致或接近。”另外一家英国报纸《独立报》则称：“拉什迪事件标志着伊斯兰极端主义国际化的开始。”在拉什迪多次表示歉意，又经欧盟国家的斡旋，伊朗和英国在拉什迪问题上相持不下的局面渐趋缓和。1996年9月24日，伊朗政府以书面形式正式撤消了对拉什迪的追杀令，确认不再派遣杀手处死拉什迪。

## 中亚争夺战

中亚，指的是欧亚大陆中部一片辽阔的内陆地区，包括阿富汗和原来苏联的六个加盟共和国：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塔吉克、阿塞拜疆。也有人把伊朗和中国的新疆等地都算在中亚的范围内。中亚是世界上穆斯林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它与西亚、北非、南亚、东南亚一起，构成了伊斯兰世界最主要的五大块。

阿富汗，经过了14年伊斯兰圣战者与政府军的浴血战争，当支持喀布尔政府的前苏联军队撤走后，政府军就一直在经受着游击队一浪高过一浪的猛烈攻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92年4月，当苏联解体后，喀布尔政府终于分崩离析，宣告倒台了。总统纳吉布拉仓皇出逃，被已哗变的部队扣押下来，成了阶下囚（后被处死）。月底，由各派游击队协商组成的临时政府的车队开进喀布尔，宣布接管了政权。自此，阿

富汗进入了一个新的“伊斯兰时代”。国名从原来的“阿富汗共和国”改成了“阿富汗伊斯兰国”。新政府刚成立，一系列旨在建立“伊斯兰社会”的命令就发布了：喀布尔几十家电影院被关闭了，电视台的节目受到严格检查，要求所有妇女在公共场所一律戴上面纱，并建立了一个伊斯兰公共秩序委员会来打击违反教规者。

伊斯兰各派争夺权力和争夺地盘斗争也变得激烈起来。属原教旨主义派的伊斯兰党领导人希克马蒂亚尔与较温和的伊斯兰促进会的马苏德都握有重兵，由于双方在权力分配和对教义的解释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互不相让，最后终于兵戎相见，大动干戈。后来其他派别也卷了进来。

1993年中，在上述两派之间又出现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乌兹别克武装，它的公开名称是“伊斯兰民族运动”。其领导人是杜斯塔姆，他要求参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配。1994年底，一支被称为“塔利班”（阿富汗伊斯兰宗教学生运动）的队伍在阿富汗政局中迅速崛起，这支有近3万武装人员，数十架飞机和200辆坦克的力量，很快就控制了阿富汗全国约1/3的国土。这支令人瞩目的队伍是一支主要由伊斯兰青年学生组成的力量，“塔利班”在波斯语中意为学生。他们的主要领导人奥马尔是一名年轻的毛拉。塔利班提出的各种政治要求中有一条就是，只有“虔诚的穆斯林”才有资格参加阿政府的组织。1996年9月“塔利班”进一步攻占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刚从战争中解脱出来的阿富汗又陷入了混战之中。

但是，人们都认为，无论目前如何混乱，那只是伊斯兰各派之间的纷争而已，而阿富汗已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伊斯兰国家这一事实却是毋庸置疑了。一旦国内稳定下来，阿富汗的伊斯兰制度将对中亚、西亚和南亚各国产生非常大的



影响。

苏联的解体，使中亚地区一下子就出现了6个新的伊斯兰国家。这6个国家的大约6000万人口中绝大部分是穆斯林。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有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传统，早在公元9世纪初整个地区就完成了伊斯兰化。自苏联建国后，在70年的时间里，苏联政府长期实行打击宗教势力，限制宗教活动的政策，使伊斯兰教受到人为的压制，在人民中的影响日渐衰微。现在一旦实现了政治和宗教上的自由，一直被压抑的伊斯兰文化和宗教思潮开始迅速复苏，以填补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真空”。据报道，在许多办公室里，原来摆放列宁著作的地方摆上了《古兰经》。人们争相到沙特阿拉伯去朝觐，每年都有几千人去麦加。1989年前整个中亚地区只有大约160座清真寺，而到1992年清真寺已多达5000座了。

人口不多的塔吉克斯坦两年前还只有17座清真寺，而今天却已有130多座了，还有两千多处小型的礼拜堂遍布全国各地。首都杜尚别新建了一座雄伟华丽的大清真寺，白色的“唤拜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高耸入云。每天五次唤拜声一响起，大批的穆斯林都会前来祈祷。哈萨克斯坦的伊斯兰经学院从1所发展到9所。新建的清真寺和礼拜堂每到星期五总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由毛拉主持的婚礼和葬礼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欢迎，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蒙上了面纱。苏联统治期间，曾大力在中亚地区推行“俄罗斯化”，要求人们学俄语，推行俄罗斯文化。而如今俄罗斯文化在各伊斯兰国家已沦为次要文化，这些国家都在人民中推广本民族的语言和习俗。甚至作为一种对多年来推行“大俄罗斯主义”的报复和发泄，中亚各国的穆斯林对那些至今仍生活在当地的俄罗斯人采取明显的歧视态度。许多俄罗斯人和信基督教的其他民

族因受不了当地穆斯林的敌视，纷纷离开中亚，北迁其他独联体国家。

在中亚各国恢复传统伊斯兰教的热潮中，原教旨主义思想也活跃了起来。一个致力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伊斯兰复兴党”最先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有昔日曾是伊斯兰宗教和学术中心的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城市。伊斯兰复兴党在乌兹别克斯坦成立后没有得到政府批准，却于1990年在塔吉克斯坦获得了官方承认，不久就发展到了中亚其他几个国家。这个党宣称“苏联社会主义的消失，已在人民中造成了精神真空”，唯有“伊斯兰教可以填补这种真空”。伊斯兰复兴党在许多地方建立了基层组织，它们的目标就是在“苏联的瓦砾堆上建起一批真正的伊斯兰国家”。这个党在穆斯林群众中宣传原教旨主义主张，公开向政府进行挑战。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发展到近十万人，它与“民主派”联合，曾一度用暴力推翻该国政府。在乌兹别克斯坦，还有一个“统一意志人民运动”，哈萨克斯坦兴起了一个“九月党”，吉尔吉斯有一个“吉尔吉斯运动”。这些都是以伊斯兰教为旗帜和口号的政党。目前，中亚各国政府都公开表示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长期的无神论教育也使多数群众不愿完全接受伊斯兰复兴党的主张。但是，一旦局势不稳，经济恶化，原教旨主义势力将会迅速发展。

中亚伊斯兰国家出现后，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周边的其他伊斯兰国家在这个地区的激烈竞争。由于中亚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各国都希望能扩大自己在这里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各国都把帮助伊斯兰在中亚的复兴，使中亚的伊斯兰色彩更强烈，作为自己的义务。

伊朗从其强烈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出发，率先向中亚诸国出击，力图促使它们走上“伊朗模式的伊斯兰发展道路”。它与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有很长的共同边界，语言上与塔吉克斯坦相通。从1991年底开始，伊朗一再派出政府要员访问中亚诸国，向它们提供经济援助，并开放边界，联通航空、公路、铁路。针对中亚经过苏联70年的统治，穆斯林中宗教知识贫乏，《古兰经》等书籍匮乏，伊斯兰学校和教师严重不足的情况，伊朗还拨出巨款帮助中亚国家发展伊斯兰教育，援建清真寺，接受这些国家的人员到伊朗学习和培训。伊朗的活动受到中亚民间穆斯林群众的欢迎。

土耳其与中亚各国原同属奥斯曼帝国，双方在民族血缘、语言、宗教方面都有很深的关系，中亚多数民族都与土耳其共属突厥语系。中亚国家独立后，土耳其马上就承认了这些国家，并宣布把中亚地区作为其对外政策“优先考虑的问题”，也向它们提供了不少经济援助和文化合作项目，双方领导人频频互访。中亚各国政府对伊朗的援助还有些迟疑，认为伊朗那种政教合一的政体形式不适于中亚国家，感到伊朗强烈的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是对中亚各国政权的威胁，而对世俗化的土耳其却没有什么顾忌。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都明确表示土耳其的发展道路对它们是最适宜的。土耳其与中亚地区发展关系受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认为可以有效地遏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扩张。

巴基斯坦在中亚争夺战中也相当活跃。巴基斯坦认为它与这一地区过去同属统一的“伊斯兰文化区”，只是后来被人为地分开了，现在它希望重新建立从里海到阿拉伯海的“伊斯兰新月区”。它同中亚各国签订了一系列经济贸易协议，提

供贷款，修筑通往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高速公路，建议把卡拉奇作为中亚诸国的出海港口。

海湾阿拉伯国家也不甘落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1992年2月出访四个中亚伊斯兰国家，每到一个国家就签一个援助协定，援助总额为15亿美元，后又追加7.5亿。并以伊斯兰世界“盟主”的身份帮助修建清真寺、经学院，赠送大批《古兰经》和各类宗教书籍，资助中亚穆斯林到麦加朝觐。科威特宣布向中亚国家提供10亿美元。埃及则邀请中亚的宗教学者到爱资哈尔大学进修，派人到中亚去宣传“埃及模式”，以抵消伊朗在那里的影响。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对中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它们更关心的是防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在这里的发展，同时，它们也十分担心原苏联核武器从中亚地区外流。在它们看来，如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再拥有了核武器，那将是西方世界的灾难。美国对伊朗在中亚的活动深感不安，认为“将会导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革命”，并希望与中亚领导人商讨如何防止这个地区“出现伊斯兰狂热”。

1992年2月，由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建立的“伊斯兰经济合作组织”在德黑兰举行首脑会议，并吸收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五国为新会员国，哈萨克斯坦作为观察员参加活动。会议宣称这是一个可以与欧洲共同市场相比的、具有3亿人口的伊斯兰共同市场的开始。

各个方面对地域辽阔的中亚的争夺正方兴未艾，可以肯定，伊斯兰教将在未来的中亚各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而中亚未来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将会日益突出。

## 新一轮伊斯兰潮的冲击

伊斯兰世界在70年代末经历了以伊朗革命为代表的一次伊斯兰浪潮冲击后，80年代中期曾有过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自90年代初开始，许多国家又再次领略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浪潮新的冲击。从动荡的波斯湾，到西亚的黎巴嫩、约旦，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到北非的苏丹、阿尔及利亚、埃及、突尼斯，在前苏联的中亚地区和阿富汗，甚至在纽约、伦敦、巴黎，人们都可以感觉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咄咄逼人的新一轮攻势。

两伊战争爆发时，西方国家认为代表伊斯兰激进势力的伊朗威胁更大，于是它们与阿拉伯国家一道全力支持伊拉克，遏制霍梅尼的“革命输出”。但没料到这样做却养虎成患，使伊拉克的萨达姆在军事上强大起来，掀起了一场吞并科威特、称雄波斯湾的风波，迫使美国不得不组织多国部队，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海湾战争，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才把伊拉克打下去。岂知，在波斯湾的另一边，两伊战争中受到重创的伊朗又悄悄地从八年血战的废墟上重新崛起，在战后的短短几年里它以惊人的速度得到了恢复，现在它经济上超过战前水平，军事上重新成为地区强国，又以一个伊斯兰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政坛上。

在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中，伊拉克为了巩固后方，将两伊战争中占据的土地全部退给了伊朗。伊朗兵不血刃就获得了八年战争所没有得到的东西。它利用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经济困难之机，向俄罗斯、乌克兰购买了60亿美元的飞机、坦克、潜艇等武器，同时利用法国、德国、日本等国提供的

资金和技术，完成了大部分军事工业的改造。现在伊朗不但经济上已超过战前水平，军事上也重新成为了一个地区强国。还有的西方国家称，伊朗很快就将拥有核武器。

有些人曾希望，伊朗在霍梅尼去世后，握有实权的总统拉夫桑贾尼将会采取一些务实的做法，使伊朗的原教旨主义色彩淡化。但经过几年的观察，他们失望地看到，拉夫桑贾尼表面上显得不那么激进，但实际上他的所做所为一点都没有放弃伊斯兰政治路线。精明的新一代伊朗领导人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在对外政策方面更加务实和富于策略性。“输出伊斯兰革命”已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具体的行动。伊朗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要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军事对抗，伊朗是占不了便宜的。因此，最有效的方法是合法地向其他伊斯兰国家发动“意识形态攻势”。由于伊朗昔日的对手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遭到沉重打击，现在海湾地区已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与伊朗抗衡。伊朗在伊斯兰世界已摆脱了过去孤立无援的状况：在意识形态方面，它有苏丹、阿富汗以及遍布各国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为盟友；在战略方面，它与叙利亚、巴基斯坦和中亚各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与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关系也有所改善。1993年6月，拉夫桑贾尼总统的一位高级顾问说：“我们正赶上一个极好的时机，除伊朗外，没有哪一个国家能领导伊斯兰世界。这是一个历史性机会。”

现在，美国及其欧洲伙伴和以色列都开始意识到，作为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心的伊朗的重新崛起，对西方世界已再次构成了威胁。尤其是以色列，它对于中东地区极端仇视犹太复国主义的伊朗的崛起十分担心，不断开展外交活动，希望西方大国采取行动遏制伊朗。同时，它自己也在研究对策。据科威特《祖国报》分析，以色列甚至可能重演历史，像

1981 年对付伊拉克一样，先发制人地采取行动，派飞机远程突袭伊朗的核设施。

在整个北非地区，各个国家都面临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新的暴力或非暴力的威胁：阿尔及利亚、埃及、突尼斯、摩洛哥政府一直在与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分子斗争，但政府的镇压往往导致极端分子们更猛烈的报复和反抗。1993 年初，这些国家的重大新闻几乎全是关于政府如何打击和镇压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消息，逮捕、监禁、审判、处决。然而，就在同时，袭击、爆炸、绑架、暗杀的消息也在连篇累牍地出现。这些国家的政府除了采取共同行动，联手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外，都异口同声指责伊朗、苏丹支持这些极端分子的活动。

自 1993 年春天起，在埃及许多著名的旅游胜地，从上埃及的阿斯旺，到中部的卢克索，开罗附近的吉萨金字塔区，直到尼罗河入海口处的亚历山大港和西奈海滨，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针对西方游客，尤其是美国游客的传单和标语。原教旨主义者们限令西方游客离开埃及，并警告说“埃及不是你们寻欢作乐的地方”、“不许把美国的腐败带到穆斯林的土地上来”、“真主厌恶你们”。一些原教旨主义分子真的采取了行动，今天在金字塔下袭击旅游者的汽车，明天在尼罗河上袭击游船，弄得西方人胆战心惊，草木皆兵，已来到的人只想赶快离开，没来的人也不敢来了。一时间，埃及经济重要支柱之一的旅游业变得十分萧条。尽管埃及政府采取了不少保护性措施，并增加了旅游项目，但仍无法控制旅游业大滑坡的现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这一招是一箭双雕，一方面是驱除西方影响，另一方面是打击“非伊斯兰的”现政权。

伊斯兰极端分子不仅把暴力活动的矛头指向来旅游观光的外国人和国内的基督教徒科普特人，还把恐怖活动搞到了

欧洲和美国。1993年2月，美国世界贸易中心被炸，最后警方追踪到的几名嫌疑分子据说都是来自埃及的原教旨主义分子。老牌的穆斯林兄弟会虽然已宣布放弃暴力，但它与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间仍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一方在议会中发表声明和宣言，以求得到人民的支持；另一方在社会上从事着暴力活动，打击政府的力量，似乎在起着异曲同工的作用。

埃及人中的识字率不高，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仍能迅速蔓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地下流传的非法录音带。这种录音带复制、散发十分容易，官方防不胜防。如最著名的盲教长、流亡国外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领导人拉赫曼在一盘录音带中说：“埃及的统治者为了换取奢华的生活，已向魔鬼出卖了他们的宗教、良心和他们的人民。”关于萧条的旅游业，他说：“穆斯林的土地区不能成为任何种族中罪恶者的妓院。”

在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其他国家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在步步推进：

——土耳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活动逐渐从地下转为公开，在全国城乡蔓延。土耳其政府承认，目前对国家政局构成威胁的，一是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分离活动，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宗教政治运动。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在南亚、东南亚各国中都有新发展。在孟加拉国最近的议会选举中，原教旨主义派别已崭露头角。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各伊斯兰组织的压力下，1992年宣布恢复实施曾一度取消的宗教组织参政法。在印度，由于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之间的教派冲突加剧，穆斯林中的原教旨主义情绪在迅速上升。



——中亚，尽管新独立的各国政府仍希望走世俗道路，但原教旨主义力量却在民间不断发展，并成为凝聚反对派的粘合剂。

.....

按苏丹伊斯兰领导人哈桑·图拉比的说法，伊朗、阿尔及利亚、苏丹分别代表了伊斯兰政治力量夺取政权的三条道路：群众革命、民主选举、军事政变。现在，伊朗和苏丹都已建立了稳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阿尔及利亚的原教旨主义者在选举中也大获全胜，只是由于军方干预才功败垂成。似乎是为了挽回阿尔及利亚的损失，在埃及、约旦和黎巴嫩的议会选举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党派都获得了惊人的胜利。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与劳工党组成了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约旦的侯赛因国王为了避免出现暴力冲突，也同意穆斯林兄弟会作为议会中最大的集团，议长哈比卜就是一个著名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而在黎巴嫩，基督教徒和亲叙利亚的逊尼派却不愿承认什叶派真主党的胜利，权力的争夺仍在激烈进行。

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春季号有一篇文章说，从现在的情况看，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危险还不是“真主党”、“哈马斯”之类的想用暴力手段取胜的派别，而是那些企图通过民主道路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原教旨主义分子。一些阿拉伯国家似乎也认识到了这点，科威特、阿尔及利亚等国都中断了它们的“民主化进程”；沙特的法赫德国王更是明确地宣布：“民主？那是不适宜我们的东西。”

亨利·基辛格，这位美国的前国务卿、被称为“当代最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1994年初在接受美国《洛杉矶时报》采访时，对国际大格局、美国的全球利益和战略、美欧

关系、美国与亚洲和太平洋国家关系一一作了分析。当被问到：“今后十年，最使你担心的潜在威胁是什么？”时，他沉吟了片刻后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大规模移民潮。”他进一步解释说：“除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外，当前世界上没有其他意识形态能对美国和西方形成实在的威胁，而我们过去往往低估了这股力量。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我们仍对此没有什么概念。”

##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国际化

种种迹象表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除了在许多国家增长外，已开始向国际化的方向迈进：

已有 60 多年历史的老牌原教旨主义组织穆斯林兄弟会，最早诞生于埃及，现已几乎遍布所有阿拉伯国家，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跨国组织”。1954 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对穆斯林兄弟会的镇压，就像用一桶水浇在一片燃烧的汽油上一样，火没有扑灭，反而弄得火苗四溅，遍地燃烧。叙利亚的穆斯林兄弟会已成为这个国家最强大的地下反政府组织，是阿萨德总统的心腹大患。约旦的兄弟会与侯赛因国王进行的是“文斗”，议会已基本成了它的天下。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公开声称它是兄弟会的一个分支；苏丹由图拉比领导的“伊斯兰民族阵线”、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也都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政党。另外许多形形色色的激进小组织，如“伊斯兰圣战者”、“真主战士”、“伊斯兰解放运动”等等，都是由穆斯林兄弟会衍生而来的。据 1995 年美国出版的《革命中的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原教旨主义》一书中罗列的阿拉伯各国知名的伊斯兰政治组织多达

175 个。

穆斯林兄弟会并没有一个总指挥部，也没有一个凌驾于各国组织之上的“导师”或“领袖”之类的人物，甚至它也没有一个共同的纲领或宣言。但无疑，各个组织之间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它们都奉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班纳为精神领袖，它们的最终目标都是要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它们的战斗口号都是：“《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先知是我们的向导，为真主献身是我们最崇高的理想。”也正因为穆斯林兄弟会只有一个总目标，而没有具体的行动纲领，不同国家之间的兄弟会在斗争策略上可能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一个国家里它可能采用非暴力方式，而在另一个国家里它却可能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甚至采用极端的恐怖主义手段来达到它的目的。

1991年4月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召开的“阿拉伯伊斯兰人民会议”，实际上也是一次穆斯林兄弟会的国际聚会。这次会议宣称，为了建立伊斯兰的统治，穆斯林采用任何斗争方式都是正当的。1993年、1995年又召开了阿拉伯伊斯兰人民会议的第二、三届大会。苏丹与伊朗在西亚北非遥相呼应，大有建立“德黑兰—喀土穆轴心同盟”之势。它表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建立起某种国际合作形式。

历时14年，死亡200万人的阿富汗战争，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喀布尔傀儡政权的垮台，终于在1992年4月以“圣战者”的胜利而告结束。这场战争的明显结果，就是导致了一个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阿富汗伊斯兰国和阿富汗一部新伊斯兰宪法的诞生。但这场战争的另一个结果却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那就是它同时还培养出了一批国际性原教旨主义的圣战士。

在阿富汗战争中，人们注意到圣战者游击队中常常有一些奇怪的战士，他们既不会讲阿富汗话，外貌也不同于一般阿富汗人，但他们却骁勇善战，信仰也特别虔诚，每天五次祈祷是非做不可的。一些西方记者开始对他们产生了兴趣，经过调查和追踪采访，终于了解到这些人是从其他国家志愿到阿富汗来参加“圣战”的外国穆斯林。据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法尔曼说，在阿富汗各派圣战者中，最多时有上万名外国穆斯林志愿人员，他们来自20多个国家，多数是来自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等国家的阿拉伯人，另外也有不少伊朗人、土耳其人、印度人、马来西亚人，甚至还有菲律宾人、缅甸人。

这些外国圣战者们称，他们来到阿富汗参加战争并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信仰，为了保卫神圣的伊斯兰教。确实，他们在阿富汗打仗是没有什么报酬的，除了战场上的枪林弹雨、生命危险之外，生活上也是非常艰苦的，常常要风餐露宿，昼伏夜行。然而，他们认为，为了信仰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哪怕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古兰经》中早有规定，为圣战而牺牲者可以直升天堂。有不少人确实也就长眠在了阿富汗的土地上。另外，由于阿富汗游击队有海湾国家、美国、欧洲等方面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持，这些外来的穆斯林用不着为生计操心，他们吃的是美国的大米、欧洲的罐头、东南亚的水果，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新式装备，有用之不尽的武器弹药。他们只管打仗，完全成了职业的“圣战者”。他们与阿富汗本国的圣战者并肩作战，一个个在战火中锻炼得非常勇敢顽强，而且充满着为伊斯兰奋斗的献身精神。

1992年初，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来到阿富汗圣战者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个营地。他看到的景象是，一位埃及

医生正在为一名伊拉克伤员作手术，来自埃及、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的武装战士出出进进，接受他采访的指挥官是一名巴勒斯坦人，而为他们作翻译的却是一位菲律宾人。这位指挥官说：“对我们来说没有必要分清谁来自什么国家，我们都是穆斯林，我们在一起参加圣战。”

当初，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圣战者们大都是以旅游者的身份进入巴基斯坦，然后去到与阿富汗交界的白沙瓦省加入阿富汗游击队的。当阿富汗战争结束后，这些外国圣战者对阿富汗伊斯兰抵抗运动内部各派的权力之争不感兴趣，他们中有许多人已先后返回了自己的国家。据报道，如今活跃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等地的原教旨主义武装分子中，有不少人就是从阿富汗返回的圣战士。在南亚次大陆的克什米尔地区，现在也聚集了一批原在阿富汗打仗的各国圣战者，正在组织反对印度人的游击战争，他们称，他们的目的是要帮助克什米尔穆斯林争取独立。

到1992年底，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圣战者中大约仍有两三千人滞留在巴、阿境内，他们中有些人正在寻找下一个“圣战”的目标，他们开办了培养和训练各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的营地；还有些人则本来就是有国难归、有家难回的“国际亡命者”，因为他们大都是被本国政府通缉在案的宗教极端分子。一个阿尔及利亚战士说：“我已在阿富汗打了两年多圣战，现在我们已经胜利了。我不知道我应该到哪里去。也许我要回我的家乡阿尔及利亚去，在那里发动新的圣战。”

一些国家对聚集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这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深感忧虑，认为他们迟早要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心腹之患。巴基斯坦政府对这批人也感到很棘手，因为他们对巴基斯坦的稳定也形成了威胁。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巴基斯坦

政府决定不再签发或延长这些人的签证，尽力动员他们离境回国，并命令其驻外使馆从严控制进入巴的旅游签证，以免再让其他原教旨主义分子到巴基斯坦来。

前南斯拉夫解体后，原加盟共和国之一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爆发了激烈的内战。总的来看，冲突的一方是当地的穆斯林及其盟友克罗地亚族，另一方是塞尔维亚族。波黑穆斯林占全境人口 436.4 万的 43.7%，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占 31.4%，信天主教的克族占 17.3%。三方冲突的焦点是抢占地盘，以便建立各个民族自己的国家。

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波黑的穆斯林实际上是信仰了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人。15 世纪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征服了隶属塞尔维亚的波斯尼亚地区，后来当地很多塞尔维亚人改信了伊斯兰教，他们的语言仍是塞尔维亚语。70 年代初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把波黑的穆斯林划分为一个与联邦内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等民族具有平等地位的“民族”，从而种下了日后冲突的苦果。

远在欧洲的波黑与伊斯兰世界在地域上并不相联，在政治、经济上也没有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冲突。只因为交战的一方是当地的 300 万穆斯林，于是从马来西亚到摩洛哥的整个伊斯兰世界便坚定地站在波黑穆族一边。各伊斯兰国家除了异口同声在各种国际论坛上大声疾呼，要求制裁与穆斯林对抗的塞尔维亚人外，还纷纷向波黑穆斯林提供援助。沙特阿拉伯一国就先后拿出了十多亿美元，土耳其运去了大量物资，伊朗不仅出钱，而且还出人，派出了一支伊斯兰革命卫队前往波黑参战，以保卫当地那些“伊斯兰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对于那些曾在巴基斯坦、阿富汗战斗过的“圣战士”来说，

波黑战场又成了他们实现自己梦想的地方。据外电报道，在波黑穆斯林部队中，有留着大胡子的阿富汗人，有戴着阿拉伯头巾的沙特人，有裹着黑色缠头的伊朗人。当记者问他们来自何方，回答是：“全世界，我们都是穆斯林，我们在一起参加保卫伊斯兰的圣战。”

## 伊斯兰潮的蔓延

除了各穆斯林国家中涌动的伊斯兰大潮外，当代国际伊斯兰运动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泛伊斯兰思潮在许多国家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中蔓延发展。这种思潮强调全世界穆斯林的同一性，强调伊斯兰教是一种超民族、超国家的宗教，认为宗教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甚至鼓吹要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有些国家（如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度、泰国等）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要求“独立”、“自治”的活动加强，并得到许多穆斯林国家或组织的支持。

菲律宾约有 500 万穆斯林，占该国人口近十分之一，主要集中在南部几个相邻的岛上。早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前期，菲律宾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就一直要求在该国南部几个省取得自治地位，但受到菲政府的压制。穆斯林中的激进派别便建立了游击武装组织“莫洛全国解放阵线”与政府进行武装对抗。游击战争在棉兰老岛、苏禄等地持续了许多年，游击队与政府军的伤亡都十分惨重。后来，在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干预下，菲政府才与莫洛阵线实现停火，并同意穆斯林地区实行自治。但进入 90 年代以后，受中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影响，菲律宾穆斯林中激进势力再度兴起，提出了要

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的口号。激进派的活动不仅使穆斯林少数民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再度紧张，而且也导致了穆斯林社团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激烈斗争。

泰国政府的官方资料称，泰国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数不到300万，只占人口总数的4%。但泰国穆斯林则说他们的人数已近500万，占全国人口8%多。泰国穆斯林中马来人居多，他们绝大多数集中在南部的北大年、陶公等府。早在60年代穆斯林中就建立了“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从事旨在从泰国独立出去的武装斗争，遭到政府的镇压。近年来在国际伊斯兰潮的影响下，泰国穆斯林的宗教意识又有明显的强化趋势，不仅祈祷、斋戒、朝觐等宗教活动加强了，清真寺的数量增多了，他们中还出现了一些政治性小组织，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和报纸。他们关心的问题：一是要求在穆斯林人口集中的地区实行自治；二是要求在中央权力机构中有更多自己的代表，如国会议员、政府部长等。1993年7月，有消息报导说，在泰国南方的北大年地区，穆斯林中已出现了某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组织，再次提出建立独立的地方伊斯兰政府的政治要求，并与有关中东国家的政府和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往来。

印度是一个有着多种民族和宗教的国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是全国最大的两种宗教。据最新的统计资料，现在印度教徒人数约为7亿，占全国人口的83%，穆斯林人数为9300万，占全国人口的11%左右。虽然穆斯林在印度是少数民族，但其绝对数却又使印度是世界上仅次于印尼和巴基斯坦的第三个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1947年印、巴分治后，250万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从巴基斯坦迁到了印度，大约650万穆斯林从印度迁入巴基斯坦，



但还有占人口约10%的4000多万穆斯林没有迁走，作为少数派留在了印度，成为后来印度国内宗教冲突的一方。留下来的穆斯林大部分集中在北方邦、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安得拉邦以及克什米尔地区。长期以来，穆斯林都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边缘，无法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很少，也很少在内阁中获得有影响的职位。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不但远远低于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甚至也不如只占人口2%的锡克教徒。印度穆斯林群众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比较低下，普遍都比较贫穷。对这种政治上无权、经济上落后和宗教上受压的状况，穆斯林一直深感失望和不满，认为自己是“低等公民”。

一些印度教徒也认为印度教徒才是印度真正的主人，穆斯林是外来者，正是伊斯兰教才导致了印度的分裂。印度教极端分子组建了印度人民党，这个政党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大印度教派主义色彩，被许多西方观察家称为“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政党。

近年来，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对立和冲突的焦点是在北方邦圣城阿约迪亚的寺庙之争。

阿约迪亚是印度教的一个圣地，是传说中的印度教主神之一罗摩的诞生地，原来曾有一座罗摩神庙。16世纪莫卧儿王朝的开国皇帝巴卑尔下令拆毁了罗摩神庙，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巴布里清真寺。400多年来，印度教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一再提出要求拆寺建庙，并多次与穆斯林发生暴力冲突。1949年，地方当局为避免发生进一步冲突，下令关闭了清真寺，印穆双方都不得进入。此后30多年，两派基本相安无事。

1984年，印度教组织世界印度教大会又重新挑起争端，号召印度教徒前来阿约迪亚拆寺建庙。穆斯林也针锋相对地

成立了一个“巴布里清真寺行动委员会”，动员大批穆斯林来参加保卫清真寺。1989年印度人民党开始介入这场寺庙之争，使印、穆矛盾更趋尖锐。1990年9月，印度人民党领导人阿德瓦尼亲自组织了“战车游行”，他站在一辆改装成古代神话中战车的汽车上，从古吉拉特邦向阿约迪亚进军，号召印度教徒前去为宗教作“牺牲”。数千印度教徒冲进清真寺，破坏了部分建筑，并与穆斯林发生了暴力冲突，双方死亡数十人。政府为了避免事态的扩大，出动军队对印度人民党的挑衅行动进行了制止，并逮捕了阿德瓦尼。

1992年12月6日，印度人民党和世界印度教大会等几个组织再次发动印度教徒向阿约迪亚进军。这天早上，大约50万狂热的印度教徒云集阿约迪亚，他们先是聚集在巴布里清真寺的围栏外祈祷。中午11时，一些人冲破围栏，爬上清真寺的圆顶，用铁棍、大铁锤等工具拆毁清真寺，另一些人则拆除住在周围的穆斯林的住房。几个小时后，有400多年历史的巴布里清真寺就成了一片瓦砾。次日，清真寺原址上建起了一个临时的罗摩庙，里面安放了罗摩神像。

事件发生后，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教派冲突，引起局势动荡。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总理发表电视讲话，谴责毁寺行为，并派军队进驻阿约迪亚，逮捕了印度人民党的领导人和一些宗教极端分子，还答应修复巴布里清真寺。

阿约迪亚的动乱虽然暂时平息了，但这一事件对印度社会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随着清真寺的被毁，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脆弱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了。巴布里清真寺被毁在印度穆斯林心中刻下了难以治愈的伤痕，印、穆教派关系恶化到独立以来最严重的地步。印度穆斯林中本来就存在着一种分离主义倾向，阿约迪亚事件后，在一些宗教极端分子的

煽动下，这种倾向加强了，并进一步发展宣扬暴力和复仇的狂热情绪。穆斯林中的原教旨主义思想空前高涨，他们中的极端分子在孟买等城市连续制造了数起严重的爆炸恐怖事件。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在1993年的头几个月内已造成近5000人死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

毁寺事件也影响到了印度的对外关系。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对此反应十分强烈。巴、孟政府都表示了严重抗议。巴基斯坦有近百座印度教寺庙遭到穆斯林的袭击或被拆毁，孟加拉国也有数十座印度教寺庙遭到袭击。伊朗、约旦、沙特阿拉伯等伊斯兰国家也纷纷谴责印度政府纵容印度教极端分子的行为，而伊斯兰世界的声援又加强了印度穆斯林的斗争精神。

人们认为，在这种强烈的教派对立情绪和紧张关系的影响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还很有可能再次爆发地区性或者全国性的冲突。

以意识形态对立为标志的冷战结束后，世界许多地方出现了民族主义复兴的现象。前苏联按民族分裂为众多的独立国家，俄罗斯联邦内车臣等民族要求独立的呼声高涨，前南斯拉夫的波黑等地民族冲突的激化，非洲各地愈演愈烈的部族流血冲突，都证明了民族主义上升的趋势。

在中东、中亚和南亚地区，伊斯兰教与民族之间有漫长的亲缘关系，被阿拉伯、波斯、突厥等民族以及一些印度次大陆的民族视为他们的民族宗教。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伊斯兰教始终与当地的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使这些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带有独特的宗教文化色彩，也使这种东方的民族主义完全不同于欧洲的那种单质的民族主义。

当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后，国际格局的变化使民族主义

在许多地区成为填补政治权力真空的意识形态。然而，在中东、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等穆斯林集中的地区，民族主义的复兴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不仅在时间上吻合，而且在口号、内容上也有许多相通之处。一些地区的民族主义势力借助伊斯兰宗教和文化的力量，而许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也利用冷战后再度崛起的民族主义扩大自己的影响。

因此，冷战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与民族主义的共生性和伴生性。这一点在前苏联的中亚地区、巴尔干地区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地都表现得非常突出。

1994年，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提出了“文明冲突”的观点。他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而是“文化上的”。他称，“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是未来的战争线。”他的这一观点提出之后，立即在学术界、政治界和新闻界引起了一场争论。

亨廷顿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是近代世界冲突演化的最新阶段。他说，近代的冲突曾经历了三个阶段，它们分别是君主、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基本上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而当冷战结束后，国际冲突进入了第四个时期，即文明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已超出了西方文明的范围，变成了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文明的因素将成为人类社会中一切冲突之源。他断言：“下一次战争，如果有的话，那将是文明之间的战争。”

在亨廷顿看来，文明之间的差异是人类最根本的差异。随着全球经济的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进程，使人脱离了长期以

来的本土认同,同时也弱化了把民族国家作为认同的根源,于是宗教便以原教旨主义的形式来填补真空。宗教复兴为人们提供了认同和依存的基础。他说,以往非西方社会中的精英分子通常是最倾向于西方的人,现在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即精英分子的本土化和非西方化的情形正在许多亚非国家社会中出现。日本从过去的“西方化”转为“亚洲化”;在印度出现了“印度教化”;在中东,由于源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失败,也导致了这个地区的“重新伊斯兰化”。他认为正是这些现象,说明了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在所难免。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提出,后冷战时代,随着前苏联威胁的消失,主要的冲突将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而西方文明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将是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联合势力。作为一位美国的政治学教授,亨廷顿站在维护美国利益的立场上提出,要加强西方文明内部(主要是欧洲和北美)的合作,把东欧和拉美融入西方,遏制儒家国家(指中国和一些东亚、东南亚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发展,保持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

对于亨廷顿的观点,我们当然是不能同意的。因为他把文明政治化、极端化了,把国际关系中的一切冲突都归结为文明的冲突,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而且也是违背文明属性的。他的文明冲突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冷战模式。另外,他在阐释其理论时,严重地忽视了不同文明之间具有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和相互吸收的能力。

然而,从亨廷顿的观点中,人们也能看到,正是由于近年来伊斯兰势力在中东及其周边国家的崛起,以及伊斯兰潮

在世界许多国家的蔓延，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国确实感到了它的存在和威胁，并把它与儒家文明（因为中国和东亚的崛起）一起视为西方最强大的敌手。

## 对伊斯兰潮的思考

在通常情况下，宗教作为人类社会一定时期的一种产物，它的兴衰是受到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能力制约的。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及社会能力的增强，宗教的力量必然会下降，直至最后消亡。当我们回顾佛教、基督教，或是其他一些宗教的历史时，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条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然而，当代伊斯兰大潮的兴起却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外。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科学先进、文化昌明、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能力已有极大提高的今天，却出现了这样一场规模宏大、来势猛烈的以伊斯兰为旗帜的政治社会运动。我们应该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呢？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当代伊斯兰潮兴起的直接原因是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伊斯兰风暴的旋涡中心在中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半个世纪来，中东各国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先后尝试过各种政治模式，如埃及实行过纳赛尔式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拉克、叙利亚实行的是阿拉伯复兴党的社会主义，伊朗、土耳其则采取了西方资本主义式的“自由经济”等，但都没有取得预期的发展效果。在意识形态方面，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外来思想也先后流行于一些伊斯兰国家中，却始终没有在广大的穆斯林中扎下根来。许多国家出现动乱和不稳，如频繁的战乱、政变、独裁等，同时也导致了外国的

插手和干涉。这一切都使人们对外来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感到怀疑和失望，认为它们不适用于伊斯兰社会。

50—60年代，各伊斯兰国家都努力致力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建设。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如两极分化、失业、贫困、犯罪，以及城市畸形发展、环境污染、人口膨胀、交通混乱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都仍十分低下，经济基础单一落后，对外依赖严重，广大的穆斯林群众生活困苦。即使在少数石油生产国中，巨额的石油财富也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社会分配十分悬殊。这些都是与伊斯兰教所提倡的“正义、平等、友爱”格格不入的。

在一些伊斯兰国家，相当大一部分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开罗有一个著名的“死人城”，数十万穷人因没有住房而长年住在坟墓群中与死人为伴。要是到突尼斯城、阿尔及尔、亚历山大、卡萨布兰卡等北非城市走走，给人印象最深的体会是：在咖啡馆，在街头广场，在居民区沿街的墙角，到处都是无所事事的年青人。1988年在阿尔及利亚，1989年在约旦，都发生过因经济恶化、生活下降引起的街头骚乱。有人说，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没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他任何一种煽动性口号也都足以引起动乱和革命。

世俗化、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使大量非伊斯兰的价值观念、文化、生活方式进入了伊斯兰社会，给传统的道德观念、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家庭、部族关系发生了动摇。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速度远远超过了人民群众思想意识的发展水平。西方文化中许多腐朽的东西不断侵蚀着伊斯兰文化。穆斯林群众对此感到迷惘和苦闷，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宗教意识的淡漠和忘却，归咎于世

俗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他们带着这种不满的情绪，希望到早期的宗教教义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把解脱现世的苦难和民族振兴的理想寄托于伊斯兰教的复兴。

在对外关系上，一些伊斯兰国家不仅无力抗拒外来势力的渗透和控制，甚至多年来还不得不依附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与犹太复国主义争夺巴勒斯坦的斗争中，有上亿人口的阿拉伯国家一再败给只有300多万人的以色列。尤其是在1967年的“六·五”战争中，大片阿拉伯土地被以色列占领，就连伊斯兰教最重要圣地耶路撒冷也完全落入以色列人手中。这对每个穆斯林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极大的耻辱，他们不会不对这一切提出疑问：“我们的政府怎么了？我们的民族怎么了？我们的信仰怎么了？”

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于美苏在全球争霸的高潮时期，发展于阿拉伯国家1967年惨败之后，并不是某种历史的巧合，而是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

其次，要理解伊斯兰潮的兴起，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伊斯兰这种宗教的特殊性。

一谈起宗教，人们很自然便会想到天堂、地狱、鬼神，想到神秘的寺院、肃穆的教堂，香烟缭绕，祈祷声声。特别是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宗教是一种虚无缥缈、神秘莫测、完全属于精神世界的东西。因此，许多人对当代伊斯兰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感到很难理解，他们无法想象伊斯兰作为一种“宗教”，竟有如此巨大的能量，也无法理解为何千千万万穆斯林每天要顶礼膜拜，要倾家荡产去朝觐，在日常生活中的穿衣吃饭、举手投足都要遵守某种特殊的规定。

在某种意义上，伊斯兰教也与基督教、佛教等其他宗教一样，是一种精神信仰。它相信神（真主）的存在，相信世



间的一切都是真主的意志，还相信世界末日论。它也有经典（《古兰经》和《圣训》），有一整套宗教仪式（五功），以及教职人员（乌勒玛、毛拉等）。但是，对于很多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远不止这些，它还是一种价值观念，一套完整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一种文化体系以及一种生活方式。

在理论上和在早期伊斯兰教的实践中，伊斯兰社会里是没有宗教与世俗的区别的，它不像基督教有“把恺撒的东西归于恺撒，把上帝的东西归于上帝”的教俗分离观念，更不像佛教有“脱离红尘，修身养性，求来世超脱”的消极出世思想。伊斯兰教本身就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紧密相联，《古兰经》和《圣训》中很多内容就是指导穆斯林的日常生活的。可以这样说，伊斯兰教不仅像其他宗教一样确定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即精神信仰），而且还确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生活）。作为一个穆斯林，伊斯兰教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信仰，而且是他生活的一切。他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穆斯林，不存在入教、皈依或受洗之类的仪式。他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对他来说就是伊斯兰教，无论他是否参加祈祷、斋戒、朝觐等活动，他都是一个穆斯林。如果他参加了这些活动，就是履行了宗教义务、令人称道的穆斯林了。

伊斯兰教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政治与宗教之间的紧密联系。穆斯林组成的宗教社团就是国家，宗教领袖就是国家的领导人，伊斯兰教法就是国家的法律。这样，整个政治体系都是建立在伊斯兰教基础之上。

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同时，他也创建了伊斯兰国家。在他这里，政治和宗教是合为一体的，宗教即等于政治。而基督教、佛教的创始人耶稣和释迦牟尼在创教和传教过程中，始终是作为处于遭诋毁、受迫害的“异端”，他们始终没

有机会使宗教与权力相结合。这两大宗教的广泛流传都是在其创始人死后很久才开始的。所以，它们更注重的是个人精神方面的“修行”和“拯救”。

理解了伊斯兰教的“教俗不分”、“政教合一”的特点，我们就不难懂得为什么会出现“伊斯兰复兴”的现象了。正是由于伊斯兰教的这一特殊性，当出现社会危机或政治危机时，伊斯兰思潮便会作为一种本能的反应而兴起。

第三，60年代以来一些伊斯兰国家由于石油收入的增加，在国际上提高了政治和经济地位，雄厚的资金也为伊斯兰复兴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70年伊斯兰产油国的产油量为9.9亿吨左右，占世界总产油量的45%。1973年石油提价后，伊斯兰国家的石油收入激增。从1974年至1979年，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收入就接近5000亿美元，仅沙特阿拉伯一国的收入就达2000多亿美元。大量的石油收入对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沙特、利比亚、伊朗、科威特每年都为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活动提供巨额的资助。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如先进的交通、出版、通讯手段，也有助于世界规模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如现代交通工具可以每年使200多万穆斯林方便地从世界各地到麦加朝觐；宗教反对派可以在国外，甚至坐镇欧美，对国内的宗教运动进行遥控指挥。这一切，都刺激着穆斯林宗教意识的强化，鼓动着伊斯兰大潮的高涨。

20世纪给人类带来的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整个世界正越来越紧地连成一体。然而，20世纪的国际关系又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贯穿着几乎

整个世纪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斗争，曾使世界形成了对立的两大阵营。美苏以及北约、华约长期处于“冷战”状态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文化、观念的差异。而今天，随着“冷战”状态的结束，长期被掩盖的民族矛盾、文化冲突也变得日益突出起来。

我们所说的当代国际伊斯兰潮，实际上包括了意识形态、地域、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伊斯兰文化是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也不同于东方的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独特的文化体系。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像其他文明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伦理观念外，它还有一整套关于社会、政治、国家关系等问题的理论和制度，对遍布于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有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对于穆斯林来说，伊斯兰决不只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他们的信仰、生命和世界；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家来说，伊斯兰的含义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制度；伊斯兰世界的含义是具有有一种共同文化、共同信仰的40多个国家和十亿人口，这些国家的政治基础非常接近，在许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

伊斯兰文化在历史上曾与东方文化发生过冲突和碰撞，与西方基督教世界更是进行过长期的斗争和较量。近代以来，在世界性的竞争中，伊斯兰世界落伍了，至今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在科学技术进步方面仍落后于欧美和东亚等地区。对于一种有过辉煌历史、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来说，对这样的状况是不会满意的。伊斯兰世界目前所表现出来的动荡和混乱，实际上是正在经历着一次内部的变革和调整，正在重新获得力量，以适应未来的世界的发展。

当然，就伊斯兰世界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科学

技术实力来看，它还不能与美、欧、日以及中国等世界多极化中的“极”相提并论，但从其地域面积、人口、资源和它巨大的发展潜力来看，它足以构成多极世界格局中的一个“极”，是一支谁也不能忽略的力量。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也认识到，伊斯兰世界目前之所以仍比较落后、软弱，主要是因为它内部的不团结。因此，不少有远见的穆斯林政治家和学者现在都在强调伊斯兰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可以预料，伊斯兰世界进一步团结之日，也将就是它对国际事务产生更重大影响之时。

有一点应该强调的是，在国际伊斯兰潮中，真正诉诸于暴力和恐怖手段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即使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中，有很多人也不赞成武力。西方某些人把穆斯林的形象描绘成一些气势汹汹、面目狰狞的宗教狂热分子，把伊斯兰教与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划等号是十分荒谬的。要看到，赞成恐怖活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人数很少，他们的行为并不能代表广大的穆斯林群众。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一样，穆斯林也是热爱生活、热爱和平的。

当代伊斯兰政治社会运动仍在发展，它的观念、理论和政策还会随着时代的前进发生变化，它是否能解决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也还有待于历史的检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作为穆斯林对社会和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这个运动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表现形式。

## 后 记

1979年伊朗爆发的“伊斯兰革命”，使许多人开始注意到了国际伊斯兰问题。我自1983年起开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迄今已有十多年了。虽然时间不算短了，但我感到自己对伊斯兰问题的了解仍非常肤浅。确实，对于一种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拥有十亿以上信徒、博大精深的宗教（实际上它并不完全是一种宗教），以十来年的时间进行探索和研究，也许只能是“管窥蠡测”罢。

坦率地说，我们许多人对当代伊斯兰教的认识也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在我们有限的认识中还有不少偏见和错误。当然，这些偏见和错误并不是与生俱有的，而更多地是因为对伊斯兰世界缺乏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有着很大差异，这种差异给中国人进一步了解伊斯兰世界增加了不少困难。

为了能对我国人民认识当代伊斯兰世界作一点微薄的努力，我不揣浅陋，写了这本《当代国际伊斯兰潮》。基于让我国更多的普通读者能了解当代伊斯兰教的考虑，我把这部本来应该是一部严谨、缜密的学术著作写成了一本力求深入浅出的通俗性读物。如果这本书能对国人认识伊斯兰教，了解当代的国际伊斯兰运动有所帮助，我将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

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得到了“中华社会科学基金”和日本世川和平基金会的资助，得到了我所在的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同事们的热诚帮助。研究过程中，笔者曾应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杜鲁门研究院邀请，到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埃及等地考察访问，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出版工作上更得到了世界知识出版社的有力支持。值此即将付梓之际，我谨向上述单位和个人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

肖 宪

一九九六年四月